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合读本

32	万历贵阳《登仕郎东冈李公暨配王太孺人合葬墓志铭》考释	李 芳
38	海龙囤王羽卿碑刻研究	陈 珊
43	贵安新区建置沿革与历史文化	何先龙

黔中往事

49	黔灵验泉的“圣泉流云”	多 林
52	贵阳三才巷钱氏宗祠	谭佛佑
54	贵州锦屏宗祠文化述略	张继渊 杨秀源

沧桑留痕

60	黄向坚《寻亲图册》及《盘江图》赏析	朱良津
64	红九军团转战绥阳	吕金华

人物春秋

70	文采炫耀丘禾实	庾思纯
72	茶园山与徐氏家族	田晓东

封面 甲秀楼 （唐秀成 摄）

封三 《贵州文化遗产》征稿启事

锦屏文书： 走向世界的杉乡记忆

文 / 耿生茂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早在7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就开创了一系列的创造性发明，如观天象，制历算，作八卦，制网罟，驯家禽，制干戈，造书契，兴管理，定婚姻，兴医药，化蚕制衣，制乐创歌等。伏羲时代，“画八卦，造书契”取代结绳记事，创制最初文字，揭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序幕。

“当整个西欧还处在原始状态的时候，中国人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了。”（萨维纳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方文明是先于西方文明的，这对于唯西是从者，无疑是一贴清醒剂。

从古人的“人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果”，以及“义以无往不利，废义则往而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义则立德，无义而无信”等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诚信”的高度认知，对“义利”与“德信”关系的深度解读。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特别讲礼重义，尚德崇信。“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这里的“信”，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信用”，指的就是一种信守共同约定的精神，即现代人所讲的“诚信”与“契约精神”。

2010年贵州省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

文献遗产”名录的锦屏文书，则以其五百年的民间智慧更生动鲜活地把“契约精神”演绎到极致，让诚信成为南疆林业繁荣昌盛的灵魂支柱，创造了辉煌的木材时代，五百年人工造林史，谱写了弘扬中华诚信精神的最璀璨华章。锦屏文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她的“契约精神”与“诚信理念”。

何谓“契约精神”？国际萨满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白庚胜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的代序中，对中国契约的起源和契约作了较全面阐述，并对契约功能及其精神作了深入的概括：

“于是，契约成为维护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存在、体现诚信精神的文化形式、生发法治世传统的历史基础；于是，契约在社会学家手中被视为识读社会肌体的密码，在历史学家眼中被当作阐释历史细节的证据，在法律工作者眼中，则成为判定案例性质的凭据，更重要的是在当事者那里成为履行有关责任、义务、权利的铁条。自商周参同契伊始，契约还代表了契合的文化精神、默契的交际的境界、锲而不舍的意思追求。”

一句话，契约精神就是以民主协商为平台，契约形式为载体，以人际诚信为基础，以有效实现社会和经济管理，以求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凡契约文书都分别约定了主

体客体，甲乙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契约的履行实施，一是靠签约双方的诚信，二是相应的检查督促机制，这是契约精神赖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契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主要包括平等精神、自由精神、权利至上精神，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权责对等、诚实守信、遵守规则、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诸多精神。建立在平等自由原则上的契约，是一种需要共同信守的公平协定，守信则和，背信则乱。

一纸锦屏文书能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行五百年长盛不衰的事实证明，人类契约精神扎根清水江等流域，构建的“契约管理型社会”是多么和谐与成功。

可是，西方和唯西学者多认为，西方的文明社会是按照社会契约模式建构的，其主流精神就是契约精神，故尊崇法治。特别是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中国是个“身份社会”，虽有契约出现，但缺乏契约精神，重人治而轻法治。

然而，锦屏文书的大量发现，以及植根于契约文书中的契约精神与诚信理念，有力驳斥了上述观念。因为从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天柱、黎平、三穗、剑河、台江、岑巩、从江等八县征集进馆的数十万份锦屏文书，我们发现，居住在清水江、都柳江、潯阳河等流域的侗、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自古就有重礼崇信尚义的传统，人们从“刻木为信”到“书契为约”，到形成独具特色的契约文化，并步入了“契约管理型社会”。很多不沾王化的化外之地，则更多依靠民族习惯、宗族宗教、道德力量等推动契约的履行。在契约管理型社会里，人们更加珍惜在公平、自由、平等、协商原则上订立的契约协定，其共同信守的自觉性与契约执行力大大增强，即使有少量纠纷，也能够以民间方式协商解决，很少诉求于王法，即使诉诸于王法以息讼，也坚持“以契为凭，以约为据”的契约原则，共同维护契约的约束力，这是人类契约精神的生动体现。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说过一句

闻名世界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惟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天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在中国，与康德这句名言对应是“季札挂剑”的著名典故。

春秋时期吴国人季札，一次出使各诸侯国，路过徐国，受到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临别，在徐国国君为季札送行的酒宴上，季札舞剑表示谢意。季札所舞的剑，剑鞘精美，剑锋犀利，发出闪闪寒光，挥舞起来更是银光万道。季札看得出徐国国君非常喜欢这把宝剑，有心把这柄剑送给徐国国君作纪念。但剑是吴国使节的一个信物，使命还没有完成，还不能把信物送人。于是，季札在心里许下诺言，等出使列国归来，一定要将这把宝剑送给徐国国君。可等完成使命归来，徐国国君在不久前已暴病身亡，季札痛惜不已，来到国君的墓前，三行大礼之后，郑重地将佩剑挂到了墓前的松树上，兑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这就是中华民族“契约精神”理想主义最高境界的体现，即使是心中许下未对人言的诺言，也要兑现，做到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己。

锦屏文书是中华民族契约精神与诚信文化的集中体现，字字句句都是千金诺言，如高山滚石，一去无悔。诚信在这里，闪耀着西南少数民族的人性光辉，成为推动契约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奠基石，其透射出坚如磐石诚信至上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符合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准则与内容要求，需要我们去大力倡导、弘扬和认真践行。

市场经济，从某种层面讲，就是契约经济、合同经济，更是诚信经济。贵州电视台品牌对话栏目《论道》的嘉宾主持人龙永图，曾经讲过一番话，说他跟很多老板攀谈，问到投资办厂最怕是什么，他们说不怕你政策不优惠，就怕你的政策老在变。

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老板投资办厂兴业，事先都经过认真市场调研与可行性论

证，能够产生一定利润的项目就会去做，但如果政府政策不稳定，就会增加企业实现利润目标的不可控因素，这里隐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这些无法预测和规避的风险正是企业最大的风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这种情况下投资就是冒险。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诚信问题，政府出台的政策老在变，不应该是诚信政府所为？！老百姓尚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政府政策如随意变动，随意性大，何以取信于民，这岂不是挑战自我的信誉和权威吗？！对其治下社会所树立的诚信形象自然打折扣，企业与政府、社会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固，毛将焉长。

时下，某银行在媒体上宣传有这样一句广告词，“穷可贷，富可贷，不守信用不能贷”，虽然简短，但意味深长，既生动地阐明了信用的社会价值，又是对当今社会不守信用的批判与否定，对诚实守信者的褒奖与肯定，很有警示意义。

时至今日，锦屏文书闪耀出来的“契约精神”的光芒，依然投射在清水江等流域的各个角落。锦屏文书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泛黄的纸片破损不堪乃至有的霉变成纸粉，但不朽是纸张背后的契约文化，这是我们追寻法治文化的源头，而根植于其中的契约精神，更成为当今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思想灵魂。当然，当今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文化，更需要法治发展来维护与保障。

明清以来曾经在林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锦屏文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名称、内容形式有所变化，演化成村规民约、乡规民约、合约、合同、协议等，继续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作用，在时间上继续延伸，在空间上继续拓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广阔天地上继续发挥更大的贡献。

以锦屏华寨为代表的村规民约，成为有效规范管理村寨事务的典范和黔东南州“契约社会管理”的一面旗帜，一个传承弘扬契约精神的成功范本。锦屏县正是因为借鉴汲取锦屏文书的精华，在推进新一轮林业制度

改革中取得了显著成效，2010年获得在全国林改百县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经验的荣耀，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强烈反响。锦屏文书凭借深厚的契约精神、诚信文化与生态环保理念，终于站在国际舞台上一展中华民族民间智慧的精神风采，它无愧于2008年在吉隆坡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档案大会前沿论坛的高度赞誉：“锦屏文书是全球混农林文化遗产的活态记忆库，在生态保护上树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典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个以“依法治国”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仅要建立健全高效运行的法治体制，还必须大力弘扬法治文化与“契约精神”。那么，大力弘扬植根于锦屏文书里的“契约精神”，正是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也符合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要求和新时代的召唤。

这正是我们今天抢救保护锦屏文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在贵州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在省州档案与文化部门等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特别是黔东南州锦屏文书项目县所做的征集、整理和开发利用等工作，是对传承中华民族的诚信文化，弘扬契约精神，实实在在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其贡献不可限量。

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锦屏文书：走向世界的杉乡记忆》，正真实地反映了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及其缩影。作者作为一名基层档案人，从参与锦屏文书抢救保护亲历者的角度，十分用心地记录反映了抢救保护锦屏文书的艰辛过程，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实际工作。

读了《锦屏文书：走向世界的杉乡记忆》，大家可了解到锦屏文书自上世纪60年代发现至今，近半个多世纪征集、抢救、保护的艰难历程，锦屏县各级党政和有关部门，尤其是档案部门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体会到锦屏文书从在锦屏首先发现到一步步走出深闺，乃至凤凰涅槃成为“中国档案文化

遗产名录”进入“中国记忆工程”，树立起锦屏文书这一独特的中国文化品牌，其间历经的种种艰辛和酸甜苦辣；同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智慧、契约精神和诚信文化，以及南疆林业重点县锦屏的杉乡记忆，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记忆工程”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期待。

读这本书，我们不仅可领略锦屏文书——穿越五百年的文化底蕴与魅力，了解锦屏文书命名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科学合理性的同时，而且可以认识到当前我省还存在的恶意篡改“中国档案文化遗产名录”——锦屏文书称谓的不和谐音符，更加激发起大众捍卫中华民族宝贵的契约精神与诚信理念的使命感，坚定对“德与信、义与利”的现实思考和在内心深处的考量与选择。因而，制定出台《锦屏文书保护条例》地方性法规，对锦屏文书进行立法保护，更好地维护锦屏文书国保名录称谓的权威，更是人大立法和

政府司法部门的职责所在。

我们相信，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到贵州黔东南这块契约文化热土，展开多领域多学科的锦屏文书课题研究，黔东南州这朵契约精神之花，一定会更加美丽动人，中华民族契约精神与诚信文化一定会焕发出新时代的芬芳。

我们期待着，锦屏文书这一本藏在南疆林业史背后的民间史记，早日以更多多姿多彩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感受到她更丰富的内涵与价值，更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历久弥新的锦屏文书，焕发出新生力量，必将迎来一个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最后，衷心祝愿锦屏文书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世界记忆工程”更高目标迈进。文

（作者单位：黔东南州人大常委会）

（上接第53页）附势者以乡贤请奏入祠。”其联曰：

美一门广售芭苴，博得他境内推崇，朝中褒宠；

喜四境辉增桑梓，夸说尔生前富贵，死后馨香。

此联对钱氏颇有“微词”，略带戏谑，刘玉山先生本来就将其归入其《壶隐斋联语类编》的《游戏类》，似可见撰联之初衷。很明显，是不可能镌刻于钱氏宗祠之内的。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及至八十年代，笔者与钱氏“洪”字辈的几位后人，多有交谊，且过从往复，常于其三才巷家中聚会论学小叙。不过那时钱氏祖辈的牌位和祠堂的一切设施，早已不复存在了。楼宇房舍，已被“改造”，而为若干外姓民众的住所。乡贤祠的旧貌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一所居民的大杂院而已。“文革”时期，还在

其中设过什么街道服务站。笔者的一位学生，与拙荆同在实验小学任教的钱洪端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住其中。前些年常说起，他家的一位长辈，还保存有当年诰封祖辈钱鹏的“皇榜”，但就是不肯轻易示人。四、五年的光阴已过去了，“皇榜”的命运如何，笔者因年事已高，再也无甚精力去专行查访探求了。

至于在贵阳图舆中存在两百来年的三才巷，随着城市的改造，道路的拓展，特别是在延安东路建成后，仅剩从中华北路口，到贯城河不足百米之遥。待改革开放，房屋开发的浪潮席卷整个贵阳市区时，喷水池周边、中华北路一带，一幢幢摩天大厦拔地而起，三才巷以及巷内钱氏宗祠也就随之而永远消失了。不过，在许多老贵阳的心目中，还是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 保护现状及思考

文 / 图 陈琳平 宁健荣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有极高的文化和审美价值。本文通过对铜仁东山古建筑群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以及保护的现状作简单介绍，同时对铜仁东山古建筑群目前保护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浅见。

一、铜仁简介

铜仁乃黔东重镇，文化丰富，历史悠久。关于“铜仁”之名的来源，也有一段传说与经历。“铜仁”原名“铜人”，传“元朝，有一位渔人在铜岩处潜入水底，捞出三个铜人”。“铜人”这一名称便由此开始，直至明代初年。元代朝廷便在这里设置了“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隶属思州宣慰司。明代洪武五年（1372），“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被改名为“铜仁长官司”，“铜仁”才得以定名。永乐十一年（1412），明朝廷拟设置贵州行省，废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设置铜仁府，为贵州行省八府之一，遂成为黔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铜仁的文物古迹越来越受重视。周逸群烈士故居、东山古建筑群、川主宫先后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政府将城区内的文物古迹进行整合重组，统称为铜仁东山古建筑群，并联合申报。经过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东山古建筑群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是铜仁先辈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是铜仁土司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见证，反映了铜仁数百年的历史变迁，给我们了解南方边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一）周逸群烈士故居

周逸群烈士故居位于中南门古城内，是中国红色革命早期领导人周逸群同志的居所。周逸群，1896年出生在铜仁，1919年春，赴日本留学，1923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



铜仁东山寺

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是贺龙同志入党介绍人。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与贺龙同志共同开辟了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1931年5月20日，周逸群由洞庭湖特区返回江北，途经湖南岳阳贾家凉亭时，遭国民党军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周逸群烈士故居，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其祖父始建后院的两栋楼，分别为住房和书房。左栋为住房，上下各有三间房，共六间平房。整个居室清雅别致，错落有致。建筑座北朝南，整体呈四合院式白墙青瓦，院内房屋皆为悬山顶单檐式木房，房屋皆是以料石为基，木质穿排结构，雕窗门楼，青瓦翘脊，为典型的黔东民居样式。1984年和1996年历经两次大规模的修缮。大门上悬挂的“周逸群故居”红裱金字门匾是徐向前元帅亲自题写。

现故居已被列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红色宣传教学与红色旅游一体。故居内恢复以前的场景布置，并以文、图、表及实物的展陈形式，展现了周逸群烈士光辉的一生，迎接国内外观众的瞻仰和信奉。

（二）东山寺古建筑群

位于铜仁城东江边有一平地而起的山峰，被称为“东山”。山上有一寺庙称“东山寺”，东山寺始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当地的官员蔡湖又在东山山巅上修建“澄江楼”和“川上亭”，并题字“舞雯遐思”；凌霄决顶，颇为壮观。随后，当



中南门古城区

地官员又分别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和清顺治十八年（1661）复修了“双峰阁”、“兼隐庵”，增建了“大观楼”。之后，当地郡人官绅又先后修建真武观、文昌阁、奎星阁、武侯祠、大雄宝殿、护国楼、二吴亭等清代古代建筑。经过明清两代的增建扩容，形成今天的东山寺古建筑群。现在的东山，古树参天，亭阁隐露，烧香拜佛者接续不断。2006年东山寺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川主宫

位于铜仁市大江北路中段东侧。又称川主庙、川主祠。“川主宫”是铜仁市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由当时铜仁长官司官员李渊建成，供奉着四川太守李冰父子。因为铜仁与四川地域相近，这也由此成了巴蜀客商集会地。

川主宫四周有青砖筑成的封火高墙，宫内有戏楼、正殿、抱厦等。戏楼的14根柱子，木雕和彩绘十分精美，雕刻的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演义故事。不难看出，曾经有多少波澜壮阔、忠孝节义的故事在这戏台上粉墨登场。1948年四川同乡会曾在这里建立“铜仁私立益州中学”，“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破坏，直至1997年才完成修缮。2006年，因管理不善，又遭遇一场大火，毁于一旦，此后几经修葺，终得恢复如初。

（四）中南门古城区

位于铜仁市中心地带的中南门古城区，是东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门古城区东、南、西三面环水，北面靠山，占地面积约达3.6万平方米。其遗存多为清代建筑，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多为庙宇、城墙、码头和民居，古民居建筑总面积约有2.5万平方米，是目前铜仁仅存的可以反映铜仁古城风貌的原生历史街区。街区内有保存完好的四合大院35个，古巷街道11条，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建筑200余栋。

中南门古城区曾是铜仁最繁华的商业区，在古城区内遗存了许多年久失修的重要建筑。例如古城中的“飞山宫”，又称飞山

祠，明万历《铜仁府志》载：“飞山祠，在府治东东山之麓，正德间土官李椿建，万历四十年知府陈以耀重修，扁曰‘靖边安戍’。”清道光《铜仁府志》载：“飞山庙，一在东山下，一在北门演武场，已毁。康熙间副将贺国贤重建”。始建于近500年前的明正德年间，主要供奉唐朝少数民族首领杨再思。在数百年内经历了数次损毁与重修，现只有戏楼的主体建筑保存完整，其余建筑均已损毁。铜仁政府在四个“必保”的原则下，对其进行保护和修缮。

三、东山古建筑群保护存在的问题

远眺东山古建筑群，木石参天，风景秀丽；中南门古民居建筑高耸，马头翘脚错落有致。据资料显示，古代铜仁，锦江两岸，人烟稠密，文化繁荣。明清时期，更是舟楫往返，会馆林立，商贾云集，享有“黔东护商栈”之美誉。正因为有铜仁东山古建筑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文化在铜仁的近千年“历史记忆”沉淀。古建筑群作为不可以移动的文物，长期暴露在露天的环境下，受自然环境影响颇重。因此，这些古建筑的保护值得人们特别重视，而目前铜仁东山古建筑群的保护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令人深思。

（一）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文化资源逐渐流失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数量众多，价值巨大，有很多文物建筑大都沉睡在断壁残垣和高墙青瓦之间。其文化意义和研究保护程度，除了少数研究人员以外，还未被世人普遍认识，许多富有丰富文化的古建筑还未能及时得到发现和保护。同时，由于多方面原因，很多古建筑在发展和利用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历史记忆逐渐流失。虽然目前已经对古城实施保护性修葺和开发，却已有很多宝贵的“历史痕迹”不复存在。

（二）开发利用，难免对文物造成损坏

随着人们文化意识的提升，人们旅游文

化需求也在不断的攀升，特别是老城区的旅游发展更是热门地域。铜仁东山古建筑群大多为清朝建筑，基本上都是木构结构，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目前，铜仁市政府正在多方筹集资金对古城实施保护修缮和开发利用，改造的范围与规划设计均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批示，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按照古代中南门的样子进行恢复性修缮。但是在发展改造过程中，难免会对建筑遗存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部分古建筑一旦损失便不可再生，也无法复制。

（三）公众意识程度不高，对古建筑也是一种破坏

古遗址建筑文物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应该受到公众的重视。目前，大多数人对铜仁东山古建筑群的历史文化价值了解程度并不高，呈现不了解、不清楚的现状，对古建筑群的保护意识自然都很欠缺。在公众眼中，东山古建筑群只是一个正在开发利用旅游景点，忘记了它是古代历史遗存的本质，忽视对古建筑群的保护，随意依靠拍照，稍有不慎，就会致使古建筑构件的断裂、垮塌。

四、东山古建筑群保护问题思考

中国的古建筑都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独具一格的建筑风格。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古建筑在我们眼前永远消失，以前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却只能从老照片中得以观赏。疏于保护，我们会丢失更多更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文物古迹，所以对于古建筑的珍惜爱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提升保护古建筑群的重要性的认识

1. 古建筑遗存是建筑艺术的活教材

古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数百年来，多少的能工巧匠凭借他们的聪明智慧和精湛技艺以及宝贵经验，造就了铜仁东山古建筑群中的精美建筑，已经成为现代建筑艺术的“活教材”。2012年7月，铜仁东山古建筑群被授予“贵州十大最美古建筑”称

号，铜仁东山古建筑群拥有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清代遗构建筑。对现代的建筑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通过对古建筑群的研究可以探索同时期的社会建筑水平，为现代都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定位提供依据和参考。

2.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是历史文化的见证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始建于明初，清代扩容，才形成现在的规模。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铜仁历史的沧桑变化。这批古建筑见证过铜仁盛极一时的土司文化，历经了自古于今繁华的民间社会生活。铜仁会馆“川主宫”，就曾为巴蜀客商集会地，宫内围护墙上镶嵌有清咸丰、同治年间记事及告示碑5通。建筑内琳琅满目的精美木雕、石刻、彩绘等等遍及全宫，为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戏曲、宗教艺术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是旅游业的发展根基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对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大国，消费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旅游业和旅游发展开发也随之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运行轨道，必然也将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古建筑特色文化首当其冲的列入城市发展的大规划范围内。

“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促进文化和商业经济双赢的发展模式，受到政府的推崇。铜仁东山古建筑群，也会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发挥古建筑文化特性，似“凤凰古城”、“大理古城”那样，不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推动铜仁经济驶入快速轨道，成为铜仁经济发展的文化基础。

（二）保护古建筑群的有效措施

1. 增强保护意识

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古建筑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瑰宝，如果因为人为的破坏

导致其原貌的不复存在，这将是整个中国民族的遗憾。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起全民的保护意识，摒弃随意破坏古建筑的陋习，增强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和责任感，去维护我们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2. 完善古建筑修缮、管理制度

古建筑群的修缮和保护涉及各种工作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决定这古建筑保护的成功与否。在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组织专门的研究小组全面了解古建筑的历史背景、材料、施工工艺等各个方面，而且在此基础上制定指导方案，妥善运用先进的科技技术，避免在保护修缮过程中造成破坏。同时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加强规范性，提升对古建筑的保护力度。

五、总结

铜仁东山古建筑群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铜仁市区两级政府进一步深入挖掘铜仁商贾文化、民俗文化、土司文化、红色文化、书院文化的政策下，提升中南古城历史文化地位，复建铜仁原有城市传统格局，详细地制定东山古建筑群建设规划，保留好古建筑群原始风貌和历史遗存，使之在铜仁经济大繁荣的趋势下，带动古建筑群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圈的快速发展，促进铜仁经济文化大繁荣。^{〔文〕}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省博物馆）

参考文献：

- 〔1〕史继忠.铜仁东山古建筑群〔J〕.当代贵州.2008.(1): 55
- 〔2〕任敬廷.传承与弘扬“仁义之城”的价值维度〔J〕.知行铜仁.2015.(1): 3-5
- 〔3〕郝晓瑜.传统建筑保护价值及其保护对策问题研究〔J〕.建筑与装饰.2019(11): 227-288
- 〔4〕王兴彬.中国古建筑保护问题的思考〔J〕.青年文学家.2015(18): 191-191

吾蜀乡馆



安顺地标西秀山 的历史演化与文化内涵

文 / 图 丁武光

一座城市的称谓，无论是古是今，总有某一特定的含义。作为一级行政建制，今“西秀区”之得名，肇于2000年“撤并建”时，由原县级安顺市与安顺县合并后更名而来，为什么以“西秀”冠名呢？人们自然会想到城市中心的西秀山，这一突出的地理特征很快便成为城市更名的首选。如今，当人们已习惯这一称谓后，重新来认识西秀山，除了地理特征外，究竟有哪些历史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永久地纪念呢？

西秀山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的《贵州图经新志》卷十四“普定卫军民指挥使司”中记有：“西秀山，在卫城内西，山形蹲踞如虎。林木葱郁，上有浮屠石塔七级，屹然为卫之壮观焉”。该志绘有《普定卫地理之图》，为迄今发现的550年前安顺最早的地图。从图可见，在老城的整体格局中，有两座小山被四周城墙圈围其中，显得异常突出，这就是西秀山和东胜山。该志又列：“东胜山，在卫城内东南，高数仞，长倍之。俗名青龙山”。由此可知“西秀”与“东胜”互为对应，皆因老城南向布局以南门为轴点而起。

不过在西秀山处所注文字为“白虎山”，联系该书条目有“山形蹲踞如虎”字样，也就是说，起码在550年前西秀山又称

白虎山。与东胜山俗称青龙山相应合，为古时城堪輿风水所系，今新大十字南街口处为南城门，居中而立，左有青龙、右有白虎，虎踞龙盘，是为地灵人杰之相。

随着民国以后古城墙的拆除，老城的界线也随之打破，平缓延绵的青龙山被大片民房覆盖，西秀山则凸显出来，古有“黔境第一山”之称。加之山顶有石塔一座，山北为圆通寺。自然形态与人文景观交融，共同构成了最为瞩目的城市地标。

明代中期以后，西秀山的相关记载也多了起来。成化年间，江西庐陵人周梦中留有七律《西秀山》一首：

安顺“棧星門”牌坊



群山环抱壮边城，城上孤峰眼界明。
万落云开天远大，双溪月霁水澄清。
日悬雁塔风霜老，春暖绒柳絃诵声。
公暇却从乡进士，登临欲曲问民情。

周梦于成化二十年(1484)任贵州按察司佥事，作此诗时，应在任上。该诗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西秀山题咏。到了嘉靖朝，西秀山已为黔中首景，宦游者多登临。嘉靖《贵州通志》“卷八”有文字记载，山顶除塔山外，另建有观风亭一座，上悬“观风扁”，为嘉靖十五年(1536)巡按御史杨春芳建，副使韩士英题诗：

孤山如釜不成峰，徐步登临亦在空。
极目乡关云尚远，伤心民瘼岁常同。
看花跃马新郎得，振武扬威北镇雄。
更欲寻春楼上去，无才深愧与“观风”。

韩士英，四川南充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进士，后历官贵州巡抚都御史、兵部尚书等。嘉靖十四年(1535)购贵阳城东“白云庵”建成“阳明书院”。

嗣后，巡按御史赵大佑易“观风”为“万壑云烟”，并留七律二首：

青畦一迳度丹梯，憇静真恬老衲棲。
香影诸天凌市隘，绿绕平野映城低。
华昙龙去留僧钵，午夜钟吟发曙鸡。
共道三生双树里，病夫萧散漫留题。

花官俗远绿荫封，上乘谁留双履踪。
好鸟惯看山客到，片云常与梵王供。
贪趁尘路驱羸马，欲借禅林制毒龙。
半晌梦回支遁榻，振衣去抚石台松。

赵大佑为安徽太平人，万历《贵州通志》列贵州名宦。嘉靖二十年(1541)任巡按御史后到此云游。志载其“果敢峭直，执法不回。临大事，决大疑，片言而止”，诗中可略见其风格。几年后，嘉靖二十八年(1549)巡按御史张雨至此，留七律一首：

劳碌东南无了日，风尘西北欲何之。
将军铁马斜阳道，丞相朱旗五月师。
功业好逢明主，人生那复少年时。
临高不是新亭客，玉露金茎有所思。

由此可见当时登西秀山凭栏观景已为文人行游时尚。隆庆六年(1572)，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吴国伦来到这里，将西秀山更名为石莲峰。吴国伦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为明“后七子”之一。“后七子”前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王死后，吴国伦成为文坛盟主。

到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黔记》问世，所列各府、州、卫、县地理山水也最为详尽，其“山水志”中“西秀山”条目，沿用“图经”之说。

清代，与西秀山相关的文字分布愈广，尤以座落在西秀山顶的石塔为最。可以说该塔蕴藉了丰富的佛、儒、道三家文化，各有凭说。

查询相关资料，从古代营建一座城市的规律分析，建此塔时，最初的意向应以此培补郡城风水，也就是说早先这座塔是一座风水塔。清咸丰《安顺府志·艺文志》载有：

“初郡城既建，形家以城南山势不耸，于南隅阜建塔，以彰文明之象。”按古时五行之说，安顺四面环山五星归位，本为吉地，所缺城南山势平缓，势象不济。加之地形北高南低，三门进水，南向而泻。于是，行家择

西秀山远景



定天象地脉，认为在西秀山上建塔一座，可以培补风水之不足。塔成，果然远近高低，相得其宜，正好上应天星，下合方位，如天造地设。

随着佛教在黔中的广泛传播，此塔与山北圆通寺密不可分，历代僧众皆视其为佛地表征。从保存较为完好的塔身看，该塔显然又是一尊佛塔。整座石塔属于“正六边形锥状体楼阁式封闭石塔”，基座高近2米，每边长为3米，周长18米。塔体共分九级，总高约十余米。其六个外壁刻有六尊佛名，分别为：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接引阿弥陀佛
南无圆满报身卢舍那佛
清静法身毘卢遮那佛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
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

正因为该塔是一佛塔，历代的培护总延绵不绝，史志也留下不少记录。如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僧戒章重修，崇祯十年（1637）僧圆经复修，清代嘉庆二年（1797）僧深恒再修等。今天的石塔，是清代咸丰元年（1851）所重修的，迄今已有160多年。在塔身北侧第二级塔壁上还留有刻石：“咸丰元年普定县邵鸿儒重修”；南侧第二级的塔面上亦刻有前知府胡林翼捐金二十两，以及参捐者杨春发等郡绅姓名。

在保存较多的文字中，以此塔弘倡儒学，张显文运的记载同样屡现于史志。自明代开始该塔便有“文峰塔”之称，以示崇尚教化，勉励后生读书求学。明万历《贵州通志》将其列为“普定八景”（普定，即今安顺，明万历前安顺称普定卫城），称“文峰夕照”。清代冠以“笔峰耸翠”，列郡城八景之首。光绪年间安顺名士郭石农有《咏习安八景》，以“笔峰挺秀”为题留有七律一首：

何来大笔势摩天，塔见圆通望俨然。
满向九霄沾雨露，挥从万象走云烟。

钟王隶楷当头见，燕许词章信手传。
秀启人文归间气。霓裳高咏会群仙。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地区法院基建拆除旧房时发现的《重修安郡文峰记碑》，留下了难得的文史记录。全文如下：

士之歌“鹿鸣”而宴“琼林”者，则必曰地灵人杰使然也。以故普天之下莫不择高以建塔，自诩其人文蔚起，以勉夫读书子听夕用功，为振兴学校，鼓舞人材之一助，故谚谓塔为文峰塔之义大矣哉！习安郡城之塔由来旧矣，岁久倾圮，近年秋韦，未登贤书者已两科矣，有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文峰”之不振，盖当论之，若子之道，求其尽心焉尔。故其学也，求尽吾心之学，非为科名之迟速也。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也。余膺民社，以亲民为职也。亲民之学不明，则世无善治者矣，《传》不云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郡之人士或以文峰倾圮致妨科名为恶，爰捐廉为倡以修葺之。甫兴工而余，奉檄调任普安，心甚惘然，聊跋数语，以识歉仄之意云尔。是为记。

咸丰二年正月下浣署普定令余姚邵鸿儒撰

该碑立于咸丰二年正月，由普定县知县邵鸿儒撰文。时普定县为安顺府附郭县，与府同城。从碑文中可知，建此石塔有其原由，一是该塔年长日久已近倾毁；二是近10年两科省城乡试，安顺无一人中举。“文峰”不举，是为异象。建此塔就是为了“勉其读书子听夕用功，为振兴学校、鼓舞人材之一助”。“若子之道，求其尽心焉尔。故其学也，求尽吾心之学，非为科名之迟速也。”文中这位“父母官”陈述了自己的进学之道，激励士子，以期安郡科举有兴，文风蔚起。文

（作者单位：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局）

华严洞藏五箱青铜器的来龙去脉

文 / 杜应国 图 / 周 兴

抗战时期，安顺华严洞度藏故宫国宝之事已经广为人知，但同时入藏华严洞的还有五箱并非故宫文物的青铜器，则似乎知者不多或知之不详。然就是这批青铜器，却数度以“故宫古物”的名义在安顺现身，一般人多不知其所来，亦不知其所往，颇有几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意味。

这批青铜器中的一部分首次在安顺公开亮相，是在民国时期的1943年。据安顺档案馆编《安顺民国时期大事记》载：“10月10日，安顺民教馆为庆祝国庆，在安顺举行文献艺术展览会5天，展品有黄元操副议长、故宫博物院庄慕陵科长、张丰胄主任、陈达夫校长等数十家收藏的名贵拓片、青铜器、历代书画、照片以及西南的名画家作品，共900余件。”其中所说的青铜器，当即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主任庄严先生提供。据见过此展的老人回忆，展出的青铜器中，有

一件名为“满招损”的珍品，以之盛水，不能盛满，满则其中的水会全部流尽。不过，展出地点在回忆者中却说法不一，有说在原女中（崇贞寺）的，有说在东街原国民党县党部的，其实都不对，确切地点就是在西街民教馆（原皇殿）内。第二次亮相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据2005年笔者为《安顺晚报》策划的一期老照片及照片提供者、原安顺师专退休教师周兴先生文，原藏于华严洞的这批青铜器在1944年并未随故宫文物转移到巴县，而是留在了安顺，1949年后被地方新政权所接收，并上报至当时的政务院；1952年北京有关方面派人前来接收并将之押运赴京，行前应地方要求，特在当时的南街店员工会内（后为图书馆）举行展览，让安顺市民一饱眼福，用的名目就叫“故宫古物展览”。据周兴先生回忆，展品中有青铜古鼎、香炉、秦汉古剑、戈矛，以及汉镜、汉砖、鸡足灯、铜佛、铜人、铜兽、满招损等等。

现在已经知道，入藏华严洞的故宫国宝，是南迁文物的第一批即所谓南路，总数仅80箱共1022件，其主体部分是1935年选赴英国伦敦展出的艺术精品，南迁时又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凑装成80箱，以书画作品为主，并无青铜器类文物。华严洞藏存的青铜



安顺华严洞古寺一角

器，是前述80箱故宫文物于1939年元月自贵阳转移到华严洞度藏后不久，由南京古物保存所于同年4月13日提请故宫博物院代为保存而入藏华严洞的，这批青铜器总共只有五箱计118件。

问题在于：这批青铜器既是委托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为何在1944年的紧急转运中没有一同运往四川？据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载，在各路南迁文物中，也有代运代管的现象，如中央图书馆善本书二箱、安徽图书馆28箱，都是由故宫博物院代运至大后方移交给原单位的，唯独这批青铜器会遭遇不公，未随队迁移反被遗弃在了安顺？对此，当年参加布展的周兴先生等并不知情，而只是猜测可能是因为品级不高而被挑剩下来留归了地方；甚至还有说是因为华严洞为藏存国宝作出了贡献，故博人为感谢安顺人民而将之慷慨地赠给了地方……如此等等，皆为臆想猜测之言，不足为信。但这批青铜器为何留在安顺？是五箱全留还是只留了一部分？十二年过去了，这问题仍横亘在心，百思不解，乃成悬疑。

诂料，目前见到庄灵先生转来其尊翁庄严先生早年所著之《唐玄宗投紫盖洞简记》一文（文收《山堂清话》，庄严著），内中述及当年在安顺华严洞代管南京古物保存所青铜器一事，一席话就交待清楚了这段来龙去脉，顿让人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叹。

据庄严先生言，南京古物保存所转移出来的五箱青铜器，是应该所主任同时又是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舒楚石之请而由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的。至今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仍保存有舒楚石函告国民政府的一份电文：“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南京古物保存所成立于1915年，隶属江苏省，1928年改直隶教育部管辖，1936年又被划归南京市政府。全面抗战爆

发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裁撤了不少单位和人员，其中，南京古物保存所即在裁撤之列。因此，1944年底因“黔南事变”爆发而奉命将华严洞的故宫文物紧急转移至四川时，这批青铜器就成了无主文物，庄严等人即电告教育部，请示这批青铜器该如何处置，经教育部回电，将五箱青铜器悉数移交安顺民众教育馆接管。庄严等人即按部令，临行之前将这批青铜器顺利移交给安顺民众教育馆，然后方匆匆上路。这就是五箱青铜器被遗留在安顺、后来为新政权接收，再后又运往北京并于临行前在安顺公开展出的前因后果。周兴先生提供的部分展出照片，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至今，在周兴先生提供的照片中，还有几件的展出说明用的是安顺专署的信笺纸，其上隐约可见有“贵州省安顺专区人民政府”的字样，这就雄辩地证明：这批青铜器在安顺展出一事，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这批青铜器的最终去向有点蹊跷。按周兴先生的说法，1952年展出结束之后，“安顺人民像送自己的子弟参加志愿军一样，纷纷伫立街头，亲眼目睹这些文物在北街专署门口装上两辆卡车，热情欢送国宝启运回京。”但多年后，我们却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中见到至少有二件文物，就是当年在安顺展出的物品，一是唐玄宗李隆基祭祀南岳恒山的“投龙简”，一是大明通行宝钞“壹贯”的铜质印版。前者还被称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会不会是当年运出安顺后，在省城贵阳又进行过一次较严格的甄别鉴定，有些器物就因此被留在贵州了呢？这恐怕又是一个待解之谜罢？

（作者单位：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左：1952年在安顺展出的青铜骑神兽人像

右：1952年在安顺展出的秦汉古剑

“侗族踩歌堂石刻”收藏记

文 / 图 巴 娄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一级文物，即通常所谓的国宝——“侗族踩歌堂石刻”。

关于这件国宝，有个背景故事：

一、故事源于举办《侗展》

1984年11月，我受贵州省文化出版厅的委托，在首都与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签订《关于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

商谈纪要》，商定次年6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一楼西厅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简称《侗展》。

展览名称为何这么长？叫《贵州侗族建筑展览》或《贵州侗寨鼓楼展览》不是更简洁吗？为了取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我们费了一番脑筋。

诚然，侗族建筑的精华是鼓楼，举办《鼓楼展览》未尝不可。但考虑到，侗族建筑，除了鼓楼，还有花桥（风雨桥）、戏楼、凉亭、禾晾、粮仓、水井、水车、水碓、水磨、萨岁（萨玛）、民居、斗牛圈、斗牛场等等，都很有侗族特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单就鼓楼而言，其用途就有十多种：诸如聚众议事、击鼓报信、排解纠纷、对唱大歌、吹笙踩堂、存放芦笙、摆龙门阵、悬挂牛角、拾物招领、施舍草鞋、存放葬具（抬棺材的龙杠及绳索），等等。

侗族是从“百越”族群发展而来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兼营林业，特别擅长种植杉木。侗族妇女善于纺织，使用脚踏纺车能一手纺出两根纱。所织成的“侗布”“侗锦”，精致、美观、耐用。侗族妇女，精通女红，至今依然。侗族男女老少善于唱歌，“侗族大歌”独具特色，已跻身世



雄伟壮观的增冲鼓楼

界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勤劳智慧的侗族人民为缔造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侗族名称源于“峒民”。古代侗族地区曾以“峒”为行政单位，故称当地百姓为“峒民”，至于侗族自己，则称为“甘”。据文献记载，明清时代，汉文史籍将先前的“仡伶”“仡佬”等人群称之为“峒人”“洞蛮”“洞苗”“洞民”或“洞家”。民族学家研究认为，侗族地区多山洞，古时有人住洞中，故称其人为“峒人”。其实，在溶洞成群的贵州高原上，曾以山洞为“家”者远不止侗族。从古至今，贵州大地，都有“洞居”，这是“喀斯特文化”的一大特点。令人不解的是，侗族地区许多地方，不管有洞无洞，一律称之为“洞”，诸如邦洞、贯洞、消洞、朗洞、婆洞、彦洞、翁洞、停洞、往洞、石洞、顺洞、育洞、坑洞、凸洞、样洞、尚洞、肇洞，等等。至今，人们依然习惯地把黎平、榕江交界以“肇洞”（即肇兴）为中心的众多侗族村寨称为“六洞地区”，把从江、榕江、黎平交界以“往洞”为中心的众多侗族村寨称为“九洞地区”。

二、把展厅打造成“侗寨”

贵州侗族，分为“南侗”“北侗”两大部分，这主要是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有语言、风俗、建筑、服饰等方面的差异。南部侗寨建房有个规矩，即围绕鼓楼修建，犹如蜘蛛网，形成放射状，强烈体现民族内部的凝聚力。鼓楼是“南侗”特有的一种民俗建筑物，在侗族村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侗寨鼓楼，历史悠久，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功能独特，数量众多，十分集中地分

布在黎平、从江、榕江一带的“六洞”“九洞”地区，迄今尚存400余座。侗寨鼓楼，形似一棵大杉树，侗族村民习称“遮荫树”。由此可见，鼓楼是从杉树演变而来的，实为仿生学在民族建筑中的具体运用。侗族民歌唱道：“未建侗寨先建楼”，可见历史之悠久。文献资料称：“侗人居溪峒中……春以巨木埋地作楼，高数丈，歌者夜则缘宿其上。”这是较为原始的鼓楼。经过若干年代的发展，侗寨鼓楼在保持“遮荫树”造型的基础上，工艺大大提高了。楼面上、楼脊上、翼角上、封檐板上，特别是一、三重檐之间的醒目部位，大量彩塑、彩绘极富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场面及各种吉祥物造型。一座座鼓楼，一个个画库，堪称民俗文化的瑰宝。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从江“增冲鼓楼”，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得知，侗族建筑不仅外形美观，工艺精湛，社会功能尤其丰富。可以说，社会功能是侗族建筑文化的精髓。侗族建筑的社会功能，全方位地反映侗族村寨的风土民情。如果只展出侗族建筑的照片、图纸、模型，没有民族文物和民俗活动，体现不出侗族建筑的社会功能。因此决定，除了展出大量彩色照片和精致建筑模型外，还征集侗族民族文物进行展出，组织侗族青年表演侗族歌舞，演示“行歌坐月”、对唱大歌、纺纱织布，努力把展厅布置成“侗寨”，让观众亲身感受到，进入展厅犹如进入“侗寨”一般。“进寨”之前，先聆听“拦路歌”，品尝“拦路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开幕式上改变剪彩惯例，按照侗族“进寨”习俗，在高昂浑厚的莽筒芦笙声中，

左：韩念龙（左2）在展厅内踩歌堂

右：胡乔木在开幕式上喝拦路酒



喝侗族姑娘敬献的牛角杯“拦路酒”，令人耳目一新。由时任中国外交学会会长、贵州籍外交家韩念龙率领的外国驻华使节，在展厅内的“鼓楼坪”上与侗族青年手拉着手“踩歌堂”，场面极为热烈。看完展览，离开展厅，侗族姑娘给来宾悬挂彩蛋。

现在看来，《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就是侗族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展示，只不过当时尚未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罢了。

三、荣膺“国宝”有点偶然

为了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我多次深入从江县一个叫“高增”的侗族村寨考察。一次，行进在村中石板路上，不经意间发现有块长方形的小石板，觉得不同寻常，弯腰翻开一看，但见上面刻有5个身着短裙的妇女人像，手拉着手跳舞，分明是在“踩歌堂”。“踩歌堂”，侗族称“哆耶”。开展这种集体活动时，众人手拉着手，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人领唱，众人附和，最后一句都是“耶荷耶”，于是便有了“哆耶”的称号。“哆耶”，可直译为“唱耶歌”，其实就是“载歌载舞”的民俗文化活动。我将这块石刻，搬到鼓楼内存放。我知道，按照侗族习俗，鼓楼内的任何物品都是不能随意拿走、损坏的。

这块“侗族踩歌堂石刻”，后来被我派往“高增”侗寨征集文物的简菊华同志带到贵阳，并带到北京，在《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上展出。按照《关于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商谈纪要》条款的规定：

“展览结束后，所有展出实物原则上由民族宫收藏，并支付经费。”简菊华同志是贵州省博

物馆的退休老专家，有着丰富的文物博物馆学知识，她建议我留下“侗族踩歌堂石刻”，带回贵州收藏。征得北京民族文化宫同意，我们如愿以偿。我想，如果简菊华同志没被邀请参加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或者她没能慧眼识珠，建议带回贵阳，那么，贵州省博物馆就缺少一件很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一级文物了。“一级文物”是由国家文物局指派的专家组到贵阳实地鉴定认可的。而且是“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位专家不同意，就不能成为一级文物。由此可见，“侗族踩歌堂石刻”荣登“国宝”殿堂，实属非常不易，却也有点偶然。

这件“侗族踩歌堂石刻”，是作什么用的？当时并不清楚。1998年，我到“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故里荔波县一个叫“水浦”的水族村寨考察“石板墓”，在一座杂草丛生的二层墓体石板上，发现一块类似“侗族踩歌堂石刻”的石头。我知道，侗族与水族同源，语言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风俗习惯也有相似之处。从而推断，“侗族踩歌堂石刻”可能是古墓葬或土地庙（侗族称为“萨玛”“萨岁”“圣母祠”）建筑上的石刻部件。不过，如今水族民间舞蹈中，只有“斗角舞”（斗牛舞）、铜鼓舞、芦笙舞，没有“踩歌堂”。

“水浦石板墓”是明代墓葬，说明300多年前，水族与侗族一样，流行“踩歌堂”活动。类似活动，国内有的少数民族叫“踏歌”，而与侗族、水族交错杂居的苗族村民，则称为“踩铜鼓”“踩芦笙”。总之，都是踩着音乐的节拍（史书称为“顿地为拍”），有节奏地跳集体舞。^①

（作者单位：原贵州省博物馆）

左：侗族踩歌堂石刻

右：水族石板墓上类似踩歌堂石刻



黔东南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的保护与传承

文 / 喻诗涵

黔东南是贵州省土家族人口最聚居的地区，有130多万人。其传统村落建筑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家族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精粹、民族文化的家园，也是土家族留下的具有传世价值的宝贵遗产。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保护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就是保护土家族历史文化和传承土家族乡土精神，保护土家族文化的多样性。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正在快速地消失。本文就如何保护和传承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谈一点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一、黔东南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保护现状及特色

（一）黔东南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保护现状

一是通过普查完成了272个土家族传统村落的信息录入工作。二是通过组织申报成功将54个土家族传统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三是启动了对土家族传统村落的规划编制工作。四是依托土家族居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了江口云舍、沿河南庄、印江团龙、思南黑鹅溪、德江朝阳等土家传统

村落。

（二）黔东南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特色

一是讲究龙脉风水。选址考虑来龙去脉，依山傍水，避风向阳。这种具有趋利避灾、适宜人居的风水布局，充分体现了土家人尊重、顺应自然，适应环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二是以走马转角吊脚楼为代表的土家民居建筑独具异彩。土家传统村落中的封火统子、吊脚楼等民居建筑和祠堂、风雨桥等公共建筑，包括精心砌筑的寨门、寨墙、青石板路等，都充分展示了当时土家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特别是以走马转角吊脚楼为典型代表的土家民居建筑更是艺高一筹。它博采我国木构建筑穿斗式、抬梁式的优点，整个构架均以榫卯相连，无钉无楔，集美观、坚固、实用于一体。其外形和内部结构都呈现出恰到好处的比例关系和分层次有序变化的对称，具有静中见动、动中趋向统一的灵巧多变的均衡感。这种求动态、多层次、高水平的对称均衡，把吊脚楼推上了美的典型形态，显示出超拔、风雅和流畅的形体风格。不少专家认为：土家吊脚楼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文化现象，犹如一部传世的史诗，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出土家族的历史发展、文化心态和创造才能，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独

具异彩。三是建筑点缀和色彩融合雅致。在建筑点缀上，土家民居屋面屋脊讲究“三翘”，即屋脊两头翘、前后檐两头翘和人字面两面翘。屋脊常用青瓦叠砌成不同造型，中脊筒式砌为“品”字型等，讲究的为鼓锣圈（铜钱花）、梅花形、对鸟形等，精致美观。在建筑色彩方面，大多保持木质本色，外涂桐油防潮防腐。有的在木房外涂上颜色，一般为红板壁、黑柱枋，大门上方白色竹编粉壁，深灰青瓦，白色檐口。封火统子以黑、白、灰、褐黄色为基本色调，深灰色青瓦面，灰色砖墙面，白色砖缝线、白色窗框及白色墙边框，配以褐黄色的木质，色彩十分和谐雅致。四是雕花精美。比如，花窗简单的多以几何纹花格图案，如三滴水、冰凌花，或方园交错；窗格子多用“万字格”、“田字格”等。精美的花窗主要为浮雕和镂雕，雕刻手法细腻，内容丰富多彩，多为虎、蝙蝠、鹿、桃、祥云、仙辈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形象逼真，构图巧妙，既美观，又寓意吉祥，是自然与人文思想结合的艺术画廊。

二、黔东北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保护传承存在的问题

（一）自然性损毁不断增多

传统村落建筑的木质或土（石、砖）木结构，极易在自然作用下老化，保护维修费用有时甚至比盖一栋新房成本还高，除极少数历史文化名村得到保护外，相当一部分传统村落建筑仍“散落乡间无人识、无人管、无人修”，处于苦不堪言的自毁状态。加上近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不少传统村落逐渐变得人烟稀少，人走楼空，一些古民居自然颓废，令人痛心。

（二）拆旧建新自建性破坏日趋严重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农民在原地拆旧房建新房比较普遍，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古民居和民族特色建筑被拆旧建新。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木梓岭村曾是铜

仁市最大村之一，号称“千户土寨”。近些年来，由于大量拆旧建新，古香古色的老宅已经不多了。

（三）工程建设性破坏不可忽视

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变成“新村庄建设”，把依山傍水、古朴宁静的村落推倒重新规划，建起了整齐划一的新砖房，使传统村落格局风貌和乡土建筑遭受极大的破坏。同时，移民搬迁，也使不少传统村落在迁移中消失。历史上很有名气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思渠、淇滩三个古镇，在彭水、沙陀电站库区整体搬迁中，由于注重土家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不够，新建三个镇的历史文化记忆明显下降，土家传统建筑特色被不同程度削弱。

（四）急功近利商业性破坏正在蔓延

一些地方盲目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把古迹当景点，把遗产当卖点，将传统村落变成赚钱的新路。对传统村落建筑的维修质量粗糙低劣，随意改变原生态文化的真实性，甚至擅自进行迁建、移建等。有的大搞村容整治，使一些乡土建筑原有的生态环境、历史风貌格局被肢解、破坏；有的为“装门面”，搞“穿衣戴帽”，真文物活生生被修成了假文物；一些文物贩子到村落购买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物建筑的精美木雕构件、门窗，也无人过问。

（五）投入不足，重视不够

给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带来诸多困难。比如：《文物保护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条例》没有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作出明确要求。行政体制存在“多头管理”缺陷。目前，村镇的建设、规划，自然遗产由住建部门管理，物质文化遗产由文物部门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门管理。传统村落具有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应该说三个部门都该管，但至今没有明确哪个部门专门负责。一些地方由于领导认识不够，地方财政对传统村落保护投入严重不足，使得众多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缺乏保护经费。

三、关于黔东北土家族传统村落保护传承的几点建议

随着黔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和村镇居民收入增加，村民建房也必将进入新一轮高潮。抓紧对现存的土家族传统村落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不我待。

（一）坚持保护优先，切实加以保护

一是实行挂牌保护。深入搞好传统村落建筑的普查、编号、建档等基础工作，编制县一级的保护利用规划，对已列入规划的传统村落建筑实行挂牌保护。二是要保护传统村落历史遗存。传统村落历史遗存是传统村落的主要标志，必须下决心保护好。保护的经营范围包括古民居、祠堂、小巷、水巷、青石板、白粉墙、庭楼、凉桥、历史遗址和古树名木等。三是要保护传统村落的风貌、自然环境、山水风景、民居风格。民居风格，包括民居的高度、体量、色彩、外貌形式等。四是要保护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坚持规划先行，切实加以管理

一是尽快制定保护发展规划。针对不同传统村落的具体情况，科学编制保护发展规划，规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区域范围、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等。建设控制区要严格限定改造区域，严格保存传统村落原有肌理，建设有“根”村落；严格限定拆迁范围，限定建筑风格、高度、密度、色彩等控制指标。对历史悠久、文化价值高的传统村落，要单独编制保护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原真性保护。二是规划要彰显传统土家族文化。要根据地域特征，把当地土家族传统村落、古民居的布局、风格传统、历史形制、雕刻彩绘技艺等文化特征，充分融入到规划的各个具体环节。三是要把传统村落建筑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力争使现存的传统村落建筑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三）坚持完善政策，切实加以扶持

一是建议地方各级政府联合建立专项扶持资金。中央和省里虽已专门安排了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扶持资金。但仅靠中央和省里的扶持资金是不够的。建议市、县（区）政府联合建立专项扶持资金，每年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二是探索和建立市场运作方式筹资。由政府牵头，理顺关系，通过土地、房屋产权的置换或租赁等方式，鼓励、吸纳多种资本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三是建议出台传统村落保护用地置换政策。妥善解决因保护古建筑原有风貌而产生的安置原居民外迁的土地置换需求。

（四）坚持突出重点，切实加以建设

一是要明确抓重点传统村落。要把土家历史文化厚重、乡土建筑价值高的传统村落作为打造重点，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二是协调各方，大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大力加强以路、水、电、讯为重点的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农村危房改造为契机，不断改善居民的居住、卫生条件。开展传统村落火灾和其他重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改造老化电线、增添消防设施，坚决防止火灾和垮塌事故的发生。

（五）坚持加强领导，切实加以落实

一是各级领导要提高认识。传统村落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各级领导务必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保护传统村落的自觉性、责任感。二是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传统村落保护传承机构。负责辖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重大事项决策、重大问题处理，全面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各项工作。三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落实主抓部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存在多头管理的弊端，一些地方，往往出现“大家管大家都管或没管好”的问题，对工作很不利。建议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落实主抓部门，并明确主抓部门的责任，实行目标管理，制定奖惩措施。四是各级政府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各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❶

（作者单位：铜仁华友机动车检测中心）

雷公山区苗寨的桥文化

——以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文 / 图 毛 祥

自古以来，桥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最常见的通行设施，桥在西江当地中苗语称为“玖”。提起桥，现代的城里的石拱桥及铁路公路桥和立交桥已为人们司空见惯，但过去在交通不发达的乡村，在深山区的河流及小溪流中修建了众多木桥、小石桥，这些桥自古以来不但为人们出行提供了便利，而且桥的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

苗族的灵物崇拜在雷公山的苗族聚居区以祭桥较为普遍。苗寨的桥从材质上看主要有木桥、石桥，从类型看有寨桥、风景桥、求子桥、保子桥等，从建筑投工上看有的是

一家人建的、有的是房族建的、有的是全寨共建的、也有邻寨合建的。自家架的桥有独木桥，也有用三或五根杉木架成的桥，无论是独木桥或三、五根杉木架的桥主要是求子、保子和供人行走；房族合架的桥要比家人建的大，用杉木三或五、七根架成。其作用，一是便利交通、农耕，二是保子、期望人丁兴旺；寨桥，由全寨合建，它不仅跨度大而且桥面宽，用瓦或杉树皮盖顶遮雨，桥身有靠背栏杆等装饰物，桥的一头还立有土地庙。寨桥一是供人畜行走及人们在劳动之余憩息和娱乐；二是起到点缀山寨风景，供



山溪上的木桥

人观赏；三是为了护住本寨的龙脉，祈求保护全寨平安。人们每年都要祭桥，家庭架的桥用鸡鸭鱼祭，房族架的桥用猪头祭，全寨架的桥则用水牯牛祭。

一

西江苗寨最早的祖公虎飞贤带领着族人顺着都柳江而上，来到方西（今贵州省榕江县境内），又过小丹江，最后到达雷公山上的雷公坪定居下来。传说虎飞贤祖公的两个儿子卯虎飞、寅虎飞兄弟在一次打猎中意外发现了西江这块风水宝地，于是他们又领着族人从雷公坪迁徙到西江安营扎寨，经过千年的繁衍生息，西江发展成为由羊排、东引、也东、平寨，也通、欧嘎、南贵、也蒿八个自然村寨组成的而今多达1432户、6300多人的千户苗寨。

西江苗寨低洼之处有一隔断南北的白水河，为了使两岸村民来往方便，村民们先后在白水河上修建了7座桥。根据传说及地名，这些桥分别称为锁龙桥、甘南娇桥、甘南帮桥、神龙滩桥、南贵桥、阳丹桥、嘎南方桥，其中的神龙滩桥、甘南帮桥、甘南娇桥、锁龙桥是西江苗寨的古桥，其余的3座桥是20世纪80年代后修建的。这7座桥2008年以来先后又改建成风雨桥。传说从前神龙滩桥下有一3米多的深滩，里面有一溶洞，洞中有一条龙，因桥建在龙滩上而以得名“龙滩桥”，苗语称为“哿喻玖”。龙是中国古代图腾的一个缩影，虽未有人亲眼目睹，但它是美好吉祥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图腾崇拜之一。雷公山地区还有招龙节，苗族村寨的男孩中取苗名为“龙”（苗话称龙为“喻”）的不少。关于龙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龙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总是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西江的神龙滩是白水河溪流苗家人心中的一片图腾净土，你过了神龙滩，再慢慢品味所蕴涵的文化底蕴，也许就心有所悟：原来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现在西江汽车站旁的神龙滩桥称为一号风雨桥，是平寨村民的生产生活通道和通往乌尧、黄里、雷山方向的必经之路。1976年由于修雷（山）西（江）公路，才改建成机动车辆通行用桥，2008年在公路桥基础上加修廊桥。此桥在西江风雨桥中规模最大，中间可供二辆车通行，两侧是人行道，并修有“美人靠”，在桥上可观赏西江梯田的美景和古老的碾房和水车。

甘南帮风雨桥（二号风雨桥），是欧嘎村民通往西江古街赶集走亲访友的通道，也是通往排乐方向的捷径之一。此桥的对岸原有一口常年清水汪汪的古井，井上建有一个亭子，井里放养有数条小鱼。此井提供了平寨、欧嘎两岸村民的生活用水。

阳丹风雨桥（三号风雨桥），是当地政府21世纪初为新建的西江中学师生提供方便而修建。

嘎南方风雨桥（四号风雨桥）专为也蒿寨脚未搬迁前的西江中学师生提供便利，于上世纪80年代修建。

甘南娇风雨桥（五号风雨桥），人们常称也东桥，是一座古桥，是南贵、也蒿村民来往西江古街赶集、农副产品交易、走亲访友及根敢、营上、连城、白碧、龙塘、北建、乌烧、摆底、排乐等村寨群众来往西江、台江的通道之一。

南贵风雨桥（六号风雨桥），这座桥

西江白水河上的风雨桥



是为发展旅游而修建的，该桥小巧玲珑，因处于南贵村而得名，连接着南贵的大寨和小寨，此处原来没有桥，主要靠石头搭木板过河，此桥2008年修建，2015年6月23日被百年一遇的洪水冲毁，2016年予以重建。

锁龙风雨桥（七号风雨桥），位于现在的西江民族小学下方，也是西江的寨尾桥，自古以来是通往乌利、格细、挂丁、凯里方向的唯一通道，是西江苗寨最古老的桥梁之一。有风水先生称，西江就像一条龙，东引、羊排是龙头，南贵山（也更觉和也仰）是龙尾，而锁龙桥正处于龙尾，把也更觉和也仰两座山连接起来，西江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龙。锁龙桥也称为拦龙桥或护寨风雨桥，该桥在西江人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了这座桥，象征着把吉祥物——龙拦住，防止龙顺河游走，让龙保佑西江苗寨男女老幼生活美满、健康长寿、多子多福、风调雨顺、年年丰收，永保世代平安……又由于桥的西岸长有一棵千年古树——香樟树，因树体高大、枝叶繁茂，所以又将此桥称为香树桥。原来这座桥是平桥，由于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寨老们为确保村民来往安全，决定重建这座古桥。通过全体村民集资，尤其是在外工作的西江籍人士大力捐助和上级部门的支持，投入近18万元重建，于2008年3月9日竣工，从此圆了西江村民重建锁龙桥而护寨安民的愿望。

3月9日正值农历二月二日的苗族祭桥

祭桥活动现场



节，当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备好糯米饭、红蛋、酒肉等贡品，争先恐后来祭桥，分享桥给大家带来的福气。下午三时许，由各村德高望众能说会道的寨老身着新装进行游桥活动仪式。人员分成两组，分别站在桥头的两端，然后各组寨老向着对岸行走去，其中各组寨老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念一些吉祥之类的话语，其余村民则站在河岸两边大声附和。走桥活动结束后，全体村民又在西江民族小学下面现停车场一带杀猪、宰鸭，放烟花、喝酒划拳，共进晚餐。游客过路驻足观望，有的应邀参与用餐，隆重而热烈。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

同年秋季，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如期举行，从此，拉开了民族文化乡村旅游助力村民脱贫致富的序幕。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1700元增长到2018年的20000多元，旅游业已成为西江苗寨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西江苗寨10年化茧成蝶的历程，展现了乡村振兴的成效，成了乡村旅游战略的先行典范。

二

除依河而建的桥外，在西江周围的深山及村寨中还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桥，例如寨头路旁大树下为人们提供歇凉而建的“板凳桥”，山坳树脚下的“木凳桥”、苗寨自家住宅的“堂屋桥”和“进屋桥”，深山里的小木桥、小石桥、田坎排水处的小木桥等。小的桥长、宽只有几尺，大的长、宽可达一米至数米。这些不同类型的桥既有不同的功能作用，又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其共同的目的是为来往的行人提供便利。如“生命桥”是孩子出生时为保佑孩子易养成人而铺设的堂屋桥、进屋桥、板凳桥和在人们通行较多的某路段河上，深山中修的小木桥、小石桥。逢年过节，寨上的人们就成群结队来祭拜这些修建在深山小溪上的桥，以祈愿平安、幸福。而且架设在寨头路旁和山坳大树脚下的那些板凳桥及深山小溪上的小木桥、

小石桥，一般是在黎明之前或夜幕降临之后很少有行人来往时铺设。村民为了修阴积德而做善事，一般都不让他人知道是谁修的桥，这样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发现桥已铺架或更换了新桥。

堂屋桥在苗族村寨中，几乎是家家铺设有。每当家中有事便去祭拜自家的堂屋桥，祈求祖先神灵护佑。“接龙桥”，顾名思义，通过架桥把龙脉接到寨上来，以保佑村寨人畜兴旺，四季平安。

在苗族地区，从古至今架桥特别讲究风水，一是选择山脉（龙脉）得旺的山形；二是无论所架设桥的大小，必须是行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苗家人认为，架桥主要是为人们提供方便，修阴积德；其次是为了给自家带来好运，特别是希望子孙后代健康长大成人。过去苗家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长期封闭而落后，且缺医少药，出生的幼儿生病死亡率高，有的人家虽生育了五、六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二、三人，甚至更少，所以特别注重养育子女，希望他们易养成人，因而特别重视修桥补路以修阴积德得到护佑。

祭祀桥自古以来是苗家人的一种习俗。有的苗族人还把“接龙桥”架设在半山腰横跨小溪河两端，紧靠山麓上，深山沟里这些桥在西江苗语称为“玖纳娄”。每逢农历二月初二祭桥节、吃新节、苗年那一天，人们纷纷来到桥旁杀鸡宰鸭，将禽血洒于桥面和桥头，并摆下各种祭品，以求家和福兴，五谷丰登。

“板凳桥”西江苗语称“玖当”，此桥一般用杉木搭建，是长约150厘米，宽约20厘米，高约40厘米的木凳桥。建桥时直接将桥钉立在寨头右树脚下和路旁山坳上的树脚下，以供来往行人坐下休息。从桥名可以得知，此类桥的作用主要为行人提供休息的设施。在苗族山区，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来推算或通过巫师占卜来推算，“八字”不好或品行端的人，需要拜祭树根或架设板凳桥以积德行善，否则将家人得不到安宁和幸福。

这些现象正是苗族人对自然崇拜与信仰的表现。苗族人认为奇山怪石、古树都有神灵，以做好事、做善事来祈求神灵护佑。若夫妻多年不生育或小孩生病，一般要拜寄生命桥为“桥爹”、怪石为“岩妈”或古树为“树爷”，以求保佑生育儿女或让新生儿女健康成长。

“堂屋桥”，西江苗族称“玖这”，它一般是用三根小杉木条铺在自家的堂屋里，这是为增添人丁而修建的小木桥。苗族村寨多为吊脚楼房，若堂屋设在楼上，“堂屋桥”则铺在靠近楼板墙上，若是堂屋设在楼脚，“堂屋桥”则铺在靠近大门的地上。苗族人认为，小孩从地下冥冥世间过桥而来，冥冥世间与人世间相隔一条河，河那边长满青青小草，阳光普照，小孩子们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要是不小心过谁家的桥到河的这边来，就会到他家投胎为人。于是苗家人为求子求福，添口添丁，便在堂屋里铺桥。如是有意铺设“堂屋桥”之后出生的孩子，对其新生男孩取苗名一定与桥有关，如“玖生”“玖道”“玖沙”“玖福”“玖保”“玖所”“玖往”等。因此，在苗寨里有很多人的苗名相同，而且大多带“桥”或“木”。

深山苗寨架桥所用的材质多为杉木、枫木，尤以杉木为多，而枫木耐腐蚀性强而多用作桥柱。苗族人认为，杉木平直，所代表的是子女多，会繁荣昌盛，杉木树干直，材质好，便于造桥架桥。从苗族人对自然物的崇拜特别是对桥的崇拜与信仰来看，桥在深山区的苗寨，不仅仅是交通设施，还是人类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的源泉。因而，桥被苗族人寄予生命的力量，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有的苗寨，凡小孩得了病，便要请人去祭桥，认桥为小孩的保护神，有的孩子还拜寄奇山异石为“岩妈”，逢年过节或孩子生病时均要祭供，以祈求“桥爹”“岩妈”护佑。可见桥和奇山异石在苗族人的心灵和信仰中的崇高的地位。面对苗族在生产生活中围绕自然物崇拜进行的宗教活动，不能简单

地认为迷信、愚昧，这种活动其实是一种对自然的崇拜，是苗族人自古以来的一种精神寄托。

三

西江风雨桥下的白水河清澈见底，日夜不停地向北流去，汇于不远的巴拉河、清水江，流入洞庭湖，直奔长江，归于东海，渗入那无边无际大海的怀抱。时值初冬，河水流量很小，裸露出了河滩，形形色色大小不同的鹅卵石静静地躺在河滩上，静静地依偎着河水，回望着相伴与它一起走过许多岁月的西江古桥。每到丰水期，河水上涨时，它们就悄无声息地沉入水下，默默地期待着与桥相见的那一瞬间。初冬时节，大多鸟类已经南归，在西江白水河这平静的河面上，见到一群白鹤在河面飞来飞去，只从河堤上远望，不去打扰这些生灵的自由和静候，让它们与水、桥相依相存。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真实体现，它添增了深山里的苗寨景色。

这些平凡而富有民族气息的桥自从建成之时起，不知道迎来送走了多少的行路人。每天依旧迎着东方朝阳、送走西山的落日，当最后一抹余晖散去，这些桥又静静地皈依在幽深的夜色中，拥入大自然的怀抱，这是不争的坚守和漠然。在这些桥曾经送走西江苗寨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外出求学，投身国家建设、外出谋生、参军参战中。早期从这里走出一位胸怀大志的苗家少年，他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10月）的欧嘎村，12岁从家乡的桥上走了出去，踏上了离别故乡赴外地求学之路，从此，这位有志之仕再也没能到故乡的桥上走一走，家乡的桥、家乡的景，还有家乡的人成为对他永远的记忆。他就是早期典型的苗族知识分子及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一·二八”抗战、赴缅抗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当代苗学研究的前驱和奠基者之一的梁聚五(1892—1977)。随着

西江苗寨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昔日的平桥改建成今天的风雨桥，这些风雨桥从结构上看，大多以钢筋混凝土建成拱桥或河中间有桥墩架成的风雨桥，有的桥墩上贴青石片或鹅卵石，然后在桥面上用杉木修建了二至三层的廊桥，用作遮风挡雨、休闲纳凉，有的还在廊桥上雕龙刻凤等，其工艺精细考究。在建筑风格上鉴借了苗族吊脚楼技艺，穿斗挑梁不用一钉一铆，过道两旁有美人靠，供人们休息、观景，微风吹来，特别惬意。桥屋面多分为三层，盖小青瓦，错落有致，屋檐角微微上翘，如神鸟欲飞，慰为壮观。在横梁上挂有马灯，屋檐上安有彩灯，一般以蓝色和淡黄色为主，不同于城市霓虹灯的繁华喧闹，显得桥外清静自然，每当夜幕降临，彩灯就像一串珍珠玛瑙，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烁，倒映在河面上，美伦美焕，给平静的河水增添了一道风致。倘若此时，当你行走在风雨桥上，或在风雨桥上伫立，不由感慨，人受到了桥的恩惠，桥受到了人的虔敬和由衷的膜拜，这是一种怎样的意境……

西江苗寨的桥充满历史厚重感，与水中的倒影相融合，构成了一幅幅对称而美妙的画卷。桥从远古历史建成之日起，不但给村民和行路人带来莫大的便利，更为西江千户苗寨这个古村落增添了亮丽的风景。夜色茫茫，风雨桥上的彩灯亮了，给人一种既朴实而又温馨的感觉。年复一年，西江风雨桥像巨人一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守望着西江苗家人和行路人，守望着两岸的村寨和田园风光，守望着西江景区的万家灯火。文

（作者单位：雷山县民族中学）

清水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

文/图 杨 洪

发源于都匀市苗岭山脉斗篷山北麓中寨的清水江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沅江（沅水）的主源；在都匀称剑江，都匀以下称马尾河，至岔河口汇入重安江后始称清水江，至湖南黔城汇入溇阳河后称沅江。省内干流河长452.2公里，主要流经都匀、麻江、凯里、台江、剑河、锦屏和天柱等县市，其主要支流有重安江、巴拉河、南哨河、六洞河和亮江^[1]；本文所指清水江下游主要为清水江锦屏至天柱段及其支流亮江。迄今，在该段水域江面两侧阶地上发现并发掘十余处旧石器至明清时期遗址^[2]，其中有七处遗址的主体文化面貌为新石器时代遗存。鉴于部分发掘材料的刊布，使得我们对流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探讨变得可能。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已发掘并刊布资料的遗址为基础对其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进行论述，以期对其进行分期与年代、文化性质及与周邻文化关系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遗址分析

目前所知，流域内有新石器时代堆积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下游锦屏至天柱段，属峡谷地貌，河谷深切狭窄，其间在部分河段可见

傍河台地，而遗址就分布在这些河流两侧地势较为平坦的一二级阶地之上，以及两河交汇处的三角缓坡地带。主要有培芽、亮江、坡脚、月山背、学堂背、辞兵洲和盘塘等遗址，以上遗址尤以坡脚和盘塘的材料最为丰富，文化面貌也最具代表性。但部分遗址刊发材料较零星，且繁简不一；为全面厘清其文化面貌，我们有必要对上述遗址在此再行梳理。

1. 培芽遗址

遗址位于锦屏县三江镇亮江村培芽。2010年发掘100平方米确定第~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遗物皆打制石器，种类有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碎屑等，采用锐棱砸击



遗址位置示意图

1. 培芽遗址
2. 亮江遗址
3. 月山背遗址
4. 坡脚遗址
5. 学堂背遗址
6. 辞兵洲遗址
7. 盘塘遗址

法和锤击法打片，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盘状器，以砍砸器数量最多，刮削器次之^[3]。

调查时在断面采集到陶片的地层土色与第层相近，推测其年代应与发掘区地层相近，为新石器时代堆积；遗址中的石制品和陶片特征较原始和粗糙，推测其年代可能偏早。

2.亮江遗址

遗址位于锦屏县三江镇亮江村亮江组，亮江与清水江交汇处西侧的台地上。地层属新石器时代堆积，遗物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凿和极少量夹砂陶片。

打制石器以石片、断块和碎屑为主，少量砍砸器和刮削器，采用锐棱砸击法和锤击法打片，反向加工石器为主；磨制石凿器形偏瘦长，平面略呈长方形，弧形刃，刃宽2厘米；陶片火候较低，黄褐色陶，较碎，器形不明^[4]；IIT0103层出土陶片碳十四测年距今8800±45年，树轮校正后为距今9875±275年。

3.月山背遗址

遗址位于天柱县远口镇鸬鹚村，清水江西岸的一级阶地上。2009年发掘清理出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出土石制品90余件。皆打制石器，包括有疤砾石、石片、石核、砍砸器、刮削器和盘状器，以反向加工为主^[5]；在该遗址贵州省考古所曾采集过磨制石器，月山背遗址所出石制品的特征与坡脚、学堂背遗址基本相似，其年代应大体相当。

4.坡脚遗址

遗址位于天柱县远口镇坡脚村，月山背遗址以北约3公里，清水江西侧的一级阶地上。2004年贵州省考古所进行试掘，清理出房屋柱洞、灰坑等遗迹，出土较多陶器和石

制品^[6]。2009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对其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出灰坑、灰沟和石堆遗迹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坡脚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7]。

遗物包括石制品和陶片，陶片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极少；陶色有红、红褐、灰黑、褐、黄褐、灰褐、青灰、灰白和黄白等，纹饰以绳纹为主，戳印小（长）方格纹次之，常见戳印小方格纹组成条状纹和各种形制图案，还有部分弦纹、划纹和兽面纹等；可辨器形有钵、罐和釜等。

石制品分打制和磨制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包括有疤砾石、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盘状器、尖状器和修背石刀等。磨制石器较少，有石钺、釜、镞、凿等，形体较小。

2004年试掘所出圜底钵（04TPH5：29）与湖南松溪口D型罐形钵（T3：5）形态除偏矮胖外，余皆相似，为侈口、卷沿、直壁、圜底，口沿下拍印弦纹，推测其时代应大体相当；松溪口贝丘遗址T2层木炭碳十四测年代距今6340±90年，树轮校正后为距今6950±115年^[8]，因此，坡脚遗址H5的年代应大致相当于高庙下层文化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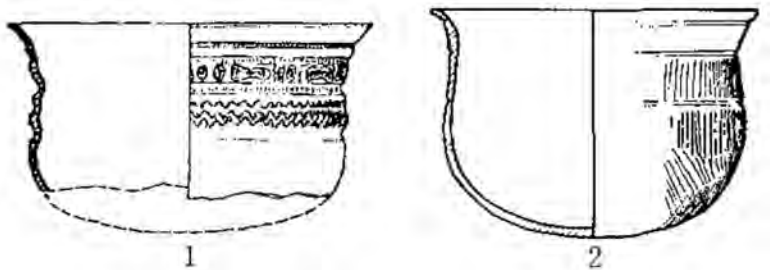
5.学堂背遗址

遗址位于天柱县远口镇中团村清水江东岸一级阶地上，坡脚遗址以东约1.8公里；遗址出土近1300件石制品和少量陶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陶色以褐陶为主，红褐和灰黑陶次之，少量青灰、红、黄褐、黄白、灰褐和灰白色等，新出现少量黑皮陶。素面为主，凸点纹和绳纹在纹饰中较为常见，有极少量戳印、刻划纹和镂空等，器型见圈足器、釜和罐等。石制品除一件磨制石镞外，余皆打制石器，其特征及打制技术与坡脚遗址相近，但从陶器特征推测其年代应较坡脚遗址晚^[9]。

6.辞兵洲遗址

遗址位于天柱县白市镇，小地名为辞兵洲的江中孤岛，2010~2011年分两次在其东部一级阶地上分两区进行发掘。I区第一层

陶器对比图
1.圜底钵（04TPH5：29） 2.D型罐形钵（T3：5）



为新石器时代堆积，出土少量夹粗砂陶片，饰粗绳纹或素面；石制品以打制石器为主，极少量的磨制石斧。II区发现一处石器加工场，其内堆积有万余件石制品，由石砧、石锤和其周围半径0.5米内密集的石片组成一个加工点，同时并存丰富的砾石原料、半成品和废料等，与其伴出的的还有少量陶片；其年代与I区第层同。

陶片多夹砂红褐陶，多呈鱼鳞状；素面为主，少量细绳纹。石器趋小型，石片极多，采用锐棱砸击法加工^[10]。

辞兵洲遗址内II区第层采集的陶片和炭进行碳十四测年，其树轮校正后年代分别为：IIT0110陶片距今 7495 ± 75 年、IIT0211炭距今 7000 ± 160 年、IIT0311炭距今 10340 ± 100 年；以上三个测年数据，前两个相近，第三个数据较前两个早近3000年；因此，我们推测辞兵洲遗址第~层年代应主要在距今7500~7000年，但不排除存在更早期遗存的可能。

7. 盘塘遗址

遗址位于天柱县白市镇白市村盘塘组，清水江西岸与汶溪交汇处的一级阶地上。开口于第层下的灰坑、沟、柱洞和第一层及其之间遗迹单位属新石器时代遗存^[11]。

遗物包括陶片和石制品，陶片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陶色有红、红褐、褐、黄褐、灰黑、灰褐、灰白和青灰等；陶器皆手制，采用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经慢轮修整；纹饰除绳纹外，还有刻划纹、弦纹、戳印篦点纹、压印纹和圈点纹等，纹饰中最具特征的是由粗细不均的线条和戳印圆圈或圆点构成繁复的图案，包括平行带状纹、连续波折纹、细方格纹、三角形纹、圈点纹、太阳纹、垂幛纹和形态各异的鸟纹等。可辨器型有罐、釜、盆、钵、圈足盘、盘形器、器足和圈足等。

石制品是所出遗物之大宗，包括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磨石等；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钺等，打制石器主要用黄褐色砾石经砸击或锤击法剥片，再经单向或错向加工

成砍砸器和刮削器等器类；石制品种类包括石砧、锤、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核和断块等。

盘塘遗址开口于第层下灰坑出土陶片做了碳十四测年，树轮校正后年代有四组：H5陶片距今 8255 ± 75 年、H18陶片距今 5525 ± 65 年、H19陶片距今 5810 ± 100 年、H24陶片距今 7500 ± 70 年；以上四组测年数据，H18和H19的年代应大致相当，绝对年代约距今5800~5500年，H5绝对年代明显偏早。

二、分期与文化性质

通过上文七个遗址的介绍和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该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材料并不丰富，但其发展阶段性特征还是比较清楚，可进行初步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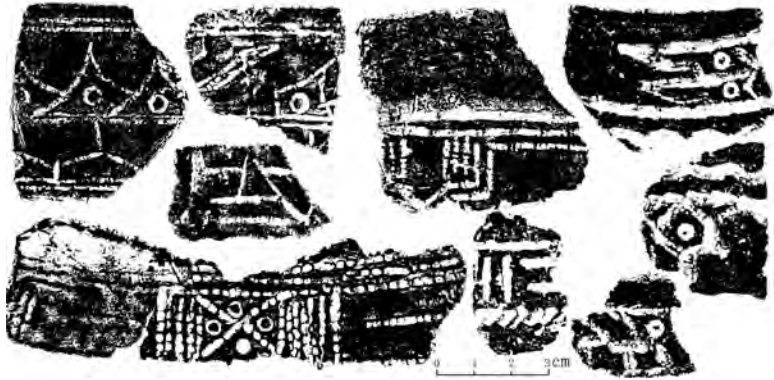
根据遗存的自身特点，结合周边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可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五段（表一）。

表一 遗址分期对应层位关系表

遗址 期 段	培芽	亮江	坡脚	学堂背	学山背	辞兵洲	盘塘
三			□	√			⑤
二	晚		√		√	③ ④	⑥
	早		□				H24
一	晚						⑦
	早	③~⑤ ⑥				□	

（备注：√代表确定存在、□代表可能存在）

盘塘遗址
陶器纹饰拓片



第一期早段：以培芽一层、亮江层为代表。以打制石器为主，极少量磨制石器和陶片；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石制品、断块和碎屑等，采用锐棱砸击法和锤击法打片，石制品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盘状器，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次之，刮削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多反向加工；陶片极少，夹砂陶碎片，火候较低，器形不明，绝对年代距今约9800年。

第一期晚段：以盘塘层、H5等为代表。陶片数量增多，皆夹砂陶，陶色以灰褐为主，少量黄褐和黑褐陶，纹饰有粗绳纹、刻划纹，但器表仍以素面为主；打制石器仍采用锤击和锐棱砸击法剥片，常见器类以石片和砍砸器居多，石器特征与第一期早段大体相似，绝对年代距今约8200年。

第一期早晚段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偏早阶段，遗物主要以打制石器为主，见极少量的陶片和磨制石器，文化面貌与第二期有较大区别，推测应为高庙下层文化西进之前清水江本地的考古学文化。

第二期早段：以盘塘H24为代表。陶片以夹砂陶为主，极少量泥质陶，夹砂红褐陶比例明显增多，纹饰除绳纹外，新出现压印弦纹、带状和波折形纹，可辨器型有圈足盘，绝对年代距今约7500年。

第二期晚段：以盘塘遗址第二期晚段、辞兵洲遗址第一层及II区石器加工场、坡脚遗址和月山背遗址等为代表。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红陶和黄褐陶次之，新出现少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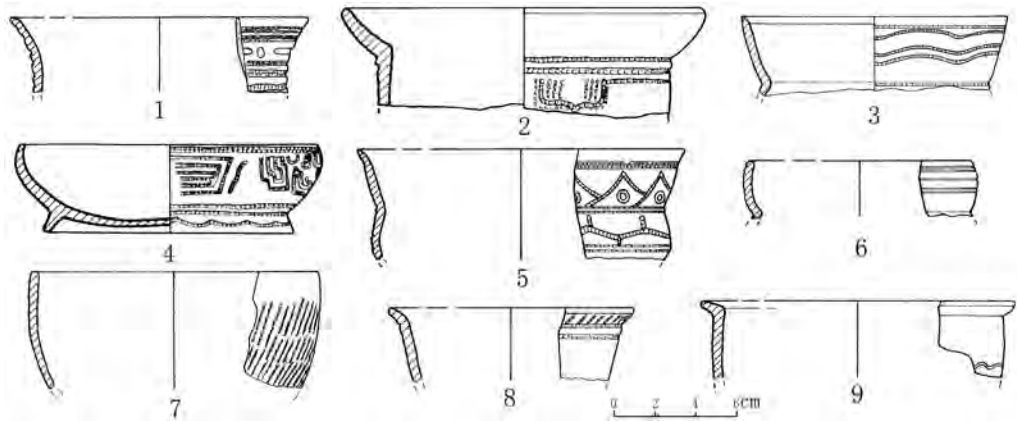
泥质灰白陶，在釜、罐和圈足盘等器物上腹部流行剔刺和戳印篦点纹组成的各种图案，包括变体鸟头形纹、平行带状和连线波折纹及垂幛纹等。器形以圈底器为主，圈足器次之，不见平底器。器类以釜罐为主，钵、圈足盘和盘形器次之。石器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器类主要有石核、石片、石锤、石砧、砍砸器、刮削器和断块等，磨制石器见斧、凿等，其年代下限距今6800年。

第二期遗存早晚段的陶片特征主要有陶器皆手制，泥片贴塑或泥圈套接经慢轮修整，器表常见红褐色和灰褐色相杂，烧制火候不均；以夹砂陶占绝对多数，极少量泥质陶，泥质陶多为白陶或灰白陶；纹饰除粗中细三种绳纹之外，繁缛多样的组合纹饰是其突出特征，多由戳印篦点组合成各种图案，最具代表性的有形态各异的变体鸟纹、平行带状纹、连续波折纹和垂幛纹等，纹饰多施在罐釜钵盘类的上腹部，这些特征与湖南高庙下层文化大致相同^[12]，有观点认为高庙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沅水中、上游地区，上游指黔城以西的沅水河段以及汇于托口的清水江和渠水^[13]，清水江下游发现的这类遗存无疑与其相印证。

第三期：以盘塘遗址第三期、学堂背遗址为代表。陶片仍以夹砂为主，陶色多红、红褐和黄褐，出现少量黑皮陶和外红内黑陶，绳纹数量减少，在颈肩部流行带状弦纹、波折纹、圈点纹及变体凤鸟纹。器类主

第二期晚段陶器

1. Ae型釜（H17：41） 2. Ba型釜（H17：15） 3. A型罐（H17：19） 4. A型圈足盘（H17：3） 5. B型钵（H17：10） 6. Bb型釜（H17：20） 7. Aa型钵（H17：39） 8. E型盘形器（H25：3） 9. B型盘形器（H17：11）（参见《贵州天柱县盘塘遗址发掘简报》）



要有釜、罐、钵、盆和盘，新出现平底器，磨制石器新出现对穿孔石钺。依盘塘遗址第三期H18和H19出土陶片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年代距今5800~5500年，推测第三期年代应在此区间。

湖南高庙上层遗存磨制石器新出现双肩斧，出现切割、穿孔和抛光技术；陶器多手制轮修，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并存，釜罐类器物内壁常见凹凸不平的指窝。陶片以夹砂红褐、红陶和褐陶为主，偶见白陶；有部分内黑外红陶和彩绘陶，器型仍以圈底和圈足器为主，新出现三足器、尖底器和大量支脚，器类有釜、罐、钵、盆、盘、豆、碗和支脚等，在釜、罐、钵类器物的腹部盛行凸点纹、颈部施戳印纹组成梯格、条带状、曲折线、雪花状、麦穗状和雨线状等不同图案，部分泥质红陶宽沿罐施暗红或白色陶衣，高庙上层遗存年代跨度在距今6300~5300年左右，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所处年代大致相当^[14]。

第三期遗存新出现的对穿孔石钺说明当时已出现穿孔技术，少量外红内黑陶和黑皮陶的出现，及纹饰和器物形态上皆与高庙上层遗存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时代处于高庙上层遗存第三期中的中段。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以盘塘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清水江下游第三期遗存属于高庙上层文化遗存，而在高庙上层遗存出土的受大溪文化影响而出现的支座在盘塘遗址中发现一件，但其形制有较大区别，亦未发现诸如筒形瓶、曲腹杯等

大溪文化典型器物的文化因素存在，可能说明大溪文化对清水江流域同时期遗存的影响渐趋减弱。

三、相关问题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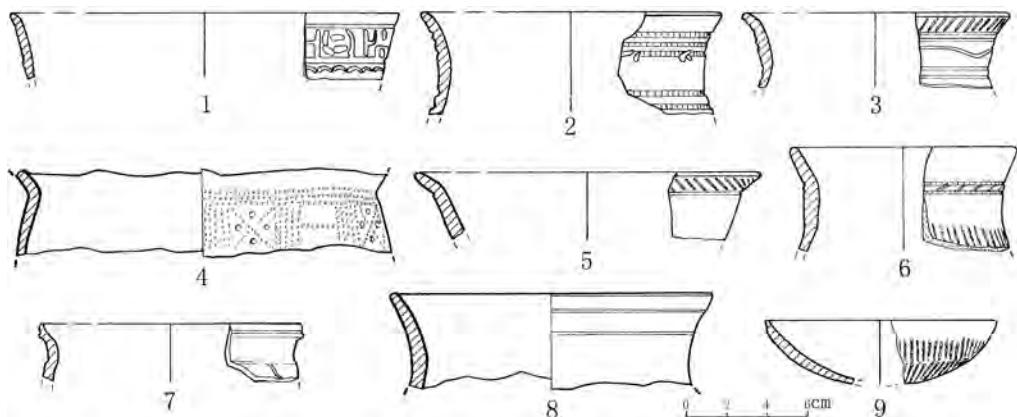
从上文我们对清水江下游新石器遗存的分期与文化性质的论述中，可知其第一期应属发源于本地的时代较高庙下层文化早的考古学遗存，第二期属高庙下层文化遗存，第三期为高庙上层遗存；在时空框架的基础上，我们拟对以下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居住形态

盘塘遗址第IV区开口于第4层下发现一处由柱洞构成的双开间残房址，柱洞（D1~D5）处东北至西南向呈直线状，两洞间距大致相当，约0.8~1米；D6东距D1~D5所呈直线约1.45米，与其垂直相交于D3位置处。房址残长3.7、宽1.6米，方向26度；柱洞形状近圆形、口大底小，口径0.25~0.28、底径0.1~0.18、残深0.08~0.23米，洞内填深褐色土，杂烧土颗粒，从其残存部分推测其形制应为长方形双开间房址，地面为立柱排架式木构建筑，未见基槽；因后期遭破坏严重，亦未见居住面和火塘等与房屋相关的遗迹现象，门道不明，但从房屋的朝向知门道其应向江面一侧。

（二）生计方式

以上遗址皆处在清水江及其支流两侧的一级阶地上，临江而分布；在发掘中皆未发



第三期陶器

1. Ad型釜（H18：14）
 2. Ba型罐（H18：6）
 3. Ba型罐（H19：5）
 4. J型罐（H18：2）
 5. D型盘形器（H19：7）
 6. Ha型罐（H19：6）
 7. I型罐（H19：8）
 8. K型罐（H30：3）
 9. Ac型钵（H19：4）
- （参见《贵州天柱县盘塘遗址发掘简报》）

现有相关的动物骨骼遗存，在出土器物上亦未见如网坠等与捕鱼相关的工具。我们对盘塘遗址所有灰坑的土样皆留存并浮选，浮选出炭样经山东大学考古系靳桂云教授鉴定分析，得出11份浮选样品中，仅7份有少量种子，且多为不可鉴定的种子残块；共发现41粒炭化种子，包括牛筋草、小型豆科、马齿苋等，不见任何农作物，推测植物类资源利用的主要方式可能是采集遗址周边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茎叶作为果蔬类实物的来源，种植类原始农业并未产生。虽遗址内未发现有动物和鱼类残骸及捕鱼类工具，但考虑到遗址处清水江侧一级阶地，高出江面不多，渔猎极其方便，故在原始农业和养殖业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其食物来源应主要是采集、狩猎和捕鱼等；这与湖南辰溪县松溪口和征溪口遗址地层内出土大量螺壳相区别。

（三）文化渊源与谱系

属清水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一期早段的锦屏亮江遗址第6层出土陶片碳十四测年树轮校正后年代在9875±275年，在其东北侧约5公里处有阳溪遗址，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石器皆出土于网纹红土内，石器类型以大型砾石砍砸器为主，部分大型石片砍砸器，其特征与湖南旧石器时代溇水文化类群相似^[15]；而亮江遗址第6层出土的石器亦以大型石片为主，间有石片类砍砸器，其特征与分布于沅水的旧石器时代溇水文化类群石制品有诸多相似之处，结合阳溪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器特征，我们推测清水江流域新石器第一期遗存的石器打制技术和特征主要发源于溇水文化类群。第二期和三期的石器和陶器特征分别与湖南高庙文化和高庙上层遗存具有相似性，同时石器特征亦与第一期遗存具有承继性。因此，清水江流域旧石器晚期推测应属溇水文化类群，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一期石器打制技术和石制品类型承继了溇水文化类群特征，但同时新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区别于第二期特征较为原始的陶片。到第二期高庙文化兴起并溯沅水而上进入清水江中下游地区，使清水江中下游地区

新石器遗存文化与湖南高庙文化相近，同属高庙文化中心分布区。

以上关于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分期、居住形态、生业方式和文化渊源与谱系的探讨，是基于目前已发掘并刊布的资料为基础，不足之处着实难免；且囿于材料有限，本文并未探讨丧葬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和人群等问题，这些将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和发表。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 释：

[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沅江上源清水江水系[M].贵州省志地理志（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899-900.

[2] 王红光.贵州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认识[J].考古.2006(8):6

[3]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屏培芽遗址[G].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2015: 58-60.

[4] 201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B]

[5] 于孟洲、白彬.贵州天柱史前遗址群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0.6.18:004.

[6] 王新金、张合荣.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坡脚遗址新发现的白陶[G].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2010:244-245.

[7] 于孟洲、白彬.贵州天柱史前遗址群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0.6.18:004.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1(6):4-16

[9] 于孟洲、白彬.贵州天柱史前遗址群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0.6.18:04

[10]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柱辞兵洲遗址[G].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15: 6-11.

[11] 201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Z]

[1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6(7):9-15.

[13] 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J].南方文物.2007(2):051-060.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 2006(7):9-15.

[15]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屏阳溪遗址[G].2003-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015:12-14.

万历贵阳《登仕郎东冈李公暨配王太孺人合墓墓志铭》考释

文/图 李 芳

笔者在网页上欣喜地读到《贵阳市花溪区孟关苗族布依族乡石龙村——李氏宗祠及其相关碑刻的调查报告》一文，得知南明弘光朝首辅马士英的妹夫李章玉祖父暨祖母之墓志铭幸存情况，欲赴斯地一睹此墓志之面目。2020年5月3日，笔者与友人王学祥驾车前往孟关，在石龙村李氏宗祠内找到李氏墓志志石。因室内光线暗淡，只能借助手机电筒照明，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几十幅照片，带回辨识考释。

一、志石来源及现状

该墓志于2008年贵阳小河新区开发时，在小罗解(清为贵筑县南隅里所辖四十七寨之一，新区建设时搬迁，今街区地名为小罗街)出土。该墓由花溪区孟关苗族布依族乡石龙李氏迁葬于石龙村境，并将其墓志志石认领回来，存放于石龙世华小学旁半山腰上“李氏宗祠”右厢房中，用水泥凝固竖立于室内。志石为两块(志盖、志石)，系砂石质，正方形。每块志石的规格长、宽均为81厘米，各厚约20厘米。志盖完整无损，篆书阴刻“皇明登任郎东冈李公暨配孺人王氏合墓墓志铭”二十字，竖排五行，每行四字。志石破损为不规则的五块，用水泥

砂石粘接成形，碑文右上部文字残毁较重，加之镌刻字口较浅，出土日久风化剥蚀，辨识较为困难。志石文字楷书阴刻三十九行，满行三十九字。现根据志石残碑照片辨识，并比对2011年5月贵州民族学院田野考古调查小组当年抄录的墓志进行整理。

二、墓志铭文

皇明登仕郎东冈李公暨配王太孺人合墓墓志铭

翰林院检讨通家晚学生蒲坂张庭撰文

□[东]巡按监察御史年家眷晚生同里马文卿书丹

进士第广东南雄府知府年侄普山蒋杰篆盖
余家舜都，距贵筑数千里而遥。南□向余，侈谭私心，时景仰焉。岁丁丑，风声杳不相及，第山川人文之秀并美中土。余乡人宦旅其间者□□□穆如，益信乡人之言匪欺。余师仕宇为今腾越太守者，乃司教虞庠。余兄弟执经北面，窥先□□□□余曰：吾先子尚殒也，□□濡染先生雨化，余遂哀然领乡书矣。乃过庭之训，寔沾暨之，先□□□□□□□，蒙奉太孺人问□之，祖茔未得宁魄地下奈何？余曰：福地不偶，尝自有卜，云其吉者，未□□□□□暨以竣牛

眠。丙午年，□万里就养邸□□，无何孺人遘疾，亦继登仕翁而歿。先生抚□南还□□□□也。会年友潘朗陵先生终制，再令楚之棘阳。丁未春，余兄弟叨捷南官，备员史局，渊源之□□□□生徒抱恨终天耳！先生手书，并翁配行状乞言□余曰：不佞栋旷素貽羞，罔能徼惠，□□子敢负厥委。谨按：□□子治而铭之，俾两尊人不朽泉室，繫予之赐。余感先生教人以孝，又光公官湖南路判府，允公[登]仕翁，讳达，字道甫，东冈其别号也。其先为古许长葛人，当宋元朝远祖为中州望族，七传而为思□部□书，谥庄从。先公官秘书监，廷玉公官平章节度使，俱起家进士，世附籍贵阳，称鼻祖焉。富生封文林郎，盖元末太尉晋江西左丞思齐弟也。随子添富，官普定经府回职郎。荣生今所殡，号东冈，授将仕郎，志号阴隲先生。彬生琮，官监利知县。琮生贡，贡生本荣，俱授修恩选，历事西粤、东吴，直指登仕郎者也。荣三子，公居季，少敏慧，迈众以数奇阨于制科应。隆庆戊辰楚蜀[绝]，遂决意终养。□刘两公咸器其才，例得除有司秩。公笃念田太母垂白在堂，又两伯兄令疾，公七乐必亲□□□□秩焉。公偕王孺人奉田太母备极欢愉，即一果一蔬，丕先母入。诸日母寝，孺人曰：尔夫□□解衣卧□，囊调摄至，家告拙而不皇恤者。王孺人左右扶掖，独得太母懽心。尝语□尝自□□孝养若此，而[若]子若[孙]，当必若而，至今族里称贤孝云。大都公性仁爱，每好施急贫，而□□□□铎、竹山、婺川，多所造士。往视篆印江，值苗众猖獗，公缮城坚壁，誓与邑士民共生死，卒保□□。观察华公、郡守帅公，方□倚赖，而公遽赋归来矣。家居淡泊身耳，不治生业，课读尤严，暇则偕二三耆旧结社谈诗。每咏“吾家无厚产，经史是良田”之句，辄曰“老夫之愿毕是”。已戊子吾师举于乡邑，而迎养三庐，公虽年踰古稀，而神玉色泽，凡晋接于公者，咸谓得内养术，且拟之为谱仙焉。宦游五□□抱养而卒于邸。彼绅士曰：绅痛

夫仪刑举尸祝文昌官右。公之生荣殁哀，可谓易地皆然着矣。孺人故华胄家女，天性孝慈。襄公终事田太母，其间拮据茹苦，可泣鬼神。雅不事修□第，晨纺夜缉，躬操井臼，以佐家政。曰□颜训，习□妇□，下逮厮儿辈罔不饮和会哺，有樛木风。夫公之居乡服官，教子成名，卒克振箕裘。孺人替襄□□焉可诬也。噫！公未究施于身，然而食报于后。孺人少公十馀岁，后公卜年，卒非祈称吉人义类，令妻□母者耶！自是玉树琼枝，亭亭朝野。余请执笔，以俟用书二老人之世美焉。公生正德丁丑七月初十日辰时，卒万历癸巳闰十一月初六日己时，享年七十有七。孺人生嘉靖乙未正月二十二日寅时，卒于万历癸卯六月三十日未时，享年六十有九。生子二：长即郡守君国栋，娶刘氏，继汪氏。次庠生隆栋，娶傅氏。孙男三：长玄玉，庠生，室横州太守刘君世元女；次秉玉，庠生，室顺天治中汤君师项女；季章玉，[室]雅州知州马君明卿女；俱国栋出。孙女四：适庠生周弘稷、谢崇孝、叶占荣、刘成德；一国栋出，三隆栋出。今甲寅十二月初六日辰时，奉翁配合墓于罗山新垵，坐甲向庚。命余勒志贞珉，以诏来兹，而系以铭。铭曰：

粵稽許葛之柳塘，灵根□□条远扬。中
叶缤纷推贵阳，卜官捧日仰岩廊。我公崛起
绍冠裳，蹊成桃李属门墙。引偕淑媛称明章，
□□众眼馀休光。罗冈之原震东方，合襟良巽
派流长。莹然双璧此中藏，庚峰耸秀壮封坊。
史铭□□闡幽香，[本]支百世永炽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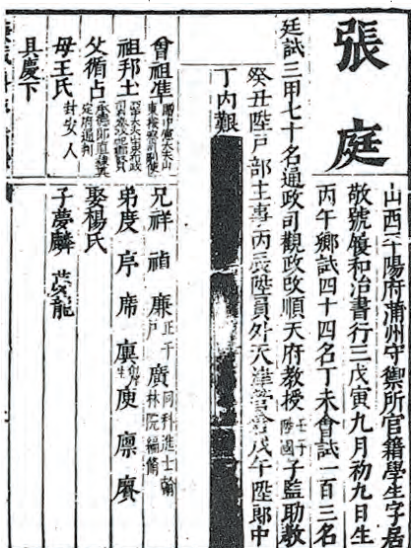
万历岁□在寅季冬谷旦吉

(录文中□表示残缺或无法辨识之字, []
内为疑似文字)

三、墓志撰文者张庭

张庭(1578——?)字居敬,号履和,山西平阳府蒲州守御所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第三甲第七十名进士。据《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载:“张庭,官籍,治《书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
序齿录（张庭）



经》，年三十二岁。中式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第三甲第七十名进士。戊寅九月初九日生，行三，曾祖张准，赠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祖张邦土，亚中大夫，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祀乡贤；父张循占，承德郎，直隶真定府通判；母王氏（封安人）。具庆下，妻杨氏，兄祥；祯；廉（正千户）；广（同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弟度（庠生）；序（庠生）；席（庠生）；虞（庠生）；庾；廪；赓。子梦麟、梦龙。由学生中式丙午乡试四十四名举人，会试中式丁未会试一百三名。通政司官政，改顺天府教授，壬子陞国子监助教，癸丑陞户部主事，丙辰陞员外，天津营仓，戊午陞郎中，丁内艰。”其上言弹劾张差，升郎中，被攻击毁伤。引退，抑郁死。天启初，赠光禄寺少卿。

《明史·陆大受传》载“……户部主事蒲州张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内，狙击青宫，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穷主谋。乃廷臣交章，一无批答，何也？君侧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见甚稀，而前此册立、选婚及近时东官出讲、郭妃卜葬诸事，陛下皆弗胜迟回，强而后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测度，阴蓄不逞，以侥幸于万一哉！’皆不报……庭再迁郎中，被齟齬。引退，抑郁以死……天启初，御史张慎言、方震孺、魏光谟、杨新期交章讼三人冤。乃赠(张)庭、俸光禄寺卿，大受起补韶州。”

该墓志铭撰写于明万历甲寅年(1614)。志文作者所署籍贯“蒲坂”及志文中的“余家舜都”，均为明山西平阳府蒲州之古称。志文中有“丁未（1607）春，余兄弟叨捷南宫，备员史局”之句，与《齿录》“丁未会试一百三名”及“弟广同科进士翰林院编修”记录相符。明制殿试三甲者授翰林院检讨之职，张庭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第三甲第七十名进士”，与志文所署“翰林院检讨”之衔相一致。因志石中张庭的“庭”字已风化不清，只能清楚看见其有“广”字头，故有此考释。

四、墓志书丹者马文卿

马文卿与墓主李达同为明贵阳府贵筑人，且同居一邑城，故称“同里”。

马文卿生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卒于明朝崇禎十三年(1640)，享年八十三。康熙《贵州通志》载：“马文卿，字瑞符，贵阳人。万历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按粤东。以憨直忤时辈被谪，遂不赴铨补。居乡数十年，杜门劫扫，绝迹公庭，年八十三卒。”据甲秀楼《江公堤碑记》所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文卿时任“巡按广东监察御史”。因其胞弟马明卿(南明弘光朝首辅马士英之父)与墓主之子李国栋系儿女亲家，故有“家眷晚生”之谓。

据《贵阳马氏家谱》(清同治抄本)载：马文卿，系贵州卫指挥使马福之孙，卒于崇禎十三年(1640)，葬于贵阳阿栗寨。原配张氏，再娶李氏。《黔诗纪略补》录其《石屋看花》诗一首，江东之《瑞阳阿集》附录有《江公堤碑记》文一篇，还有散见于其他地方史籍中的《题松棚》《游红螺寺》《题定慧寺双塔》诗三首，以及《马氏家谱》中留下的《贵阳守城诗六首》。马文卿还应贵阳亲友之邀，为许一德、许成德基志书丹，为任西冈墓志篆盖。此墓志为目前在贵州所能见到的马文卿第四件书法作品（未发现纸质手迹）。



马文卿所书志铭
(局部)

五、志盖篆书者蒋杰

蒋杰（1561——1643）字美若，号象岩，别号石门居士，晚号三素痴人。据《兴义黄草坝蒋氏·家谱》载：其先为江南吴江人，先祖蒋明从军，官凤阳卫千户，明洪武十四年（1381）随征南副将军沐英征伐云贵，功授普安卫指挥副使，子孙世袭武职，遂为黔人。美若系蒋氏入黔第八世孙，嘉靖三十九年（1561）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普安一秀才之家（其父蒋廷赋为岁贡生）。万历戊子（1588）举人，己丑（1589）进士，授户部江西司主事，后任广东南雄知府，升任广东按察司副使。丁母忧回籍，因避“奢安之乱”游寓湖北荊州。荊州寇乱，又避地江西丰城。崇祯十七年（1643）十月十九日卒于丰城南乡王公山，享年八十三。蒋杰著有《十七史摘要》《普安续志》。有子六人，即克家、克恭、克类、克显、克缙、克瓊，分居于湖北荊州和江西丰城。

乾隆《贵州通志》载：“蒋杰，字美若，普安州人，万历己丑进士，以比部郎出守南雄。风流文雅，誉重当时。后罢归，流寓荊州，放情山水，娱志琴书，虽屡空晏如也。诗文清丽，书法效颜真卿体，与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称四大家。”蒋杰与明贵阳人、广东副使潘润民（朗陵）友善，在《黔诗纪略》收录潘润民的诗中，有数首是写致蒋象岩之作。

“年侄”即同榜者子侄辈的自称，蒋杰与李国栋为贵州乡试同科举人，为同年父母撰写志盖，故有此自谦之称。志石中蒋杰所署籍贯为“普山”，即明普安州之古称。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普安路为普安府，另置普山土府，土流二知府分治其地。后废普山府，置普安安抚司。永乐十三年（1415）改置普安州。

蒋杰所篆志盖



蒋杰的诗歌及书法手迹，《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登岱诗》二首。万历庚申年春《登岱诗》册页一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明蒋杰行草登岱诗》），广东梅岭关楼南北面“南粤雄关”、“岭南第一关”两石匾，系万历戊戌年（1598）中秋任南雄知府时所书而镌刻，至今保存完好。此志盖篆书，是蒋杰书法作品在贵州的首次发现，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六、墓主李达及墓志中涉及到的人物

据墓志所述：李达（1517——1593）字道甫，别号东冈，贵阳人。生于正德丁丑（1517）七月初十日，卒于万历癸巳（1593）闰十一月初六日，享年七十九。据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四“科贡”岁贡生中有“隆庆：李达”之载，而清道光《思南府续志》卷“秩官门”载：“婺川县训导：明，李达，贵阳府人。”与志文中“……婺川，多所造士”之载相符。说明墓主李达以岁贡生历官婺川县训导之职，受封为“登仕郎”（文散官，明正九品，初授将仕郎，升授登仕郎）之衔。另一墓主系李达之妻王氏，明封孺人。王氏之籍贯及家世，仅以“孺人故华胄家女，天性孝慈”述之，未作详细说明。王氏生于嘉靖乙未（1535）正月二十二日寅时，卒于万历癸卯（1603）六月三十日未时，比其夫晚逝十年。万历甲（1614）十二月初六日，夫妇合葬于贵阳城南罗山。

“其先为古许长葛人，当宋元朝远祖为中州望族，七传而为思□部□书，谥庄从。先公官秘书监，廷玉公官平章、节度使，俱起家进士，世附籍贵阳，称鼻祖焉。”河南古称“中州”。古许长葛即今长葛市（县级市），隶河南省许昌市。

根据《中国历代职官词典》所载：“秘书监，官名。东汉延熹二年（159）始置。属太常寺，典司图籍。唐高宗时改称太史，旋复旧。元、明不设，遂废。”；“平章，官名。……金尚书省、元中书省及行中书省

在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金、元平章政事简称平章。明初沿置，不久废。”；“节度使，官名。唐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称节度使，代理皇帝理军政。……宋初收回兵权后，节度使不赴任，无职掌，只用于宗室、外戚、将相荣衔。辽、金沿唐制，仍置节度使，元废。”墓志中曾任官平章、节度使之“廷玉公”爵位是很高的，当为宋代之官宦，其人史事待考。但南方李氏家族，多把宋淳熙年间“会试擢升为濠州节度使”之李廷玉尊为始祖。

“富生封文林郎，盖元末太尉晋江西左丞思齐弟也。”李思齐，罗山人，元末将领，后降于明，奉太祖朱元璋命，招抚扩廓，断臂以还旋卒。事具《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其弟李富生无考。明初罗山县，隶信阳州，曾改隶汝宁府，成化十一年复隶信阳州。即今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

“荣生今所续，号东冈，授将仕郎，志号阴隲先生。彬生琮，官监利知县。琮生贡，贡生本荣，俱授修恩选，历事西粤、东吴，直指登仕郎者也。荣三子，公居季，少敏慧，迈众以数奇阨于制科应。”万历《贵州通志》卷四载：“孝义：李彬，本司（贵州宣慰司）人。性慈煦，急人难如饮渴。尝谓济之术莫善于医，遂精之。景泰初，郡中大疫，彬日煮药数斛，贮以大壶，令子弟分携赴闾陌疗之，全活者众，时称为阴隲先生，后以寿终。”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二：文武科第表：“弘治辛酉乡举：李相（宣慰司人，沅江府教授）；正德丙子（正乡举：李彬（相弟，济宁知州）”。综上所述，李彬，字所续，号东冈，明正德十四年（1516）举人，曾任济宁知州。其兄李相，明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曾任沅江府学教授。

李国栋（？——1624），字仕宇（《黔诗纪略》载为“字承明”），系李彬玄孙，张庭之师（“戊子吾师举于乡”，即万历戊子，十六年举人李国栋）。万历十六年（1588）与蒋杰、马明卿、汤师项同为贵州乡试举人，又与马、汤成为儿女姻亲。清《黔诗纪略》莫友芝撰《陆光禄德龙传证》记载：

“……王三善至，思稷与国栋、枝衍、之宁、仰极咸见三善于泽溪。三善劳与语，使皆赞帷幄，从进大方，返为贼击，并死于内庄。（李）国栋，字承明，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累官邓州知州。解任归，囊橐萧然。家居闭门著述。殉难后，竟无一篇传。……毓阳、国栋诸人，赠荫未闻。”国栋等人与贵州巡抚王三善于天启四年（1624）春在水西“内庄兵败”时战歿。根据墓志及贵州史志之述，李国栋曾历官山西蒲州、云南腾越、邓川州知州等职。

据咸丰《邓川州志》所载，明邓川知州三十五人，李姓贵州贵阳籍者，万历年间知州仅李养栋其人，无李国栋之载。而李养栋其人，在郭子章《黔记·文武科第表》乡举中载：“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乡举：李养栋，（贵州）宣慰司人，（官）长史。”道光《贵阳府志》是否误记，待考。

志文中有“余师仕宇为今腾越太守者，乃司教虞庠”之谓，乃知张庭在撰写墓志之时[万历甲寅年（1614）十二月]，其师李仕宇任“腾越太守”（实为知州）。据道光《云南腾越州志·文职官·知州》所载：“李之仁，字思葵，贵阳举人。（万历）四十二年（1614）任，与州之绅士张邦教等纂《志》三卷，曾有功於民，城隍祠有像祀之。”而万历年间任腾越知州之贵州籍李氏，仅李之仁一人。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又有李之仁传：“李之仁，字心谷，贵阳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除大宁知县。……寻迁腾越知州。……后官至乌撒同知。之仁有至性，事继母孝，待兄弟友，乡党宗族莫不称焉。子司宪。司宪，字明允……著有《省昭录》《拟陶诗》行世。子仙根、孙祺，皆举人。”《云南腾越州志》是否将贵阳人李仕宇误载为贵阳人李之仁，就无从考证了。因墓志中李仕宇的子嗣记载与《贵阳府志》李之仁的子嗣记载不符，故不能认定贵阳李仕宇与李之仁为同一人。但墓志所述李仕宇于万历甲寅年（1614）年任腾越知州也是史实。

潘朗陵（1572——1641），名润民，贵

阳人。康熙《贵州通志》载：“潘润民，字用霖，贵阳人。举万历癸卯第一，丁未成进士，读书中秘，历藩、臬，以清节著，所至有恩惠，士民爱戴，每迁擢去，辄痛哭挽留不舍。壬戌安邦彦围贵阳，时在告家居，与当事誓死坚守，复捐千金以饷士，城赖以全。围解，疏荐起用，官至云南左布政。生平孝友端悫，一言一动皆有法则。著有《味澹轩集》。”又据潘驯《朗陵府君行状》所述：“先府君讳润民，字用霖，别号朗陵……乙未(1610)，迁广东督粮道副使，粤固财富之区，经制无籍，猾胥豪右，相穿贯以为奸，民病焉。府君摄藩篆，朝夕讨求，勒成《赋役全书》垂为制，至今赖之，有‘潘副使润民不润己’之诺，以其御史属对焉。”根据墓志之述，潘润民与张庭为万历丁未同科进士，故有“年友”之称。

墓主之孙、国栋次子秉玉“室顺天治中汤君师项女”。汤师项，《贵阳府志·明耆旧传一·明陈汤二马吴传》载：“汤昇，字伯元，贵州宣慰司人。……孙师项，万历十六年举人，官治中。”

国栋三子章玉“室雅州知州马君明卿女”。“马云龙，字翔高，其先南直隶人。……子禹卿，以军功袭指挥使；文卿；汉卿，官把总；明卿，万历十六年举人，官晋宁知州。文卿，字瑞符，万历十三年举人，二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李章玉系南明弘光朝首辅马士英妹夫，曾任凤阳总督马士英之监纪官（游击将军），崇祯十六年(1643)初奉命回黔，招募黔兵七千人赴凤阳护卫皇陵，中途改道徽州，地方误认为“贼兵”，遭受乡团围击，损失七百人。章玉后随马士英入朝，任弘光朝职方郎。弘光朝覆灭后回黔，终老贵阳。潘润民之子潘驯《丙戌纪事》云：“查显仁者，年四十许，未详何许人，亦不知何时为僧。……时黔绅李章玉者，在宏光时为职方郎，鑛（贵州巡抚范鑛）约同行，且为给传。章玉曰：‘圣安被系北庭，必无脱理，其伪无疑。’辞不往，鑛强之，中途

托病而还。”

墓主“孙女四：适庠生周弘稷、谢崇孝、叶占荣、刘成德”。周弘稷，系白纳司正长官周可敬之七世孙周世用之子，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周思稷之弟(周世用、周思稷《贵阳府志》中有传)。

该墓志的发现，可以补地方史志之阙，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为地方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希望地方政府给予保护。❶

（作者单位：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参考文献：

- [1] 周海辉.花溪区孟关乡石龙村李氏宗祠及相关碑刻调查[J].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贵州世居民族研究动态.2012(1): 89-94
- [2] 屈万里.明代史籍汇刊·明代登科录汇编廿一·万历年三十八年度戊科序齿录[M].影印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11935
- [3] 马春晖.贵阳马氏家谱[Z].抄本.贵阳.1873(清同治十二年): 68-70
- [4] 王仕学、赵显城.兴义黄草坝蒋氏[Z].印刷本.贵州兴义.2019: 9-10
- [5] (明)王来贤、许一德.万历贵州通志[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黄富源点校.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 51
- [6] 续黔南丛书第一辑(下)·郭子章.黔记[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孙晓竹、陈琳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1973-1994
- [7]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人物志点校组.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点校本[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47、48、215
- [8] (清)周作辑.贵阳府志[M].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1295-1297
- [9] (清)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黔诗纪略[M].关贤注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133-434、489、492、494、516
- [10] 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92、103、294
- [11]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709-3711
- [12] (清)屠述濂.云南腾越州志点校[M].文明元、马勇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 119-124
- [13] 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志点校本[Z].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贵州思南.2002: 205
- [14] (清)侯允钦.中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邓川州志[M].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06-107

海龙囤王羽卿碑刻研究

文 / 图 陈 珊

海龙囤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海龙囤社区，南距遵义老城区16公里，建于大娄山东支龙岩山的山巅。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前后，随着播州土司与明王朝关系的渐变，杨应龙在北宋宝祐五年（1257）前后修建的“龙岩新城”基础之上进行大规模扩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爆发，于同年六月六日攻破海龙囤，结束了杨氏土司对播州的统治。战后，诸家皆将此事工笔于书，形式不一，而碑刻就是其中之一，海龙囤遗址现存的《王羽卿诗碑》和《题王羽卿诗后碑》，记载了平播将领王鸣鹤的相关事迹，其以儒生之资袭职后中武举曾历经鄖阳兵变、扼哱拜、征播州、征诸蛮、擒大盗等战役^[1]，著有《登坛必究》《帷间问答》《东粤私忧》《平黎纪事》《教操说》《训兵说》《行兵图》等书^[2]，文治武功兼具，对其进行探析，以望能补阙文献之不足。



题王羽卿诗碑拓片
(韩文华 拓)

一、碑刻概况

《王羽卿诗碑》,长135cm、宽86cm、厚18cm,反扑于海龙囤五凤楼乱石中,碑文草书阴刻,由于年代久远,碑已磨泐不清,仅见“夏季六月平播纪念”“□阴王鸣鹤书”等字^[3]。李飞在《王鸣鹤:英雄归来》^[4]中亦载:碑文草书,磨泐不清,加以碑已残断,无法通读,仅落款“夏季六月平播先登海龙……阴王鸣鹤”可认,现存于飞凤关内。然从现存碑刻内容来看,落款内容应为“夏季六月平播先登海龙……阴王鸣鹤书”。

《题王羽卿诗后碑》,2012年发现于海潮寺右前方的猪圈粪坑中,碑身断作



王羽卿诗碑拓片
(韩文华 拓)

6截(尚缺一角),现存于新王宫内,高174cm、宽98cm、厚14cm。碑身两面有字,一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林桐凭吊海龙囤时见《王羽卿诗碑》有感而作;一为弘光元年(1645)重修海潮寺时所刻,属于旧碑新用。通过对《遵义府志》中收录的此碑文与残存碑刻进行校对,仅有个别字稍有出入,现录全文如下^[5]:

淮阴王羽卿,帅狼山师讨□□平之,寻进都督京营。汾阳林桐与之同寅□于戎政,□六师堂一自倾。盖誓心以进则尽忠,毋负武夫事业;退则角巾方袍,为五岳游。且告予:当时与数大将军进讨,围囤时,鸣鹤独当山右一路,为围师所急之处,攻之亟,贼备之益力。周旋山溪,日自筹之。□至六月五日午夜,起将士万余上屯方略,誓师以破贼而后朝食。遂自横梁先登,漏下五鼓,直透山颠,挺身大呼,将校勇奋齐至,喊杀之声震撼山谷,贼众披靡,一时俱尽。乃羽卿遂屏树以俟诸大将军搜元凶尸、擒逆子女妻妾以献。予壮其功而与之评曰:“大兵日仰面进攻,贼凭险俯为之备。攻难,守者易也。故弗□。羽卿密乘人之不及,夜登,出人之不意,挺身大呼,声若疾雷之不及掩耳。羽卿其得于法而不囿于法者乎!”羽卿曰:“友凤知言哉。”遂□掌大笑。居无何,主上嘉羽卿功,命佩征蛮将军印,出镇粤西。人臣受知登坛,古今奇遭。予尝谗尽忠之说,以别羽卿。予寻亦拜命出镇西川,所驻节政播中。秋初,吊海龙山战场,观形势,问父老,咸能指往迹而名之。若山左右,则曰:王将军首登路也,适当贼进退生死之地尔。石壁间有羽卿诗,朗吟,东向呼:羽卿!羽卿!往闻开拓勋宏,今幸居守善,后慨碧水苍山之岿然,喜燕山海龙之炳映。《易》曰“师贞丈人”,其羽卿哉?议彤卢者,不知其孰谁。因服羽卿不伐名高,重各天离析之感。乃寄羽卿曰:吾弟兄躬承圣天子临轩授钺,而屏翰粤蜀,勉旃两地在。今日。五岳之盟,幸毋忘于异日。友人林桐附题于诗后。

时大明万历甲辰秋七月之既望。

(下有印章二方，一为“授钺登坛”，一莫辨。)

二、碑刻价值探讨

从碑文可知，王鸣鹤于破围之时首登围顶，故刻《王羽卿诗碑》以记之。平播之役后，出仕播州的汾阳人林桐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七月凭吊海龙围时见《王羽卿诗碑》而作《题王羽卿诗后碑》，向世人重提友人平播之功。现对两碑进行探讨，希望能多角度剖析王鸣鹤及其史实，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史价值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爆发，王鸣鹤以参将之身参与平叛，并成为围破时首登之将领，然其卓著功勋却不见于《明史》及其他史籍，亦如郑珍《遵义府志》所言。由此，不禁让人感到疑惑，诸家不载王鸣鹤之功，原因何在呢？

自古以来，功勋卓著功名不显者多有之，郑珍认为王鸣鹤即是此类。《遵义府志》载“又可见摧此大敌，正非陈、吴二三大将能专其功，当时勋名泯没者固多也。”^[6]对此，《平播全书》亦称“近日各路报功……有先报捷功，数日后方报首级数者；有竟不报数，直至纪功道文到方有数者；有称斩获不计者。”^[7]此报功方式较为含糊（报功与报数时间错落开来），给报功者提供了无功妄报、多功少报、有功不报的机会，也为冒名领功和勋名泯没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平播之役中勋名冒领、泯没的现象是存在的，而王鸣鹤也极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对此，朝廷为了取得平播之役胜利，两次进行《查妄报功》^[8]，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其中以拿问贪生怕死、抱头鼠窜、冒功领赏的杨惟中为典型。同时让各道官吏会同纪功、监军道一起“备查该路汉土官兵……挨顺月日，先主将、监军、督饷、纪功各道，次监纪、管饷并监收、监支、督夫、督

运、领兵偏裨大小等官，以及部兵功次与随营阴医杂流等项。……必须每一路掇为一册，分别功罪，详注考语。”^[9]将各路军上至主将、下至随营阴医杂流，逐一登记造册，使将兵功过有据可查。此外，朝廷还以官爵为赏，责令将士以命搏取，在大兵擒斩逆贼之际，令“发去空札二十张。……责令在营会同总兵官，如遇大敌当前，愿冲击以挫狂锋；又如间道可乘，愿出奇以破贼围，诸凡至险至难之事，可期一举成功者，即与本人定约，先照功迹大小，于空札内填定姓名职衔，责之用命。如遇成功，当即给授，仍候事完之日题请实授，应加升者照格加升”^[10]，进一步鼓舞士气，令将士为自身功名和朝廷荣辱全力而战。

由此可知，王鸣鹤参将之身，理该记录在册，但其如此功绩既不曾落于空札之上，

上世纪80年代的海龙屯飞龙关

（李连昌 摄）



也未见于随军名册，即便是记功之人歪曲事实迎合他人而为之，此等功绩也当记于他处才对。且破围之事关系重大，“荣可永享忠臣孝子之名，辱将永堕贼子乱臣之党”^{〔11〕}，涉及之人应是都能词之，目前除《平播全书》及《王羽卿诗碑》有“平播先登海龙”的记载，并未发现更多关于明军首登围顶的史料。

同时，王鸣鹤功勋之不显，或与其临敌畏缩亦有关。平播之役，明王朝“领兵二十三万围一孤围，围上仅数千残苗”^{〔12〕}，其优势尤为明显，但却出现“半月以来连催数次，既不并力齐上，而又无偏师直冲，日延一日，无动无静”^{〔13〕}的景象，导致明军陷入“军士心灰，将领胆寒”^{〔14〕}的窘境。其中，吴广“小器易盈，微躯自爱。……按兵不动，致贼今日诈降，明日诈死，懈我军心，增贼实备”^{〔15〕}，是平播将领中贻误战机的典型代表之一。李化龙因顾念临敌易将乃兵家大忌，令其改过自新，力图新功而继用之。吴广位至总兵，其“受恩不为不深，承委不为不重”^{〔16〕}，是此战中独当一面的将领之一，但也出现临敌畏缩、纵贼遗患之举，然此类怪相在明军攻围之际并不鲜见，这在《平播全书》中多可备查。对此，《神宗实录》亦载：“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庚戌，而刘綎之要挟逗遛，王鸣鹤之临敌畏缩，陈璘之且行止，俱应从重分别议处。”^{〔17〕}，可见，刘綎、陈璘、王鸣鹤之行径在当时应是典型或普遍现象，从而才被记之于册，而王鸣鹤的行径，似正好诠释了其在围破后“屏树以俟诸大将军搜元凶尸、擒逆子女妻妾以献”的行为，淋漓尽致展现了明军攻围之际“性袖手旁观，只营利避害，更无一点实心为国”^{〔18〕}的怠战、观战、怯战心理，而这亦或正是王鸣鹤功名不显、诸家不载的原因之一。

此外，郑珍在《遵义府志》中还认为：“见当日平播之功，鸣鹤不在綎下。而《明史》不登姓名，亦不见诸家纪载。”^{〔19〕}这或许有溢美之处。平播之役，八路大军进军

播州，“川东、綦南二路，监以参政张栋。而綦江路则以原任总兵、今充为事官刘綎为主将；……南川路则以听用总兵马孔英为主将；……川南、永合二路，监以参政谢诏。而合江路则以总兵吴广为主将；……永宁路以原任副总兵曹希彬为主将，仍听吴广节制。”^{〔20〕}军中张栋、刘綎、马孔英、谢诏、吴广、曹希彬等皆是各路主将，身经百战，是平播之役取胜的重要基础，王鸣鹤之功实难与刘綎等人相提并论。据《平播全书》载“各营领兵及入关护运将官：……参将王鸣鹤，业擅戎韬，学综兵要。帅淮喷之劲卒，飞渡长江，会楚塞之精骑，首登绝垒。……俱宜一体升赏者也。”^{〔21〕}可见王鸣鹤文韬武略兼具，其领兵护运之功亦得以“一体升赏”，并未全然埋没。关于《明史》不登其姓名，郭子章作为一代名臣，亦未列其中，这点似不难理解。

前述可知，王鸣鹤平播之功，与刘綎等人难以相提并论，至于《明史》及诸家不载之见，郭子章作为一代名臣也不见其迹，王鸣鹤未列其中亦属正常，且其功绩亦显于《平播全书》，并未全然埋没于诸家。而从上述记功方式来看，其功绩被泯没的可能性亦不大，临阵脱逃的行为或才是其功不显的根源所在，更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探讨。

（二）艺术价值

《王羽卿诗碑》以草书成碑，《题王羽卿诗后碑》则以工稳楷书成型。两碑均刻于同一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书法的发展水平，因而值得进行探讨。

王鸣鹤初为儒生（后袭爵再中武进士），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文学造诣斐然，这在《王羽卿诗碑》中可窥。此碑寥寥十余字，字迹纵任奔逸，赴速急就，文辞呼应，其自身腹有诗书的自信及行云流水的性情倾泻于字里行间。有明一代皆尚文轻武，从武者多不得已而为之，故文武兼备者少，且自古以来文武举子或有谋略为将、或有才学为官，像王鸣鹤这样文武兼备者确实不

多,从其得以镌刻此碑就可见一斑。

《题王羽卿诗后碑》,是林桐凭吊海龙战场时见《王羽卿诗碑》有感而作,碑文以工稳楷书成型,肯定王鸣鹤功绩的同时又把王鸣鹤功名不显的不愤贯穿其中,融情于字里行间,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碑文由林桐所作,然书丹之人却不详,但这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艺术发展水平。

可见,两碑虽各具特色,但都与王鸣鹤息息相关,对其艺术价值进行探讨,可进一步丰富世人对王鸣鹤的认知,亦可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发展面貌。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可知王鸣鹤为文化素养和军事才能兼具之辈,《题王羽卿诗后碑》称其在平播之役中功勋卓著,为破围时首登囤顶之将领,但却功绩不显、诸家不载。平播之役中,参与者均登名造册以备查功过,但目前除《平播全书》及《王羽卿诗碑》有“平播先登海龙”之记载外,尚未发现更多关于明军首登囤顶的史料。同时,亦可能是其临敌畏缩之故。平播过程中,吴广纵贼遗患、刘綎要挟逗遛、陈璘之且行止,作为此战中独当一面的将领都如此,作为平播参将的王鸣鹤亦不例外,他临敌畏缩,将战时的怠战、观战、怯战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或也是王鸣鹤功名不显之因。此外,王鸣鹤平播之功虽不能与刘綎、吴广等人相提并论,但《平播全书·叙功疏》亦对其进行“一体升赏”,并未将其全然埋没于诸家记载。最后,两碑分别以草书、楷书的形式将其自身才气、洒脱性情倾洒于字里行间,有力彰显了他们在文化和艺术上的造诣,经对两碑进行探讨,既加深了世人对王鸣鹤认识,亦有益于补阙史料的不足。^①

(作者单位: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

注 释:

- [1] 张兆栋、何绍基等.同治重修山阳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80
- [2] 唐仲冕等.嘉庆海州直隶州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04
- [3] 遵义市汇川区政协教科文史委编.播州杨氏土司文献资料辑编[Z].遵义.2014:269
- [4] 李飞.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38
- [5] 李飞.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27-35
- [6] (清)郑珍,莫友芝等.遵义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6:898
- [7]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58
- [8]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71-375
- [9]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59
- [10]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55
- [11]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71
- [12]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67
- [13]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58
- [14]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62
- [15]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65
- [16]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65
- [17] 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6359
- [18]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367
- [19] (清)郑珍,莫友芝等.遵义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6:898
- [20]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137
- [21]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178-179

贵安新区建置沿革与历史文化

文 / 图 何先龙

一、建置沿革及历史文化概述

2014年成立的贵安新区是目前全国13个国家级新区之一，规划控制范围包括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石板镇、党武乡和麦坪乡，清镇市红枫湖镇；安顺市平坝区马场镇、高峰镇、城关镇、天龙镇、白云镇、夏云镇、乐平镇、羊昌乡和十字乡，西秀区蔡官镇、七眼桥镇、大西桥镇、旧州镇、刘官乡和黄腊乡；直管区包括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党武乡，清镇市红枫湖镇平寨村、芦猫塘村、中一村、中八村、兰安村、池菇村和中八居委会，安顺市平坝区马场镇和高峰镇。

13个国家级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开展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竞争，陕西

已完成《西咸新区文化通典》，抢占了文化先机。贵安新区有两千多年文明史，春秋属牂牁国，战国到西汉属夜郎国，汉武帝灭夜郎后到北宋末多隶牂牁郡、牂州或与牂牁密切相关，宋元属普定府、罗甸国及顺元安抚司，明清属贵阳府和安顺府，民国1913年属黔中道、1920年直属贵州省、1935年分属第一、第二行政督察区，解放后先后属贵阳专署、贵定专署、安顺专署，最后分属贵阳地区（市）和安顺地区（市）。贵安新区地处南盘江（红水河）支流涟江流域，南盘江就是周秦汉代牂牁江，西汉夜郎国临牂牁江，春秋牂牁国因江得名，战国被夜郎国取代，故远古牂牁国和夜郎国地域基本相同。贵安新区建置和文化从春秋到北宋末（约1124

清镇汉墓出土
元始三年（3）
朱绘雷纹漆耳杯

平坝东汉汉墓出土
永元十六年（104）
陶罐



年)的1500多年都与牂牁密切相关,必须深入开展以牂牁文化为核心的贵安新区历史文化研究,着力打造“千年牂牁·筑梦贵安”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贵安新区辖区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已发现并认定的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红枫湖镇黑泥哨古道,大西桥镇鮑家屯水利工程,七眼桥镇云山屯古建筑群、天龙镇天台山伍龙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12项,其中国家级名录5项:屯堡抬亭子、蜡染技艺、苗族服饰、苗族跳花节、布依族服饰;省级名录21项,地市级名录33项,县级名录53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个:天龙镇和旧州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个:七眼桥镇云山村。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个:刘官傩雕艺术之乡、平坝屯堡地戏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1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省级民族文化保护村兼省级生态村1个。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个:红枫湖镇大冲村虎山彝寨。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红枫湖、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马场民族芦笙舞艺术之乡、省级风景名胜区及地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2个等。

贵安新区文物保护单位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是屯堡村落、汉墓、唐墓和建文遗迹,其中屯堡村落可与黄果树瀑布等捆绑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具魅力的是苗族服饰和屯堡抬亭子,都具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力。

二、远古到唐代建置

贵安新区早在距今约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活动;距今6000~4000年前的新时期时期,生活在今平坝区域关镇平庄村飞虎山遗址的古人类发明了贵州最早的彩陶;马场镇牛坡洞遗址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尺

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对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到西汉属夜郎国,秦朝始置郡县。汉武帝最早关注并大规模开发夜郎国,公元前135年派唐蒙通南夷(今贵州安顺)时约见夜郎侯多同,逐步恢复秦朝在夜郎所置郡县,同时在夜郎国修建五尺道,开辟了贵州最早的交通线;公元前129年在夜郎国设置邮亭,贵州从此有了邮驿;公元前126年仅在西南保留夜郎、且兰两县,并由一个都尉来管理;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等取道滇国和夜郎探寻到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时夜郎侯闹出了夜郎自大的笑话,汉武帝同时下令迁豪族到南夷屯田,是贵州乃至中国最早的大规模民屯;公元前111年平南夷置牂牁郡,安顺一带首次纳入中央直接管理;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郎官司马迁为特使出使西南五郡及夜郎国和滇国,司马迁代表汉武帝为滇王和夜郎王颁赐了王印;公元前28~公元前25年,夜郎王兴与附近小国互相攻战,汉成帝派陈立为牂牁太守到夜郎国都且同亭召见夜郎王兴,当面宣布兴的罪状后立即诛杀,夜郎国至此灭亡。安顺宁谷遗址面积方圆4平方公里,出土西汉“长乐未央”瓦当和铁镜、龟灯、“牂牁”木牍等珍贵文物,可基本确认为汉代牂牁郡城址。清镇市红枫湖镇汉墓则出土了西汉公元1年广汉郡制造的漆耳杯3件和公元2年蜀郡制造的漆饭盘1件,可见西汉时夜郎、牂牁与四川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东汉时仍属牂牁郡,中央主要通过牂牁大姓间接统治牂牁地区。汉建武元年(25),大姓龙氏、傅氏、尹氏、董氏与牂牁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受到刘秀嘉奖。贵安新区马场东晋墓出土有东汉永元十年(98)隶体铭文陶罐1件;清镇市红枫湖镇与平坝区交界处汉墓出土的“谢买”、“樊千万”和“赵千万”等印章则是汉代谢氏、赵氏等大姓统治贵安新区一带的历史物证。

魏晋南北朝仍隶牂牁郡。建安十九年（214）刘备以费诗任牂牁太守，建兴元年（223）牂牁太守朱褒反，建兴三年（225）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同时有南中耆帅济火迎接，终于平定牂牁等四郡，济火就是水西安氏土司始祖；太康四年（283）牂牁两千余寨内附；西晋永嘉七年（313）分牂牁置平夷郡；东晋咸和八年（333）李寿攻陷宁州，属郡多降，唯牂牁太守谢恕为晋保境；东晋咸康四年（338）分宁州置安州治牂牁郡。南北朝宋齐沿牂牁郡，南齐到梁朝改为南牂牁郡。贵安新区马场镇东晋南朝墓出土许多陶器、铜器、漆器、银器等，是贵州已发掘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晋代南朝墓群。

隋代隶牂州牂牁郡，所属宾化县辖及清镇市；隋大业十二年（616）水东宋氏兴起于牂牁。唐五代属黔中都督府牂州、矩州、清州。唐武德三年（620）以牂牁首领谢龙羽地置牂州，同时分牂牁地置蛮州（今开阳）并以宋氏任刺史，次年设矩州于贵阳，后又置清州于马场。唐显庆元年（656）矩州人谢无零反唐，唐总章二年（669）矩州刺史谢法成招七千余寨归附。贵安新区马场镇有贵州已发掘的唯一唐代墓葬3座，出土唐代海马葡萄铜镜残片、八狐花鸟纹铜镜、陶罐、陶釜、陶盘、青瓷坛、金银戒指、银发钗、漆盒、漆碗等，是贵州目前唯一唐代墓葬和出土文物。天成二年（927），清州（今马场，宋末元初讹为曾竹，明清讹为曾周属镇宁州，民国划归平坝县并因逢马日赶场而改名马场）刺史宋朝化入朝时服饰与中原一样，进贡草豆蔻2万个、朱砂500两和蜡200斤，是贵安新区等黔中地区最早的贡品和服饰记录。

三、宋代至今建置沿革与历史文化

贵安新区宋代属夔州路绍庆府矩州、清州，普里部、罗甸国、张蕃及牂州宾化县。宋乾德三年（965），矩州刺史普贵请求归附时用土语说矩州为贵州，宋太祖敕书中有

“惟尔贵州”语，贵州首次见于文献；宋乾德四年（966），矩州石人部落（今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王子若藏归附授归德司戈。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罗殿国王罗部贡，西南蕃知矩州、忠燕军节度使赵以盛入朝进奉土产、名马等方物；南宋嘉定三年（1210），蛮州（今开阳）宋永高攻占矩州改名贵州并自任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从此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固定下来。宋代安顺属普里部，平坝属罗甸国；安顺旧州为大小张蕃辖地，北宋初有张蕃入贡，欧阳修有《赐西南蕃蛮人张汉顶等敕书》和《赐西南蕃蛮人张光现等敕书》，张光现和张光现就是元明安顺土司张氏祖先。北宋化外州牂州宾化县辖及清镇市。清镇、平坝交界的红枫湖东侧宋墓出土陶器、铁器、木器、锡器、骨器、玉器等600多件及大量北宋铜钱，马场镇也有宋墓出土彩陶罐、陶釜、铜发钗戒指等，是黔中地区罕见的宋墓群。

元代属普定府、罗甸国、金竹府、曾竹等处、党兀等处、天台等处。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顺元路金竹府（今长顺县广顺镇），至元二十七年（1290）罗甸国称招到龙家、宋家、仡佬、苗人等46600户，龙家、宋家是布依先民首次见于史籍；同年金竹府扫阡贡马和雨毡，并称近年与赵坚招降30多寨，贵阳市花溪区燕楼乡有元贞元年（1295）赵坚等招抚时留下的石刻，是贵州已发现的唯一元代石刻，落款为“金竹府吏赵坚书 教授冉口记”，可见元初金竹府已设官学，是贵安新区最早的官学。元初有宋阿重任管顺元安抚司曾竹等处长官，大德八年（1304）由于献计平定抗元运动领袖宋隆济有功，升安抚使后与出自邓州名将世家的八番顺元宣慰使刘垓结为姻亲（其孙宋钦娶刘垓孙女刘淑贞），最后升任元代最高级别的土司八番顺元宣慰使（从二品），封顺元侯，追赠贵国公，宋氏从此任宣慰使直到明末。故马场末任曾竹长官宋阿重是水东宋氏首任宣慰使，也是贵安新区早期著名历史人物。元代安顺属云南普定府辖三州，其中习安州在

安顺旧州镇，由张氏任土官。八番顺元宣慰司管番民总管府有党兀等处即党武乡，党兀最初是部落首领名，至元三十一年（1294）归附元朝后五年一直不纳赋税，大德五年（1301）已79岁，所属部落反叛被元朝征讨时党兀又出降归顺。马场镇高峰山有始建于元初至元年间（1264~1294）的谷陇庵，是黔中最早的佛寺之一。

明代分属贵州卫、威清卫、平坝卫、金筑安抚司、普定卫、安顺州。洪武四年（1371）设贵州卫于贵阳，贵州卫所辖彭官堡在麦坪乡彭官村，刘士廉堡即麦坪屯在麦坪乡，袁方堡在湖潮乡元方村，吴朝阳堡即胡朝堡在湖潮乡，汪官堡在湖潮乡汪官村，卢官堡在湖潮乡卢官村，黄泥堡在湖潮乡广兴村黄泥堡，喜鹊堡在湖潮乡羊艾农场内，穿心堡在马场镇刘庄村穿心堡；洪武五年（1372）改金竹府为金筑长官司治长顺县广顺镇，洪武八年（1375）升金筑安抚司，辖及平坝区天龙镇天台山一带，并代管平坝驿；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威清卫和平坝卫，威清卫辖五千户所并管马场、芦荻等六哨，中所一堡和八堡即今红枫湖镇中一村、中八村和中八居委会；平坝卫及其辖五千户所均驻平坝县城，前所四堡即羊场堡（今羊昌乡），后所在今十字乡辖有四甲堡、六甲堡、九甲堡等，一度设乐平所于乐平乡；界首堡属威清卫柔远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设金筑驿，不久迁平坝卫改为平坝驿，正统三年（1438）改属贵州宣慰司，明清平坝驿经费由金筑安抚司万历四十年（1612）改为广顺州负责；永乐元年—洪熙元年（1403~1425）又置饭笼铺，直到民国改名天龙镇。成化十年（1474）设程番府于惠水县，隆庆三年（1569）迁程番府于贵阳改名贵阳府，贵阳府所辖石板哨即石板镇。明代普定卫有刘官屯，洪武十六年（1383）改习安州为安顺州（旧州镇），取习安归顺之意，先属贵州都司，正统三年（1438）设置流官改隶贵州布政司并迁普定卫城（今安顺市区），万历三十年（1602）升安顺州为军民府；元末有阿窝任寨长，明洪

武十四年（1381）归附后授习安州判官，建文四年（1402）亲侄阿宇袭职升本州同知，永乐五年（1407）张宠复故姓袭职升土知州，天顺七年（1463）张承祖袭职，宣德七年（1432）张杰袭职复土州同，弘治十六年（1503）张轼袭职，万历二十三年（1595）前后有张鹤翔袭职，万历二十八年（1600）左右改为土把总，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欲往安顺时有土知州被贵州总府囚禁，张氏直到清初1658年左右最终革除，故张氏从北宋初至清初基本世袭统治旧州一带近700年，是贵安新区历时最长的土司。元明时期水西安氏辖及七眼桥镇一带。万历二十八年（1600）江西庐陵人李仁宇随军入黔定居半边山建镇山村，是典型的布依族石构建筑村寨，1995年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中国与挪威联合建有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黔中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景泰元年（1450）平坝卫人卫兰中云南乡试庚午科举人，成为贵安新区第一位举人，1454年普定卫人赵侃中进士，开贵安新区进士之先河；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过平坝卫时称赞集市热闹，鱼肉不缺，足见明末贵安新区等卫所地区经济已比较繁荣。洪武五年（1372）江西高邮僧人秀峰号清林花纹银五六钱买得马场镇古陇山重建佛寺并改古陇山为高峰山，高峰山寺从此得名，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遁迹于此，相传现存“西来面壁”石刻就是建文手书，附近佳林村有1808年立碑的“有明从亡太监之墓”印证，为研究明初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提供了重要物证。天龙镇天台山有明清伍龙寺，始建于1590年，现存大佛殿和祖师殿分别建于1616年和1639年，是贵州目前已发现的唯一明代木构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分属贵阳府贵筑县、广顺州，安顺府普定县、安平县和清镇县。清代沿袭广顺州，所辖从仁里党武寨即党武乡，卢官堡即湖潮乡卢官村，杨艾寨即湖潮乡羊艾农场，芦荻寨即石板镇芦荻村。1671年改普定卫为普定县，所辖忠兴里有刘官屯；1687年分别改贵

州卫和贵州前卫、平坝卫及威清卫为贵筑县、安平县及清镇县，石板镇属贵筑县南上里和蔡关里；麦坪乡属贵筑县南上里和西上里；湖潮乡属贵筑县南上里；安平县所属有界首铺（夏云镇）、饭笼铺（天龙镇）和芦荻哨（红枫湖镇）等，县城北有后所四甲、六甲、九甲等寨为十字乡，县城西30里有乐平场即乐平乡，高峰镇属安平县柔东上排。清镇县所属定里二甲中一垵、中八寨等在今贵安新区。清代贵安新区有不少历史文化名人，石板镇芦荻村有古代贵州最著名诗人之一吴中蕃墓，吴中蕃（1618~1696），字滋大，一字大身，别号今是山人，贵阳人，后隐居党武龙山村，是明清贵阳八大家之一，卒后葬镇宁州华楚枝土门寨大坡（马场镇境），1991年迁葬芦荻村，芦荻村和党武乡龙山村分别有其旧居，著有《四书说》《响怀堂文集》《敝帚集》《明文选》等多部诗文集。白云镇有康熙著名学者、治水专家陈法墓，陈法（1692~1766），字定斋，白云镇槎头堡人，1713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是贵安新区第一位翰林，与孙嘉淦等硕儒号称康熙“四君子”，著有《易笺》《内心斋稿》《明辨录》《河干问答》《犹存集》等，其中《易笺》是黔人唯一选入《四库全书》的著作。陈法高足石板合朋堡人谢庭薰（1728~1798），字自南，1753年举人，贵州古代著名诗人，著有《洗心泉集》并全部刊刻成花溪是春谷摩崖，编修《独山州志》《永宁州州》《娄县志》等方志三部。清镇人张日昫（1791-1850），字东升，号晓瞻，181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武英殿总纂、文渊阁校理纂成《大清一统志》，官至云南巡抚，是贵安新区古代最著名文臣之一，著有《经苑》《庶堂集》《编修集》《古今人论说》等，红枫湖镇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梯青塔是其所建。1651年马场高峰山寺再次重建后鼎盛一时，1904年了尘改名已华正觉禅林，通称已华禅院。

民国属贵筑县、平坝县、清镇县和广顺县（长顺县）。1914年改安平县、广顺州为平坝县和广顺县，1915年贵筑县迁息烽

改为息烽县，贵筑县改为贵阳市；1939年广顺县辖党武等4区；1941年贵阳改市，贵阳市改贵筑县辖花溪等3区，划长顺县党武区入贵筑县，合广顺县和长寨县为长顺县；1915年贵筑县迁花溪；1913年清镇县一区驻县城，1943年改为县城等18乡镇。民国改曾周马场为马场并从镇宁州划归平坝县，1914年改安平县为平坝县，1930年改饭笼铺为天龙镇，1932年平坝县四区辖白云、天龙、平庄等乡镇，1949年二区辖夏云等乡镇，三区辖天龙等乡镇，五区辖乐平、凤凰等乡镇，六区辖十字等乡镇；民国高峰分属一、三区，马场先后属东区、二区。普定县二区辖今黄腊乡一带，三区驻嘉穗乡驻刘官，十区辖今大西桥镇一带。1914年贵州省佛教会在马场高峰山成立，已华禅院了尘任会长，1932年已华禅院参与创办贵州佛学院，1943年初已华禅院独立创办佛学院，包括预修班、普通部和研究部，学院董事会聘重庆汉藏佛学院院长太虚大师任院长，历时三年多，为贵州培养了不少佛学人才。1938年5月，国民党第八军102师304团上校团长天龙人陈蕴瑜在台儿庄战役中壮烈牺牲，追赠少将军衔，蒋介石书“忠烈可风”，李宗仁、何应钦、林森等政要题挽。民国白云镇有幼儿教育家孙铭勋（1905~1961），1927年师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陶门大弟子”美誉，坚持办教育30多年，有不少教育研究成果，是贵州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属贵筑县（花溪区），安顺地区（市）清镇县（市）和平坝县（区）。1949年贵阳解放后，贵阳专署贵筑县设4区，花溪区辖有石板乡、固增乡（党武）和彭官乡（麦坪）；次年改为7个区，1951年增加为10个区，其中三区驻党武，四区驻石板哨辖彭官乡，1952年贵阳专属迁贵定改为贵定专署辖贵筑县；1954年调整乡镇，三区辖党武等9乡，四区辖石板、芦荻、麦坪、湖潮等11乡；1955年6月到1958年元月贵筑县归安顺专署；1956年改三区为党武区辖党武等5乡，改四区为石板区辖石板、麦坪、湖潮等7乡；

1957年撤销贵筑县,次年2月贵筑县改为乌当、花溪两区划归贵阳市,花溪区辖党武、石板等3区2镇;1959年改乡为人民公社,辖党武、超美(石板)、高峰(湖潮)、燎原(麦坪)等12人民公社;1966年把花溪区和乌当区并为贵阳市郊区,次年恢复两区建制,1968年成立花溪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建立花溪区委员会;1984年改公社为乡,并改湖潮为苗族布依族乡;1986年改石板乡为镇。清镇县1992年改为清镇市,县城初建城关区,1991年改为红枫湖镇,所辖平寨村、芦猫塘村、中一村、中八村、兰安村、池菇村和中八居委会划归贵安新区。1950年平坝县保留夏云、天龙等4区,1953年增加第五区驻马场;1991年改白云区为白云镇,改马场区为马场镇,改高峰区为高峰镇,合并天龙镇和高田乡为天龙镇;2014年确定贵安新区有直辖区域及规划控制范围。

总之,贵安新区有两千多年文明史,牂牁文化灿烂,马场镇有晋代、南朝、唐宋和明清古墓群等文化遗存,民国佛教文化兴盛,是贵安新区文化富集区,可在马场镇选址新建贵安新区牂牁文化博物馆,与贵州省文物部门通力合作,全面深入开展辖区文化遗产普查,摸清文化遗产底细及分布情况,并充分利用安顺宁谷遗址、清镇平坝汉墓及马场镇各时代古墓出土的众多文物布置牂牁文化馆,广泛征集宋阿重、建文帝、吴中蕃、陈法、谢庭薰、张日昫、孙铭勋、陈蕴瑜等名人著作、遗物、图片及研究成果等布置贵安新区名人馆,精心布置贵安新区开发成就馆,全面展示贵安史前文化,特别是春秋至今两千年牂牁文化的独特魅力,全力打造“千年牂牁,筑梦贵安”文化品牌。文

(作者单位:开阳县文管所)

(上接第69页)

红九军团转战绥阳,给绥阳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红色遗产。文

(作者单位:绥阳县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 [1] 林伟著.战略骑兵的足迹[M].战士出版社.1983
- [2] 贵州省档案馆.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Z].2016: 131
- [3] 申振东、徐静.追寻红军在贵州的足迹[J].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111
- [4] 中共绥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绥阳风云录[Z]
- [5] 绥阳县老区建设促进会.革命老区绥阳[Z]

- [6] 中共绥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绥阳风云录[Z]
- [7] 中共绥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绥阳风云录[Z]
- [8] 田兵.红军在贵州的故事[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 [9] 周朝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 909
- [10] 李继红.罗炳辉年谱[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 [11] 中共彝良县委、中共昭通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罗炳辉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11
- [12] 中共彝良县委.罗炳辉将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0
- [13] 贵州省档案馆.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01-1645
- [14] 绥阳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绥阳县军事志[Z].2009

黔灵验泉的“圣泉流云”

文/图 多 林

清道光《山水画册》
中的圣泉

黔灵验泉



贵州泉水众多，溪河纵横，林木茂盛，山川秀丽，洞异泉奇的自然景观及气候宜人是有口皆碑，遐邇闻名的。

贵州的美泉奇泉多，难以一一叙述，这里仅说说省城贵阳的圣泉，这圣泉座落在城西北黔灵湖边的大山中、川黔铁路北站旁到三桥下五里的桢子山丫口之上，两山腰之间，现在北京西路建成，正好从其侧旁经过。以前此泉虽地处郊野，山路崎岖，但名声却远播于四方。据说此泉属潮泉类型，按

一般的潮泉，昼夜间只三潮或两潮，可是此泉却约十来分钟就涨缩一次，昼夜涨缩百余次，故也有“百刻泉”“百盈泉”的称谓，由于泉流独特，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灵异，看作奇泉，有了“圣泉”之称，自明代以后古人就将其纳入到了贵阳古八景之中，誉为“圣泉流云”载入史志典籍数百年。加上文人们的推崇，“圣泉”之名不胫而走，就连周恩来总理都知道这贵阳圣泉，他因国事经过贵阳的时候，还曾经指名问到过圣泉。

国内井泉众多，此泉能称奇泉，圣泉，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明人刘汝楫把国内名泉拿来比较，说这泉：“周览吴楚燕齐之墟，历考职方记载，乃知圣泉灵异，独黔筑为然久矣，大块中奇葩也。盖宇内名泉，若汤泉、火井、瀑布、趵突诸类，陆羽所品，次靡可缕，指特壤界，色味稍殊，而无潮汐。惟浦漳蜡湖，侯官潮泉、钟山应潮、连州潮泉，固亦消长有期，而其地濒海，乃缘海为潮汐，泉不得与也。若池阳潮泉、章贡三潮、安宁海眼、乐平凤游、荆门蒙泉、彬州潮泉、吾乡龙场驿潮井，去海殊绝，似与圣泉为伍；第彼潮侯，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长别具一橐籥者，则圣泉之灵且异，在别境宁腹有此乎？”

自古至今，此泉还引得不少文士和仕

大夫们为它题咏作记，达官显宦捐资为其培修，还被人们赋以传奇色彩。说观音洞有五百里的那位清代人陈鼎，也在他的《黔游记》中说：“……圣泉，味甘而冽”还说它“久服可愈痼，黑发，驻颜面，却老”，王士禛在他《池北偶谈》中说这个泉，若好人到，泉水盈缩有准，坏人到，则不缩不盈。《黔囊》说“游人置钱以卜休咎，下钱有准，其水渐盈及于罔好，即主休兆，若水安放于故或下缩，咎征应耶”《康熙通志》还把贵阳将来的人文发展与此泉扯上了关系，说：“……圣泉，勺水耳，何独此处为灵窍？曰，础润而滂沱至，壶水而巨泽坠，小固可以验大，且堪舆家蹊蹶眠龙脉，蜿蜒千里外，鍼所法不越毫芒，勺水虽微，不函地轴邪……圣水良，异矣，归不有苞倚毓秀，丕显地灵，俾之雄视西南，为寓内一大式廓，而与斯泉相应乎？即今省郡规模日恢，人文竞跃，其兆可征也，余敢识此以矣，庶后有睹验，不谓今日无前识云”……。

此泉培修情况，明朝以前无文字记载，到明弘治时期的《贵州图经新志》才记述道：“圣泉，在治城西五里，自山麓涌出，消长不一，本朝镇远侯顾成薨石为池，覆以亭，池中置石鼓，以验消长，其流灌田数百亩，亭侧有观音堂，郡人岁时灼观焉，贵阳八景曰“圣泉流云”。

顾成是明初洪武时人，受封镇远侯留镇贵州，逝于永乐十二年（1414），可见这每日“盈缩百次，消长不一”，被人们称为“灵且异”的圣泉水，在十五世纪明朝开国不久，就被镇远侯顾成所重视，用块石在泉眼处砌成井池，池中放一石鼓，供人们观看泉水的涨落，并在井口之上盖了一座亭子，供人们憩息或护泉之用，在亭的一侧还建有一座观音堂。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六百多年了。六百年来，久历沧桑，又地敝一角，其地面建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后来，亭子和观音堂不知何时何故不见了，到了“皇清康熙三十年，总督范承勋建亭其上”并立了碑记。亭子被人们称为“范公亭”还有“冷然范公亭，千载同清冽。”之句。到咸丰四年（1854）吴振棫的黔语中有“……道光丙午秋，与同人往游，有石亭半倾废矣，泉在亭外……”。康熙三十年“建亭其上”的范公亭也许早已倾圮，到道光丙午（1846）秋时，泉外的石亭又半倾废了。

今天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却是不知何代所建，与上述不同的另一种景观，井上覆盖的亭子身影已经看不到，只看见上书“圣泉观”三字及“灵湫”两字檐额的一座石牌坊，牌坊后有一座挂有“石裂云口”匾额似庙子的房子，好像是“圣泉观”道场。在牌坊与房子之间的右角下，有一不大的，方形的，露出地面好似井沿一样的建筑，估计那就是“……宽不盈三尺，深仅七八寸，冬夏不涸，每昼夜涨落百次，土人呼为圣泉”的圣泉了。老照片上充满沧桑面容的一应景物和圣泉观，也不知何时取代了原来的观音堂，就不知在古文献中能否找寻得到答案了。

可是，就是照片上的这些景物，也不知在甚么时候全部消失得一千二尽，总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这里已是一片干净的“茫茫大地”，周边的菜地中，被开辟了两、三亩大的鱼塘，圣泉水也湮没在鱼塘边的乱石泥土之下，默默无闻少有人知了。问及原来的景物是甚么时候消失的，有说毁于解放初期，有说毁于文革期间。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重视各种文化遗产、文物古迹的保护，曾把贵阳甲秀楼、文



民国前的圣泉

昌阁、东山寺、弘福寺、阳明祠……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加以维护修缮，然而到了1966年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名胜古迹也变成了“革命对象”，作为“四旧”遭到“横扫”，使很多具有历史、艺术、科学和旅游价值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文革十年，更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敢于对被破坏后的名胜古迹进行管理和保护，任其毁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政府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相当重视，成立了专门的文管机构，对文化遗产、文物古迹进行清理，修缮，保护。人们对文博保护的意识也逐渐增强起来。

“圣泉”作为遐邇闻名的名泉，贵州的文化遗产，贵阳的人文景观，在沉沦于荒烟乱石之地，湮没在菜畦塘水之下若干年后，经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圣泉水源在1981年重见天日，被发掘了出来，这泓泉源，自明初有记载起到再发掘出来，历六百余年，泉水还是汨汨不绝，周期性的盈缩也没有间断。一九九四年，市政府正式拨款，市政有关部门在此泉周边、鱼塘一侧辟了一个高于塘面的平台，在泉眼周围用白条石块新砌了一口水井，使泉水在井内自由涨缩。井上覆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仿古亭子一座，亭子东面临水的前方，新立了一座新颖式样的白石牌坊，坊额阳刻“圣泉”两字，坝子铺以平整的白石地面，边沿围以白石栏杆，所用建材均为上好优质材

料，用现代工艺加工制作而成，整个景观设计构思既传统，又高于传统，既古朴，而又有新意，亭子、牌坊和护栏布局得当，外型美观，雕饰精美。白石构件的整个建筑群落在这青山绿水的映衬下，真是亭亭玉立，极为美观。用老照片上的圣泉旧景观比对，除没有恢复古庙外，这发掘出来，从新恢复后的圣泉建筑群，不管从布局、造型、材料、材质、工艺哪个方面，都是历代任何时期的圣泉古建筑群及其景观无法比及的。

但圣泉这个文化遗产、地理奇观，其历古不衰久为人知的盛名，使它甚有知名度，虽经发掘整理出来，只可惜它地处偏僻，又没有其它附属配套设施，就显得景色单调，景区单一，使人有有来头，无多大看头之叹，以致目前游人尚为稀少，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使得这一文化遗产疏于管理，前些年景区还有违建房屋入侵的现象。

现在北京西路修建后已从这圣泉旁边通过，在附近与甲秀中路中坝大立交桥交会。这里位于贵阳主城区与观山湖区接合带的三马片区，与黔灵山景区毗邻，圣泉地处二桥往北到都拉营以远的，山峦起伏青葱翠绿长满林木的山脉林带上，与著名的黔灵山景区及其山脉两相对峙，迎面的山口之上是临空飞架的贵广高速铁路桥和呼啸飞驰的高速列车，山下是谷地形成一条长长的山峡，峡谷中的小关湖、黔灵湖，犹如一串串翡翠宝石，那称叫桥下水、大罗溪的市西河上游好似一条玉带，她们一路行来，配合沿途一应的人文景观，把峡谷中的景色点缀得美不胜收。

相信随着城市的建设，山体公园的开发，配套设施的完备，圣泉将会成为既有来头，又有看头的景点。❧

（作者单位：原贵阳市人防工程处）



今日圣泉

贵阳三才巷钱氏宗祠

文 / 图 谭佛佑

早在明末清初，贵阳拓展新城之后，新城的街巷随着市镇的发展建设，人口入住的增长也逐渐增多起来。至道光年间成书的《贵阳府志》，就载有一张《贵阳外城总图》，其中有一条当时就已有一定“名气”的小巷“三才巷”。从《总图》看，当年的三才巷西起于广东街口（即今喷水池东北角邮政电信大楼后的中华北路），东向紧靠黑石头越玉带河（即今之贯城河）上的“普济桥”，经琵琶井直抵新东门城垣，即原环城东路接三民东路处。巷虽小而不算短。小巷何谓以“三才”命名，有关史志皆无确切记载。或许与“三才者，天地人”，抑或“天时、地利、人和”等典故有关，这只能是笔者的美好遐想。“天时、地利”皆为“自然”，而“人和”，可能还有一点直接的关系。

早在清乾隆初，就有从湖南武陵入黔的钱氏维高公，在筑经商稍待发家后，遂在巷内购筑一座宏敞颇为壮观的居宅。钱氏也因此而占籍贵筑，其后代也皆为贵阳人。后钱氏皆继以贾为业，而且也多行善举，代有隐德。至道光中，维高公的曾孙钱鹏（字云程）少年时曾入塾就学，即以《论语》中“克己复礼”四字为立身行事之准则。后读《唐史》，尤慕认为是钱氏祖辈的钱徽为人，故又将其堂名曰“思义”，即“克己”

之意。钱徽为人正派，在任礼部侍郎时，曾拒段文昌和李绅“求第”的“请托”，后遭排挤谗害，被贬江州刺史。时有人劝其申诉，徽却说：“苟无愧于心，安事辨证。”待文宗立，复拜工部尚书，即以吏部尚书致仕。稍后，钱鹏未能继续进学，仍从贾经商，生活也算富裕，甘旨无缺，可谓筑中的“中产之家”。鹏有一兄名德滋，平日不务正业，提出要与鹏“分家”。在分得一半家产后，不数年便丧失殆尽，连生活都无着落。钱鹏又无私地分财与共，使之安心生活。待兄去世后，钱鹏对待寡嫂更为优厚，并且认真地抚育教养其子登云，胜过己出。尤其是教其刻苦学习，以求取功名。登云也能听其教诲，故在同治十三年（1874）荣登进士，而后进入仕途，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贵阳民间皆认为此事完全是钱鹏之力，成就了登云，并成为筑城士绅的一段佳话：“两家终其身以孝友闻”。

钱鹏在家境稍富裕之后，其志更为广大，凡乡里族亲旧友生活困难者，每年都不知要周恤多少起。各种社会公益，如修桥补路，“尚节”“养济”“育婴”捐输等善举，大者倡捐，细者独任，可谓孜孜不倦，“克己思义”。道光十九年（1839），贵阳孔庙不慎失火，损失惨重。钱鹏首捐输八百

金，亲自督其工役，得修复后的节余银两，又置田产，以作魁星阁的祭祀和岁修之用。时贵阳府城地势，西北稍高仰，而东南稍低俯。春夏贯城河之水常暴涨而泛滥成灾。钱鹏主动捐资，于城外上游沙沟等地修水闸数处，又筑堤以控水势。同时于威清门外头桥上游筑堰，将河水分流二道，一道流至次南门外，使下游得灌溉之利，一道经城西蓄水大塘，使周边民众冬日干旱而得饮汲之便。后人把这一善举，认为是贵阳“城根借水为池之始。”

咸丰初年，号军举事的战火，已近省垣贵阳。贵阳外城原来建造的土垣，很多都已坍塌。钱鹏亲往环城省视，立马向当道建议，并首先解囊捐资，将城垣易土为石，及早防患于未然。此项工程，筑城乡绅人士，一致公推由贵阳乡贤名绅、复圣颜渊七十六代裔孙颜承泽先生主理，是故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圆满完成。贵阳府城也在咸、同间的兵燹战火中，化险为夷。当时城北有一“布衣寨”曰“本土”。当地无学校，山民子弟无书可读。于是寨内常发生“械斗”，生命财产多有损失。钱鹏得知，多所感慨，于是专门捐资为其修建义学一所。延师教其子弟，至是风俗为之一变。

钱鹏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布衣处士”，能为社会和民众作出如此震惊当世，惠及后代的无量功德，得到无比高尚的社会评价和肯定。正如曾任滇抚的乡贤镇远人谭钧培，在其《墓志铭》中所说：“先生幼而孝友，长而慷慨。以夫开沟洫以通汲道，修城郭以杜乱萌，设乡塾以化桀骜，助婚葬以恤困穷，平跋涉以便行旅”真可谓“义著于乡，利周一国”。“仁民爱物”的伟大不朽的壮举，早在捐修文庙后，就得“乐善好施”的“奖额”。后地方奏请，特旨赏“盐运司知事，暨正六品衔加一级”，又“授承德郎”。就连后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也为其作《传》，最后还以人间之“大爱”，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天爱众人，父爱众子。小智自矜，强人辨己，尽爱之

理，天其福也，不吾言然，处士胡然！”

钱鹏有二子，长曰登选，字小云，号政甫，同治间由军功以道员分省加按察使銜，能承先志，惜其于光绪十三年（1887）早卒，年仅五十有四。次曰登熙，字青甫，同治八年（1869）补行乡试中举。由户部郎中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官云南道员。四署迤东道，一署盐法道。数监文武乡试，权充课吏馆长。在云南服官期间，皆勤慎宽和，晚年致仕归里时，竟两袖清风，行旅萧然。在贵阳以乡贤遗耆，辛亥前后，积极投入参与任可澄、唐尔镛等名流倡导的宪政活动，并不遗余力地创办新学，投身新教育事业。且或绩斐然，筑中有口皆碑。居家仍以孝友为务，待人接物尤以诚敬称著。至民国十八年（1929）以八十二岁高寿卒于三才巷故居。

在咸丰五年（1855）钱鹏逝世后，就以子贵又得诰赠“资政大夫”。其后又三十八年，即光绪十九年（1893）筑城乡绅及当道疏请，得入祀乡贤祠。其实钱鹏入祀的乡贤祠，就是钱氏在三才巷构筑的故宅，因宅中早已立有钱氏先祖的牌位，由后人供养。故钱氏居宅，民间又多以钱氏宗祠称之。当钱鹏入祀后，其名气尤为显著。甚至多方名士有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调任贵州巡抚的李经羲，皆为之题联赞颂。向知方先生在其《贵山联语》中载：“乡贤钱云程先生鹏，为青甫观察（清代对道员的别称）登熙太翁，祠在贵阳六广门内。李仲轩制军经羲题云：

先生非当代布衣乎？纯修岂举事可赅，盛德即至愚亦化，旌庐食庙，皆数十年后，乡人所争为崇报也，试问华宪名卿，孰能完行；

如公诚空谷足音矣，置身于夷惠之间，寄怀在羲皇以上，贤模道范，虽五千里外，俗吏犹闻而向慕焉，况与趋庭哲嗣，希接余光。

另外，楹联大师刘玉山也撰有一联，不过未明言钱氏，其标题仅言：“某绅乡贤祠”并引言：“绅以贸易起家，因富而贵，子若侄均援例出仕。歿后（下转第5页）

贵州锦屏宗祠文化述略

文 / 图 张继渊 杨秀源

宗祠，习惯上称为祠堂，是祭拜祖先、集中议事、宣扬族规、共同宴饮的场所，是血脉崇拜的精神家园，是宗族文化的符号象征，是传统人文的重要载体。笔者通过对贵州锦屏宗祠的修建、遗存状况的初步考察，简略叙述锦屏县境宗祠的兴起、分布、特征及其功能，以及探索当前形势下宗祠文化的抢救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和转型发展的路径。

一、锦屏宗祠的兴起

宗祠，习惯上称为祠堂，是祭拜祖先、集中议事、宣扬族规、共同宴饮的场所，是血脉崇拜的精神家园，是宗族文化的符号象征，是传统人文的重要载体。宗祠的起源与发展与古代宗法制度有关，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宋代之前宗祠为帝王、诸侯、士大夫所独有，明初以降宗祠的平民化、大众化、合法化的进程加快，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各高门望族纷纷建立了祠堂家庙，此后修建宗祠的活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明中后期民间开始大量修建祠堂的风潮在时间节点上恰好与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同步。位于清水江流域下游地区的锦屏县境的宗祠可能也是乘着这一大的历



新化寨欧式宗祠
《先序昭垂》碑

隆里古城状元祠外景



史背景而开始修建起来的。根据笔者田野调查，位于铜鼓镇嫩寨村的杨氏宗祠修建于明代，而在钟灵乡寨稿村《吴氏族谱》记载其宗祠最早建造于明正德年间。新版《锦屏县志》的记录可能更加接近实际，“县内宗祠开始有于明代后期，清乾隆以后宗祠文化大兴，宗祠发展较快”^{〔1〕}。明清以降，中央王朝势力对清水江流域的渐次开发，逐步打破这一区域相对封闭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在清雍正以后，对此区域的武力征服，以开辟“新疆六厅”，将“化外之地”施以改土归流，王朝国家不仅给这个区域输送了国家制度、正统文化及先进技术，也将宗族组织这样的有利于基层社会巩固的优势资源一并输送至此，从而掀起了修建祠堂、编撰族谱、购置族田的宗族化运动。

锦屏县的宗祠大规模地修建应该是清朝中叶以降，这其中不可避免的两个因素即是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繁荣及文化教育的昌盛，二者与锦屏宗祠大规模地修建密不可分。在清廷改土归流时既已对清水江河道开展了疏浚工程，确保了清水江这条“黔中通滇之孔道”的黄金水路畅通无阻，助推了王化进程，并逐步将清水江流域的河道网络体系纳入全国的经济市场当中去。随着木材的流动，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仍，出现了“木材东流，文化、财富西渐”的状况。当然，在围绕木材采运为中心的商贸活动中，位于清水江两岸的村寨借住地利与人 and 的优势，率先繁荣发展起来，积累了大量的物资财

富，故而清水流干流及支流主干道两岸的宗祠修建与遗存颇多。可以说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为建立宗祠所需物质基础提供了保障^{〔2〕}。毋庸置疑，修建宗祠的过程，也是文化利用的过程，移民、木商、匠人等人群从中原地区带来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特别是“贾而好儒”徽临商人群体深入清水江地区开展商贸活动，在与清水江流域原住民原生的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不断地将修祠编谱的宗法理念挪移到清水江地域上来。加上王朝国家对清水江流域这个边隅之地“上进之途”的倡导，科举功名人士的涌现，以及客籍贵州文人对此地的文化输送，得到了清水江下游地区民众的积极响应，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教育风气，并且长期浸润着这片土地。同时，宗祠的修建也要求倡修者们及其所在地的族众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底蕴，而这又是依赖当地较长时间的教育来完成的^{〔3〕}。正是因为有了较为深厚儒家文化教育的基础才催生着祠堂不断地增多。

除此之外，锦屏境内丰富的木材、青石、黏土和河沙等自然资源是建造宗祠最基本的原材料，多为本地原生，可就地近取，为修建宗祠提供了极好的建材保障。如果说上述的三个前提条件都已具备，尚需一个主观因素，就是族人还要有修建宗祠的意愿。从锦屏现存的一些族谱家乘和修祠碑刻中，不难看出，族内精英倡导与担当，加上广大族众的积极支持与响应，这才是修建宗祠的直接动力。

二、锦屏宗祠的分布

锦屏宗祠的修建兴起于明代后期，清初有部分零星修筑，到了清乾隆及至道光年间为修建宗祠的第一个繁盛期。清季的“咸同兵燹”对宗祠、家谱等宗族文化的载体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随之战争结束后的清光绪年间修祠编谱的宗族活动又兴盛起来，并且持续到了民国后期，为第二个繁盛期。新中国

成立以后的集体化时代很多宗祠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段为宗祠文化的式微期。1980年代中期以来广大宗祠得以修葺和复建，迎来了复苏的春天，即是第三个繁盛期。从明代后期以来，锦屏县域内修建了诸多格局各异的宗庙祠堂，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和地方志资料显示，锦屏县境内在历史上曾经有34个姓氏修建有111个宗祠，分布在12个乡镇的55个村寨当中。其中，已经损毁的有48座，现存的63座，囿于篇幅限制，不一一列出。

锦屏域内的宗祠在历史上经历过不寻常的命运，在这些涉及26个姓氏27个村寨的48个已经损毁的宗祠中，多数尚存遗址遗迹，少部分因为岁月变迁已没有相关印记，特别是铜鼓古城宗祠群在“文革”期间“破四旧”斗争中多数被损毁，新化府城宗祠群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集体化农业运动中也多数被拆毁，仅存刘家祠堂等几座，现在民间还在传唱着“刘家祠堂花又花，闵家祠堂盖过它。黄家祠堂堆粪草，李家祠堂烂稀巴”这样的童谣。还有更多的祠堂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校舍、粮仓、办公楼等公共设施，使其原始功能发生了转变，后来没有再恢复，任其湮没在历史当中。如果说上述政治运动导致宗祠损毁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作为历史建筑的宗祠也遭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拷问，如1970年夏清水江干流洪水迅猛，损毁了“内外三江”的多座宗祠，又如宗祠在没有管护的时光中受到风雨的风化剥蚀及冰雹雪灾的袭击，导致宗祠木质构件腐烂、砖墙上面的粉膝脱落，屋脊上的青瓦破损，这些都是由于这些自然力长年累月渐进性破坏而造成的。

锦屏县现有15个乡镇，192个村居，228个姓氏，23.61万人，目前全县遗存下来的姓氏宗祠有63座，其中砖混结构的15座，砖木结构42座，木质结构6座。涉及11个乡镇，37个村，21个姓氏，其中列为县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宗祠仅为10座，占宗祠总数的16%。从宗祠遗存的乡镇分布上看，新化乡有12座，居首位，敦寨镇次之，有10

座，偶里乡9座排在第三位，随后是钟灵乡7座，隆里乡6座，三江镇、平略镇各5座，茅坪镇、平秋镇各3座，铜鼓镇2座，启蒙镇1座，共计63座。从宗祠遗存的姓氏分布上看，位居第一位的是锦屏县第一大姓龙氏，有16座，杨氏随其后为9座，吴氏8座，王氏6座，欧氏3座，闵、刘、欧阳、姜、李各2座，文、江、朱、陈、沈、范、罗、胡、黄、潘、曾各1座。从遗存宗祠的地域范围上看，主要分布在两条主线和四大区域上。主线上，以清水江及其支流河道为基础，一是开寨、“王化”较早且为各朝代政权组织机构和基层自治组织所在地的亮江流域；二是通商水运条件便利，木材贸易活跃且开寨相对较早的清水江锦屏段的中下游地区。区域上，以进入国家视野的时间为前提，则为县境的东北部（三江镇、茅坪镇）、中部（钟灵乡、偶里乡、平略镇）、东部（铜鼓镇）、南部（新化乡、敦寨镇、隆里乡及启蒙镇的地茶片区）、北部（平秋镇靠近小江流域的东南片）。中部、南部密集，东部至北部渐少，西部宗祠数量极少。能在相对狭小的边圉之地锦屏县域内建立起这么多的宗祠，不能不说是清



隆里王氏宗祠

水江地区边缘族群寻求国家认同的强烈诉求，是不同宗族间相互攀比的竞争后果，更是移民社会求得生存的智慧策略。

三、锦屏宗祠的特点及功能

（一）建筑风格

从建筑的格调来看，锦屏宗祠大多是外砖墙、内木构、侧墙顶部为马头墙的砖木结构样式，略具徽派建筑艺术格调。锦屏的宗祠几乎都是请湖南、天柱等地的师傅来修筑建造，而在清水江下游地区建筑文化又多存在“宝庆匠人”的历史记忆。这些祠堂或精巧端庄，或古朴凝重，虽然建筑规模不一，风格各异，但却极具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其在借鉴徽派建筑风格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揉合进苗、侗民族古建筑元素，通过不断地改进和充实，形成了具有锦屏本土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具体有如下几类：

1.燕尾墙牌楼侧墙飞檐翘角式，砖混或砖木结构。宗祠牌楼的顶部艺术构件似燕子尾巴，为燕尾墙。这款建筑整体上是四周为封火墙，绝大部分的两侧山墙为马头墙，内部为木质结构，如三江镇卦治村龙氏武陵堂，敦寨镇平江村龙氏和隆里乡隆里所村江氏等姓的宗祠，即是此类。

2.隆起状复式牌楼侧面马头墙式，砖木结构。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为马头墙，其构造随屋面坡度层层迭落，以斜坡长度定为若干档，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以小青瓦，并在每只垛头顶端安装档风板。如三江镇卦治村文氏、茅坪镇阳溪村龙氏、偶里乡寨欧村龙氏等宗祠的侧墙均系此类。

3.塔尖式牌楼侧墙飞檐翘角式，砖混或砖木结构。如启蒙镇地茶村杨氏、新化乡新化寨村欧氏就属这款，这种款式非常美观精致、古朴典雅。

4.融合式牌楼侧墙飞檐翘角式，砖混或砖木结构。如偶里乡寨先村吴氏、龙氏、王氏，钟灵乡寨稿村吴氏，平略镇八洋村杨氏等姓的宗祠均为此种款式，其砖混结构的好

处在于保存年限较长。

5.木构式牌楼侧墙飞檐翘角式，砖混或砖木结构。如三江镇令冲村龙氏、敦寨镇龙池村龙氏等宗祠即为代表。牌楼为木质结构，山墙为古朴的马头墙。

6.全木构款式。如平略镇平鳌村姜氏的上祠和下祠，即是此款的代表，在山间的木楼人家中也与普通民居各异，显得比较突出。

（二）布局特征

清水江地区民众建造祠堂总的原则是尊重地形地貌，依山傍水顺势而建，以达到“藏风聚气”的目的，故而选择的位置往往是村落中风水最佳之地。宗祠的布局，一般都采用轴线对称布局。祠堂院落大都为二进，偶见单座、三进，一般由大门、仪门、走廊、明楼、享堂、寝堂等组成。有些祠堂在后部开辟庭院、花园，不少祠堂还附设戏台。由于祠堂是祭祖的神圣场所，因此它往往是乡村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充分注入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宗祠的分类，一般分为两大类：姓氏祠堂、族中名人专祠，其中前者约占96%以上。姓氏祠堂有“总祠堂”和“分祠堂”之别，“总祠堂”是全宗族的祠堂，即大祠堂，“分祠”和“支祠”属于“分祠堂”。如敦寨镇培寨村原是潘姓聚族而居的村落，曾经修有潘氏宗祠，为总祠堂，而后部分族众移居仅两里之隔的敦寨村繁衍生息，建立了“潘氏支祠”，但如今潘氏总祠堂已毁，潘氏分祠堂升级为潘氏宗祠。建在锦屏境内有5座族中名人专祠，如隆里乡隆里所村的王龙标祠（也叫状元祠，已毁，2014年重建），纪念王氏先贤唐代诗人王昌龄；又如新化乡新化所村懋公祠，祭祀新化闵氏因军屯入黔后的三房始祖。

宗祠内外布局特色最为直观，在内部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而且龛前都有香炉、烛台等祭祀用具，祠堂内都有祠联或行第序列，横梁或四周墙壁上悬挂有牌

匾。而在外部一般都有三个门：中门为大门，门上写有姓氏祠堂的名称，如“×氏宗祠”“×氏祠堂”“×氏支祠”“××公祠”等，左右两边为仪门，门上写有“入孝”“出悌”等字样。当然，近十年来族众自发复修或重建的祠堂，一般布置比较简略，建筑艺术失色不少。

（三）主要功能

锦屏先民不遗余力地修建祠堂其目的十分明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承载了祭祖溯源、敬宗收族、劝谕励志、张扬族威、传承文化的功能。

宗族化运动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功用乃是为了寻根问祖、追本溯源，主要体现在祠堂的祖先牌位、建祠碑刻、先祖画像、姓氏简介、诗词楹联和贺匾祝辞等方面，均是围绕祭祖溯源的主题，传达出长幼尊卑的人伦秩序和孝悌忠信的道德观念。修建宗祠的目的之一就是敬宗收族，以敬奉祖宗的方式教育后代秉承祖先遗志，以达到延续家风、感念祖德、凝聚力量、收拾人心的目的，其传达尊祖敬老的传统美德也得到国家的宣扬和社会的认同。兴修宗祠的作用还在于劝谕和教化子孙，有些宗祠当作传道授业的场所，由宗教机关变成“教育机关”^[4]，在培育宗族人才，勉励后辈勤奋耕读，谋求上进之途，报效国家，造福社会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祠堂是执行族规家法的场所，是宗族组织的权力空间，它本身是威严凌厉的，族人对此心怀敬畏，同时宗祠的规模大小、建筑材质、装饰物件等可以直接折射出该宗族的族众力量、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精美大气、装修华丽的宗祠给族人以鼓舞士气，炫耀气势的作用。宗祠还集中展现建筑、楹联、书法、绘画、雕刻、戏剧等文法技艺于一身，充满了多元的传统文化气息。建筑文化以敦寨镇雷屯村朱氏宗祠为代表，楹联文化以启蒙镇地茶村杨氏宗祠为典型，书法文化以隆里乡隆里所村江氏宗祠为示范，绘画文化以新化乡新化寨杨氏祠堂为样板，雕刻文化

以隆里古城宗祠群为典范，戏剧文化在新化所城宗祠群就曾经开展过新化汉戏和高台舞狮的表演。

五、锦屏宗祠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

从上文可知，宗祠面对现代化冲击的今天，很多已是斑驳残破。乡村民众的宗族思想观念正在逐渐改变，宗族文化悄然发生蜕变，这一批批亟待抢救的民族文化遗产，面临着现代的转型与发展，宗祠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了时代课题。

抢救和保护宗祠要建立长效性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力量和族人三位一体，共同协调完成。在当下，需要政府从中把关，起到引导作用，摒弃宗族文化的糟粕部分，积极宣扬向上的一面。首先，由政府出面成立县一级的宗祠文化管理机构，随后抽配人员认真开展宗祠文化资源普查，做好数据收集和建档工作。根据普查的结果对宗祠进行有选择性的资金投入，注重区别对待。如果保存较为完好，历史气息浓厚且综合价值较大的宗祠可以将之规划为统一保护范围，但是在修缮过程中不仅要有相关专家进行指导，还有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还原宗祠原有的历史面貌。如果破损不堪，维修资金投入较大的，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其次，需要建立关于宗祠的抢救保护健全的法律法规，以此来规范和指导这项文化事业。政府也需要在落实保护责任，加强日常监管，做好宗祠与村寨其他建筑景观的统一规划，力求协调美观，不至于出现无序状况。同时，社会要加强对宗祠的保护意识，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舆论影响，阐明它的重要性和新的时代意义，有学者就呼吁以互联网为载体，建立宗祠文化数据库^[5]，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借助传媒的通达度让外界更多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关注和传承宗祠文化。毋庸置疑，宗祠的抢救保护与族人自身最为相关，修缮宗祠应由族中推选热心族事、责

任心强、有奉献精神的族人组成宗祠管理委员会，负责主持宗祠日常管理和修复事宜，以确保宗祠的能够更好的保护起来。此外还要积极配合政府对宗祠的抢救保护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号召族众筹集资金，以充实管理和维修祠堂的经费。但是政府在参与抢救保护宗祠文化事业中要遵循适度原则，在资金投入方面要以“族众集资为主，政府拨款为辅”的方式进行，因为还有考虑到族众对于宗祠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在抢救保护的同时，也要注意宗祠的合理开发利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继续扩展宗祠的现代化价值。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宗祠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宗祠本身是人文景观，只要略加修缮，将其适当地开发为旅游景点，以扩大影响和增加收入，但是要与周边的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资源有机结合起来。现今隆里古城内的数座祠堂和雷屯朱氏祠堂即是这样。不仅如此，宗祠的商业用途还体现在对外租赁，以收取租金，达到“以祠养祠”的经济效应，如茅坪武陵堂龙氏宗祠就发通告“每场租金360元（包括水电费）”的方式对外出租，以办酒席，这在宗祠未开发为旅游资源之前尚是可行之策。按照广东顺德等地的做法，在文物部门的监管之下将一个宗祠建设成为宗祠博物馆，充实祠内陈列品，让后

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宗祠建筑的精美和宗祠文化的历史演化^[6]，这个不错的参考，锦屏县可以在隆里古城宗祠群或者新化府城宗祠群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宗祠建设成“锦屏宗祠文化博物馆”，对人们开放，以形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局面。

此外，宗祠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还要与当今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积极寻求宗祠新的社会公用价值，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找准自身位置。努力把宗祠建设成为家族乃至村寨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教育后辈和民间调解的中心场地，宣扬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变为村寨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家园，村寨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承载中心。需要注意的是宗祠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要及时跟进，开发利用更是任重而道远，我们也将宗祠文化纳入到清水江流域文化的范畴来考量，要把木商文化、契约文化、青石文化与宗祠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用清水江文明的视阈统一谋划，协调利用，以展示地域文化的整体特色，从而发挥文化遗产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文

（作者单位：锦屏县文书研究中心）

注 释：

- [1] 锦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锦屏县志 (1991-2009)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1
- [2] 吴才茂、李斌. 祖荫的张力：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祠堂的修建[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1(3)
- [3] 袁显荣. 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探微[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09(4)
- [4] 林耀华. 义序的宗族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5] 杨子奇. 非透视视角下清水江宗祠文化保护策略管见[J]. 文化月刊. 2015(11)
- [6] 凌建. 顺德祠堂文化初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已经消逝的
锦屏县城王氏宗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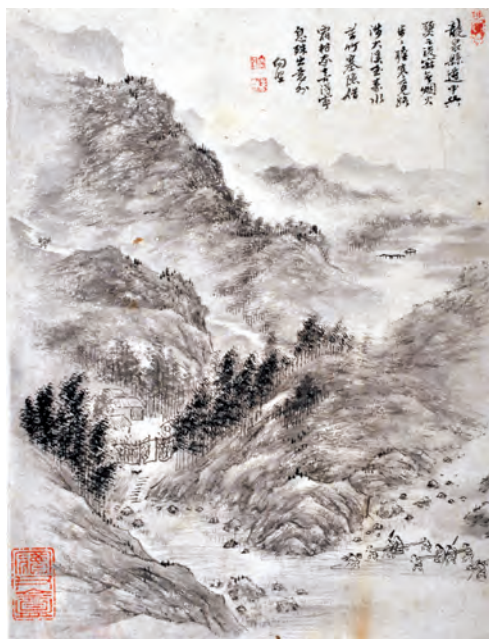


黄向坚《寻亲图册》及 《盘江图》赏析

文 / 图 朱良津

迄今为止，我们了解的最早的贵州题材绘画是清初画家黄向坚（1609——1673）的作品。他并非贵州本土人物，在艺术创作上，何以取材贵州风光，其中缘由，从清代张庚的《国朝画征续录》上卷中可以了解。书中云：“黄向坚，字端木，吴人。父孔昭以孝廉作宰滇中姚江，道梗不得归，向坚徒步往寻，涉历艰险周遍于瑶僮之地，……始遇二亲。盖自顺治八年十二月出门，至十年六月归里。”黄向坚此举，跋涉万水千山，历时两载。有此经历后自号“万里归人”。他的孝行在当时得到人们的赞扬，清初戏剧家李玉将其寻亲之举编为戏剧《万里缘》广为传扬。西南之行让他大开眼界，沿途景象与其熟悉的江南自然风景有很大的差异，作为一个画家，目之所及，情为之所动，笔为之挥洒，绘画题材为之一变，将自己所见的云贵风光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尽情地描绘，艺术风格亦随之与前有所不同。从这类传世的作品来看，绘成册者，或单独成卷轴者，为数可观，海内外公私皆有收藏。如《剑川图》《点苍山色图》《盘江图》等等，其中仅以“寻亲”命名的册页、立轴就有多种。对于西南之行的见闻感受，黄向坚亦写下了《黄孝子寻亲纪程》一书，以月日记事，叙述了沿途的艰辛险阻，及民风民俗，对于我们研究黄向坚其人及其后期绘画是有一定价值的。在艺术风格的取向上，黄向坚早先师法元代画家王蒙苍郁茂密，湿润华滋的画风，善用繁复的干笔，在构图上长于营造奇峰险境，画面的层次丰富，气势雄浑。这些在他寻亲之前就出现的艺术特点，也适合于他后来表现植被茂密，山势奇险，苍茫连绵的西南景象。对于他的绘画特点，前人有这些评价：

“干笔皴擦，结构严密，所写滇中之景



寻亲图册·
龙泉县涉水借宿

居多。”（清代秦祖永《桐荫论画》）

“渴笔干皴，构境奇险，气势雄浑。”

（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梳理黄向坚的作品，其中与贵州有关的，据笔者的了解有《寻亲图》册、《盘江图》轴。

《寻亲图》册，纸本，现藏贵州省博物馆，纵26.4厘米，横20.2厘米。册中共有画八页，均未设色，墨笔画成。画页顺序是一、《鸡足山》；二、《过浪穹道》；三、《经响水关》；四、《历罗甸国》；五、《登凯楼坡》；六、《龙泉县涉水借宿》；七、《越相见坡》；八、《渡湘水》。

从画幅的排列顺序上看，表现的是黄向坚寻到双亲后，由滇过黔入湘回程所见到的风光。这八幅画中，《鸡足山》《浪穹道》《响水关》三幅，所画的是云南境内的景点。第一幅《鸡足山》描绘在宾川县内的我国著名佛教名山之一——鸡足山。第二幅《过浪穹道》，画中所指，即清代的浪穹县，后几经改置，今属洱源县。第三幅《经响水关》，响水关又名关谷关，位于禄丰县境内，因山高谷深，水落叠滩，其声如雷，故得“响水”之名。杨慎曾在此过往，写下了“滇南形胜说迤西，第一雄关实可题。说险

高峰连碧藻，桥横阔涧跨虹霓。”的绝句，故响水关又有“迤西第一雄关”之誉。第四幅《历罗甸国》，罗甸国这个地点，据《黄孝子寻亲纪程》叙述：“初八日，路极荒奥山势天矫如楼阁，参云逼天，昼行多冥色，过龙场驿，城郭圯墟，殊觉惨淡，老父有吊阳明先生章，歇罗鬼甸。”可知在贵州修文县境内。第五幅《过凯楼坡》，凯楼坡在何处，同据该书载：“初九日，见村墟篱落，桃李芳菲，零落无人，莫测所向，遇樵者指迷，登岭，山雨忽来，岚雾腾空而卷，与之前后相追逐，歇平地，凄然一望，此在铜仁石阡之界。初十日，进杨柳湾早歇。十一日，到凯楼寨，新民辟土结茅，差堪栖宿。十二日，下凯楼坡。”（黄向坚《黄孝子寻亲纪程·滇还日记》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由此判断凯楼坡在石阡境内或与之相近之处。第六幅《龙泉县涉水借宿》，该幅画的是今凤岗县。第七幅《越相见坡》，相见坡在镇远县与施秉县的交界处。最后一幅《渡湘水》，顾名思义，所绘的是湖南景致了。下面我们对册中四幅贵州题材的画作，作逐一地述评：

《过罗鬼甸》所绘之处，前面已谈到据黄向坚在其游记中的记述，应在修文县。该幅行书款题于右上：“过罗鬼甸，群峰矗矗，烟嶂晦塞，崎岖莫辨，虽扶二亲踉跄下岭，不胜忧惧之至。向坚。”钐朱文引首印“苍人”白文印“向坚”“端木”。画左下还有一方朱文印“梦尹龢”，此印为清代贵州文人陈矩（1851——1939）的斋室印，他曾随黎庶昌出使日本，晚年从事文化学术研究，著有《贵州通志·金石志稿》《都匀县志》等。既钐有他的斋室印，这本册页曾经应为其所藏。作者在画中绘群山如戟，连绵不断。大概是为了表现款中所言的那种“烟嶂晦塞”的视觉感，用这本画册中其他画页都没有见到的重墨，以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所创的山石技法“米点皴”来画群峰，因为用墨，浓且重，加之大面积地淡墨烘染山间云雾及远处的天空，整幅营造了天



寻亲图册·登凯楼坡

昏地暗，山雨欲来的气氛。再有画左下几人疾行于山间小道上，图解了作者“虽扶二亲踉跄下岭，不胜忧惧之至”的心情。

《过凯楼坡》表现的地方，据作者在游记中自叙，应在石阡县内或附近的地方。这幅画行书款题于左上：“从悬崖峭壁间下凯楼坡，则泉壑云封，蹬路莫辨。昔人云：‘拨云寻古道，踏石度清泉’不意共二亲时时历此。万里归人黄向坚识。”钐朱文引首印“苍人”朱文印“向坚”，白文印“端木”，画右下钐朱文印“梦尹龢”。画右侧绘巨石呈倾斜之状，表现出悬崖陡壁的险势，人从其上的小径缓缓下行。画左下山头低矮，云来雾绕，小径、树木、屋居时隐时现，呼应了款题“从悬崖峭壁间下凯楼坡，则泉壑云封，蹬路莫辨”的文意。左侧的山头如此低矮的处理，让右侧的巨石，有高山将倾于前的险惊之感。在技法上，作者将用以表现山石的披麻皴及折带皴很恰当地配合运用，将高处悬崖陡峭的坚硬石质与近处山形圆润的平缓土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幅画在透视上采取由高处下望的“深远”之法，将远处的山峦淡墨抹成于巨石下端，形成苍茫深邃，悠远无限的感觉。

《龙泉县涉水借宿》这幅所指的龙泉县即今凤岗县。款文以行书题于画的右上方：“龙泉县道中兵燹之后，寂无烟火，步步胆寒，觅路涉大溪至寿水，苦竹塞险，借宿村家，喜得宁息，殊出意外。向坚。”钐朱文引首印“苍人”朱文印“向坚”白文印“端木”，画幅左下有朱文印“梦尹龢”。画中构图造景亦与款题相呼应，丝丝入扣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境。写起伏连绵的丘陵，山上树木零星，一片荒野景象。画前端所画的物象，表达了画中的主题“借宿”，两山间的竹林掩映着柴门、茅屋、吠犬。画这样一户人家，笔者以为不仅起到了表现主题的想法，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营造画面氛围和意境的思考，古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静”和“幽”借助“噪”和“鸣”反衬出来，而在此画中，一户人家的出现，

更增画面的荒寂之感。在这幅画中亦以点景人物来增强要表达的画意，画夫役抬滑竿涉水奔房屋匆匆而来，茫茫荒野，这一人家的出现，对于长途跋涉，饥困交加的人而言，无疑如同久旱中的甘露，寒天里的火炭，亦同样衬托了喜悦之情。在读这幅画时，亦使笔者联想起唐诗中“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蕴意。技法上，黄向坚以散锋破笔来表现竹林的层次，用最适合表现土山的披麻皴，连带擦笔，以求浑郁苍然的效果，来画连绵起伏度较低的山坡土岭。

《越相见坡》这幅，作者行书题款于画幅右上：“进紫冈油柞，历相见坡，众山猗藿，如狮蹲虎踞，云日多异色，望之魄骇。过大溪，复穿入岩穴，约里许，得樵径



《盘江图》轴

以行，真异境也。向坚。”钤白文引首印“苍人”朱文印“向坚”白文印“端木”，画右下有朱文印“梦尹璽”。相见坡紧邻作为镇远县与施秉县分界线的相见河，自古连接外地与黔贵的古驿道从此经过。黄向坚在画中，绘一湾河道，两岸青山，山头以散锋之笔表现松树，由远及近，似有似无，虚实之间。这幅画采取了感觉由下往上望去的中国画透视法——高远之法。把贵州山峦重重叠叠，形势雄险，令人望之色变的状态表现出来了。画面构图，物象造型，与题款表述的感受是合拍的。在画中有一点景持伞人物，顶着风雨，行进于山顶小路，不难让读者感到那种山道上的艰辛。山下溪边，几人乘舟渡水，结合款文理解，大概是黄向坚在画“过大溪，复穿入岩穴”将看到“真异境也”的情景了。亦可见作者苦中有乐的浪漫主义情怀。

前面已谈到以“寻亲”命名的图册有多种，此为其一，其他图册分存何处，具体画幅内容如何，笔者见闻所限，尚需继续查找了解。

下面谈谈同样珍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黄氏单独成幅的作品《盘江图》。

此画描绘的是今晴隆县关晴北盘江一带的风光，在画这幅画时，作者同样没有设色，以水墨画成。画幅尺寸纵107.5厘米、横49厘米。画的款识以行书题于左上：“盘江波涛汹涌向崖，拔壑陡峙，铁索架桥，险扼甚于天堑，入滇要害处也。昔伏波征骑至此，城隅铜柱尚自卓立，渡此，凭不禁望洋而叹，若叠嶂层峦深林古迹未可殚述，又岂笔墨所能图其万一哉。黄向坚并识。”钤引首朱文印“万里归人”白文印“黄向坚印”朱文印“端木”。此画在透视上采取“深远”之法，全景式的构图，层峦叠嶂，山势连绵，给予观者迎面的感觉就是一种大的气势，把贵州山高道险，辽远苍茫表现出来了。此地明末清初有铁索桥，后来桥毁，重修，又毁。画中所绘的桥，应是明末清初时的那座。作者将江流与铁索桥画于下

端，让读者产生俯视的感觉，江水似由上往下流，更增加了一种险势。江岸两山松柏呼应，画右边绘城郭人家，画左绘一持伞者欲上桥过江。笔者以为这一点景人物，应该是作者入滇途中的自我写照了，与《寻亲图》册相比较，前者描绘的是来路的风光，后者表现的是回程的景致。画中山石以披麻皴兼折带皴画成，多擦笔，山石苍郁浑厚，墨色层次丰富，虽然并没有用重墨，但画面的厚重感很强。江水波涛滚滚，用线条来表现，以淡墨来烘染，使得烟波江上，江流若有若无，唯涛声在耳。画下端的处理方式与画上端的叠嶂丛峦，烟来雾去是呼应协调的。

无论是《寻亲图》册抑或《盘江图》轴，从技法，风格上看，应是黄向坚在相近的时间内创作的表现滇黔风光的作品。画面均未设色，并重视墨色的变化，注重擦笔的运用，亦刻意运用淡墨在画中的渲染。这些连皴带擦兼染的办法，适于表现云贵植被繁茂，雨水丰沛，苍山迷蒙的自然景象。

在《寻亲图》册及《盘江图》中，黄向坚每画必题，图文并茂。读者赏画品文后，甚感画境文意紧紧扣合，对两者有相得益彰的理解。另外，这些作品都是以实景作为依据进行创作的。我们在读画里款文时，从作者抒发的感受中知晓这些景致在其脑际里留下的深刻印象，行色匆匆的寻亲路上，不一定有写生稿作为后来创作的素材，但画家仍能以挥之不去的记忆，加上对这些自然风光的主观理解，借助精湛的笔墨技艺，来展现黔山贵水的独特韵味。❶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红九军团转战绥阳

文 / 吕金华

红九军团，1933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组成的，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罗炳辉被任命为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此后，红九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广昌保卫战中牺牲惨重，1934年10月，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在长征出发前夕，红九军团达11500人左右，但枪仅有3650支。后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减员至3000余人，于1935年1月3日强渡乌江，5日抵湄潭县城。第8团于7日向绥阳挺进，在郑场和县城搞宣传、打土豪、分浮财，还在郑场成立了红色区政府，在县城成立了农民协会。20—21日离开县城去遵义和桐梓。3月初，红九军团又开进绥阳蒲场，完成了佯攻县城，诱敌向东的任务。后来，红九军团留下一百余人成立遵湄绥游击队，在绥阳境内也有战斗。

一、一本长征日记关于红九军团过绥阳的记载

有一本书，书名叫《“战略骑兵”的足迹》，是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作战参谋、测绘员林伟写的一本长征日记。该书对长征中一些重大事件、战斗，党中央的一些部署、方针，全军行动方向的更改变动等，都

尽其所知，记述甚详。从一个侧面较系统地反映了红九军团的战斗历程。该书真实地记录了红九军团经过绥阳的史实。现摘录与绥阳相关的部分如下：

一月七日（阴）

今日我军在行军途中利用休息进行整顿工作，政治部人员先行出发，于上午十一时许，全军团整齐地开入湄潭城。部队通过巨长的大街，街上观看红军入城的群众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红旗飘扬，有的还燃放鞭炮。军团直属队就驻在城里，七团驻城郊，九团继续西进，奉命占领永明县城，八团向绥阳北进，进占该城。

一月八日（晴）

九两团都打来长途电话，他们已分别顺利进占了永明、绥阳两城。

一月十一日（阴）

今天又扩大了新战士二百多名，在绥阳、永明的八、九两团也来说扩兵成绩很大，已扩兵达千多人。

一月十二日（晴）

几天来，大家都热烈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扩军。自从到湄潭、绥阳、永明数天，已扩大新战士达两千四百人，使各个老连队都得到了很大的补充，此外还成立了补充团。

一月十七日（晴）

后续部队源源沿遵桐公路北进。薛岳、周浑元两部亦离开了贵阳向北前进。我军在湄潭、绥阳、永明三地加紧进行准备工作。

一月十九日（阴）

我军团直属队、七团及驻永明之九团，于今日分头出发，向桐梓前进。下午四时进到新门寨，只走了四十多里。

一月二十日（阴）

周浑元主力已过息烽北进，其先头已达乌江。我三军团已在遵义、四都（泗渡）站途中。军委部队已离开了遵义北进，红五军团殿后，大军正在巨长的川黔公路上。

今晨七时就出动，离开了这个尽是石垒草房的新门寨，下午三点进到绥阳县城，我们就借住在一所中学校里，八团在此已休息十多天，也已准备好今日北开。经过我们参谋处同志宣传的结果，有五名中学生参加了红军。

绥阳城不大，地处平原，数面尽是水稻田，也都是茅草房屋为多。黔北文化很低，县城能有一座中学校，但学生只有三几十个人，小学生也不多，有的学生还是半读。这里的人们头上均扎了一大圈黄白色的粗布巾，教员学生还吸鸦片。

总政又发来文件报纸很多。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红星报》，登载了右路军一军团在乌江战斗的经过和英雄们的消息。二号渡江未成，三号早晨打过乌江并在追击中消灭了敌人，此次战斗中有英雄二十一人。其中有一营营长罗有保，三连连长毛正华，机枪连长林玉式，二连政指王海云，二连青年干事钟锦文，二连二班长江大桥，二连连长杨尚坤，英雄战士王家福、王有才、唐占钦、羽辉明、赖彩芬、曾传林、刘昌华、钟家通、朱光宜、林文来、温赞元、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

按：由于这篇日记写于绥阳，故全录。

一月二十一日（晴）

今天从绥阳出发，由永明出发的九团也来到了，一齐向川黔路前进。沿途群众群相雀跃，在路旁欢迎红军。下午五时，我们就

进到板桥车站附近宿营。

从这些日记中，我们得知了这样一些信息：

红九军团的第八团于1月7日向绥阳挺进，到1月20日离开绥阳，时间长达14天。而七团、九团，及军团机关，于20日、21日陆续到达绥阳，于21日全部离开绥阳。一进一出，总的时间是15天。

红九军团曾在湄潭、绥阳、永明三地扩军，到12日就已扩军2400多人，以后几天还在继续扩充，到20日，绥阳中学还有5名中学生参加了红军。这说明绥阳至少有数百人参加红军。

林伟的全部日记中，1935年1月20日的日记是写于绥阳的。并记录了绥阳的一些基本情况。

写出了绥阳人民欢迎红军的情景。

二、红九军团一进绥阳

在《绥阳县文史资料选辑》《绥阳风云录》《革命老区绥阳》《革命老区蒲场》《我爱坝坝》等文史资料中，记载了大量红九军团一进绥阳的行迹，大致情况如下：

1935年1月7日，中革军委收到红二师进占遵义的电报，同日21时，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的《关于我野战军渡江后行动部署的指示》中，预定了红军攻占遵义后，建立新苏区与扩大地域的大致范围，并规定了各军团的发展方向及负责开辟的地域。

12日20时30分，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湘川黔敌军活动情况及我军之部署》指出：“九军团司令部驻湄潭，以一得力团进驻绥阳。”其实，红九军团第八团已于1月7日就挺进了绥阳。第八团是由湄潭县城出发，经湄潭官堰，翻越五里坡，过小关、飞水，进入郑场小镇。一部分干部战士留在郑场开展了宣传、筹集军需和扩大红军的工作。

红军入郑场后，分散驻扎在张王庙、

狮子山、周家花园、禹王宫和张涛家等地方，不入民房。休整时，坐在街两旁的石阶梯上，决不吃、拿老百姓的东西，连水也不随便喝一口。部队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信任。原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而逃避的群众，一两天内就回家来了，街面照常开门做生意。红军三三两两深入群众家中做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街上贴满了“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我们‘干人’的队伍！”“拥护苏维埃政府！”“参加工农红军！”等标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红军在郑场的讲乐亭处，召开了有五六百穷苦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红军向到会的“干人”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穷苦大众起来闹革命，推翻压迫人民的剥削制度，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根据穷人的口头推荐和红军调查了解的情况，由“干人”代表谭信章和贺四爷，与红军接头联系，并由谭信章担任区长，管理社会事务。“干人”当区长，在郑场还是第一次，穷人感到扬眉吐气。平时被人称为“叫花子”的文继才，像换了个人似的，再不邈邈委琐，还沿街打锣呼喊，向穷人传达红军的安民告示和开会通知之类的事务。

红军在郑场清算没收了豪绅大户从穷人那里剥削得来的粮食、猪肉、盐巴、衣物等，经造册登记后，逐一分给穷人。群众心头十分高兴，知道了红军是真正为穷苦人撑腰的队伍，从内心佩服红军，自愿要求参加红军，同他们一起去打天下。当时，郑场就有洪少奇、宋德安报名参加红军。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处于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他们却毅然决然地参加红军，这充分证明，红军在郑场虽然才短短几天时间，却在老百姓心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14日14时，军委发出《关于一军团消灭新站敌军及打击川敌增援的指示》，电令：“九军团警戒向乌江下游思南、沿河运动之湘敌刘建绪部，派1个团进占绥阳县

城，同时向正安方向警戒。”其实，第八团早已进驻了绥阳县城。

红九军团八团入绥前，绥阳县城的政要们早已如鸟兽散。八团大部由郑场翻永山坎，过南门桥，一枪不发便进占了县城。

红军当时的地方工作任务，主要是重点清算和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农民革命委员会和农民自卫武装组织；没收恶霸地主的财产，并将钱、粮、物分发给穷苦群众。

红军入城以后，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对市民秋毫无犯，忙着分头去做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有的去书写和张贴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反动军阀王家烈！”等标语贴满全城大街小巷；有的三三两两深入老百姓家中，做口头宣传发动工作。

通过广泛宣传，很快发动起来一批强烈要求革命的积极分子。经筹备，成立了黔北第一个农协会——绥阳县农民协会。农协会由缝纫手工业者高海堂任主席，理发工人姚朝珍任副主席，商会会长张顺才任宣传委员，其他委员中还有汪元和、黄长青、代银舟、杨青山、康玉成、杨吉武等。

农协会成立之后，遵照党和红军的有关政策，紧紧依靠贫苦农民，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开展清算和打击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革命斗争。红军和农协会在县城镇压了陈小波和曹青云（绰号烂鼻子）两个作恶多端、民众痛恨的坏家伙，为县城人民除了祸害，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当时被清算和打击的还有：王永政、谌丙之、丁斯伦、张美久、郑鼎雍、刘子安、卢开舟、张伯恒、赵玉书、金仲三、金瞎子、段大富等。没收其金银财宝、粮食、布匹，并分给穷苦人民充饥蔽体。分果实这天，红军和农协会在绥阳中学的文庙召开群众大会。会上，红军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农协会副主席姚朝珍讲了话。红军和农协会成员演出打倒蒋介石、打倒王家烈的活报剧，将数百石粮食，近千件衣物分给贫苦

大众，使长期被欺压的穷人受到极大鼓舞。如穷人李维华的母亲分得半新旧的被盖1床，高坚伯的祖母也分得被褥1床、板凳两根。据苟文龙回忆说，那时，他才十五六岁，一踏进绥阳中学校门，红军看见他穿得十分破烂，就发给他1套衣裳，又给他两块猪肉，他一只手提一块，高兴地飞快跑回了家！当红军和农协会打开丁斯伦家的粮仓时，六华里外任大坝的陈德阳全家也来分粮。

遵义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挥师北进。1月19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进入桐梓，侦察赤水道路。于是，红九军团八团一路经牛心山、蒲老场去遵义，一路经枳坝、岩坪、宽阔去桐梓。据《遵义市志》第二十五篇《红军长征在遵义》记载，红九军团司令部于1935年1月17日移至绥阳，18日驻绥阳后水大桥。

红军撤离绥阳时，敌人在蒲老场狮子山处暗扎得有一个连，敌营的枪一响，9个负责断后的红军战士边扫射，边猛扑上去，吓得敌人屁滚尿流，四散逃窜。这时，尾追之敌前锋上来了一个营，红军战士见寡不敌众，便吹号停止攻击，即刻聚拢去追赶主力部队。其中一位红军战士因受伤掉队，一直坚持战斗，并周旋了好几个地方，力图拖住敌人，让前面的部队安全撤离。后来，因弹尽力竭，被敌人抓住。敌人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姓红名军！”敌人便把他杀害了。

红军经过蒲场时，在街上遍贴标语，满街人夹道欢迎。那些受反动宣传躲到山上去的人也返回了街上。为此许多人争着为红军当民工，蒲场镇上街有个街民叫詹国安，给红军当民工挑东西，红军发给了他两块银元。方少轩、彭玉顺、王尤川三人，经过封门垭时，正值红军炊事班在那儿做饭，红军还热情地请他们吃了饭，并请他们挑东西到板桥。到了板桥后，红军给了他们每人两块龙板大洋。在蒲老场小学教书的陈晓峰老师，还曾为一个红军小分队带路，把红军小分队送到了五里坎，红军给他一块银元感谢

他，他说什么也不收。

正当红军主力挥师转移继续北上之际，国民党第二十五军蒋丕绪师尾追而至，国民党绥阳县县长王槐熙等也跟着返回绥阳县城。他们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大肆搜捕红军留在地方养伤的伤病员；对农协会及其成员进行反攻倒算，将农协会主席高海棠、宣传委员张顺才残酷杀害于县城东门外的李家坟堡。同时，还准备将农协会副主席姚朝珍、委员杨青山、梁玉和等一起杀害，但反动派迫于群众的呼声及一些具有正义感的绅士出面具保，这些人才幸免于难。

红军走了，农民协会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但红军和农协会的影响并未消失，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泯灭。在白色恐怖的岁月，幸存下来的农协会成员和广大的绥阳县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隐蔽和救护红军伤病员，留下了一个个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如县城西门外有一家老百姓冒着全家生命危险掩护一位红军伤病员，将红军伤病员乔装打扮成卖芝麻糖的小贩，卖了一年多的糖，待身体复原后才离开绥阳，去寻找红军主力。又如县城开陶瓷店的蒋玉清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三名红军战士在家里养伤，差一点被搜了出来，后来只能转移到天台山的一个山洞里继续养伤，待伤愈后离开。《红军在贵州的故事》一书里载有一篇《柞蚕坡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姓万和一个姓古的红军，因受伤留在遵义和绥阳交界处一个姓林的穷苦老汉家里养伤，为躲避搜查，林老汉找人把他俩抬到一匹大荒坡脚下搭了个棚子，让他们在那里养伤，并给他们送食物，两个红军战士在养伤的过程中，开荒种了一坡柞树，并教林老汉他们养柞蚕，后来人们就把那匹坡叫成了柞蚕坡。一位年仅16岁的红军伤病员，由蒲场七甲坝农民肖文章收养为义子，肖家给他取名肖玉文，后来人们都叫他肖红兵，他于1961年，经政府部门联系，使他带着家人，回到江西吉安老家居住，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一家茶场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于1997年逝世。

红军战士林少成和刘少荣，因参加娄山关战斗挂彩，来到绥阳观坝养伤，后来在后台村当了农民，分别于1962年和1963年逝世。

三、红九军团二进绥阳

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经三元场和习水，于2月间到达赤水附近。中革军委原打算指挥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两岸调集重兵堵截，中央红军主动放弃渡江计划，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河，重新向敌防守力量空虚的贵州腹地进军，并在敌军未弄清红军真实意图时，分兵向南，直逼敌防守薄弱的贵阳城。为了保证红军主力南渡，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执行掩护和迷惑敌人的任务。

1935年3月3日，中革军委发了一份《关于侦察绥阳敌情致红九军团电》，电文中说：“应派一个得力的团，并带卅分队电台，于四日拂晓前由现驻地观音阁，向绥阳前进，明晚应到达蒲老场，伪装主力先头部队，进行侦察佯攻，散布主力进攻绥阳的谣言，并借以弄明绥阳敌情，电告你们及军委。三日。”

《罗炳辉年谱》载：“3月3日24时，军委电令红九军团派一得力团并带电台‘于4日拂晓前由现驻地观音阁，向绥阳前进，明晚应到达蒲老场，伪装主力先头部队，进行侦察佯攻，散布主力进攻绥阳的谣言，并借以弄明绥阳敌情，电告你们及军委’。接到命令后，红九军团大部在原地休整，仅由罗炳辉率领一个团沿遵湄大道，经四面山，抵达蒲老场。沿途把部队拉开，大造声势，以红军主力的番号书写标语，张贴到大街小巷，同时传出话去，红军主力要攻打绥阳，让老百姓暂避，并摆出一副要进攻绥阳的态势迷惑敌人。敌人听说红军要进攻绥阳，乱作一团，忙于调兵遣将。绥阳县长接二连三向王家烈报告，要求派兵。王家烈忙着向蒋介石报告最新动向，请求派中央军驰援绥

阳。蒋介石看完电报断定红军‘必向东图，与肖贺联合’，迅速作出了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的部署。”

《罗炳辉传》也说：“3月3日2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派一个得力团带电台，伪装主力先头部队，向绥阳前进，进行侦察佯动，散布进攻绥阳的谣言，以迷惑绥阳黔军，并吸引川军由桐梓向东，同时弄清绥阳敌情。罗炳辉、蔡树藩接电后，把这个任务交给第9团执行，同时把第9团扼守的娄山关阵地交给第7团接防，第8团仍在黑神庙附近，以备不测之变。3月4日，第9团经四面山，抵达蒲老场。沿途把队伍拉开，大造声势，以红军主力的番号书写标语，张贴到大街小巷，同时传出话去，说红军主力要攻打绥阳，让老百姓暂避，并摆出一副进攻绥阳的架势。国民党绥阳县长接二连三向王家烈报告，要求派兵支援。王家烈忙着向蒋介石报告，请求派中央军驰援。蒋介石看完电报断定红军‘必向东图，与肖贺联合’，迅速作出了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的部署。这时，川军3个旅已集中桐梓并准备向南进攻。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红1、红3、红5军团西进遵义到仁怀间突击周浑元部，而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域吸引川军向东而钳制之。此后，罗炳辉、蔡树藩以红9军团主力在黑神庙、板桥、四都站等地，迟滞川军南进，遇小敌则消灭或驱逐之，遇大敌则节节运动防御；第9团则继续执行佯攻绥阳的任务。7-9日，红9军团陆续撤离四都站、板桥等地，经铁厂、花猫田、长干山，抵枫香坝一带。9日，罗炳辉、蔡树藩还奉命派出2个连，赶到忠庄铺，担任向刀靶水警戒任务，并掩护遵义城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后，又派出工作团到遵义城扩大红军及采集资财，尤其是布匹。”

《遵义市志》载：“（1935年3月）3日，红九军团部从板桥移驻观坝观音阁。4日，红九军团部从观坝出发，经唐家店、沿仁江河南下，到四面山、后水、大桥一带，

军团部驻四面山。5日，红九军团各部从四面山、后水、大桥等地出发，到蒲老场，军团部驻蒲老场。6日，红九军团从蒲老场出发，经四面山、金塘、排军到高坪，军团部移驻高坪。”文中的后水、大桥、蒲老场都是绥阳地名。

罗炳辉的一系列假动作，确实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下至时任绥阳县县长王槐熙，上至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无不被迷惑得团团乱转。

《罗炳辉将军》一书写道：“王家烈忙着向蒋介石报告最新动向，请求派中央军驰援绥阳。老奸巨滑的蒋介石看完电报断定，红军‘必向东图，与肖贺联合’，迅速作了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转歼红军的部署。当他正着手调兵遣将的时候，觉察到红军是诱他上勾，其主力‘仍向西窜’之后，不敢轻举妄动了。他怕再遭到遵义惨败，忙于3月5日发出命令，要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谨慎行事，‘在乌江南岸暂缓其行动，以俟匪情明察’。令周浑元纵队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坚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随后，又电告周浑元摸清红军的底细再行动，千万要小心行事，‘不可随意轻进’。九军团出色地完成党中央、军委交给的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任务。”从这里可看出，从蒋介石的上当、觉察，到小心行事，重新部署，给红军主力的行动及长征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时任长江南岸“剿匪”总指挥的潘文华于1935年3月2日午前12时，于泸县总指挥部发过一道命令：“一、赤匪大部现在遵义附近，与中央军韩、唐两师交战中，其一部已到绥阳、蒲老场与黔军蒋部接触。二、贵指挥所部担任江门、叙永、站底、赤水河镇一带工事，应加工赶筑；限日完成。三、周司令负责将土城至二郎滩一带船只尽行搜集我岸，择要扼守。四、仰即分别照办为要。此令。陈指挥万仞。传达法电报。总指挥潘文华。”（注：这个命令时间上提前了两天，或为敌军的错误判断所致，或为文献原错。）

《国民党军第一路军前敌总指挥关

于追堵长征红军军事报告书（1935年3月）》中这样写道：“朱毛残匪主力，于二月二十七、八等日，由娄山关、观音阁一带，窜抵遵义之董公寺，与王家烈部接触。二十九日，该匪窜踞遵义后，一部进窜绥阳蒲老场，与我蒋丕绪部接触。当经击溃，毙匪甚多。其大部于本月四日向湄潭急窜。旋因我乌江第二、第三两纵队堵守严密，不易东渡，五日复经遵义西南鸭溪场，向通打鼓新场之道西窜，企图南犯贵阳……”在这个猫戏老鼠的游戏中，国民党军队分明是被戏得团团转的老鼠，却要谎报军情，说什么“当经击溃，毙匪甚多”，真是十分可笑。

这件事说明，绥阳蒲老场在红军长征中，迷惑敌人，使主力红军摆脱敌人追击，曾起到了关键作用之一。而且红九军团司令部曾驻绥阳蒲场街上，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1935年3月底，红军在乌江北岸的马鬃岭分兵，红九军团一直在北线单独作战，为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威逼贵阳、飞兵昆明，作了强有力的战略配合。编制3个团的九军团，牵制了薛岳的周、吴两个纵队8个师，打了不少好仗。据《绥阳县军事志》等书记载，分兵后的红九军团，还曾在邻近马鬃岭的绥阳北部乡镇的山岭中战斗过。《革命老区绥阳》一书中有一篇署名青丙云写的文章《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走散的红军战士》，写的就是在绥阳北部青杠塘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有六个红军来到青丙云家，青丙云招呼妻子龚安莲煮饭给他们吃，并给他们带路，把他们送到了桐梓新站，临别，红军还送了一枚手榴弹给青丙云防身。

1935年3月4日，红九军团派出一部分人组建了红军遵湄绥游击队，在遵义、湄潭、绥阳等地战斗了两年零十个月。其中在绥阳的磨刀溪、红籽坝、大桥、蒲场都有过战斗，在红籽坝战斗中，还有7名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战斗经历，当另文详述。

（下转第48页）

文采炫耀丘禾实

文 / 图 庞思纯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东北的后金，东瀛的倭寇，国内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对明王朝的统治形成巨大的威胁。然而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正是英雄豪杰崛起之时。这些身逢乱世的英雄豪杰及文坛才俊们，以自己的才华与事功，为历史注入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贵阳府新添卫（治今贵定）的丘禾实、丘禾嘉兄弟，亲逢其时，应时而起，一个“以文采炫耀于黔南”，一个以抗御外敌而闻名于当世，为贵州的历史长卷留下了光辉的形象。

据清道光《贵阳府志·明耆旧传》所载：明洪武年间，山东即墨人丘安随军出征西南，任新添卫后所百户之职，其后落籍该地，子孙世袭武职，官至卫指挥僉事、贵州都指挥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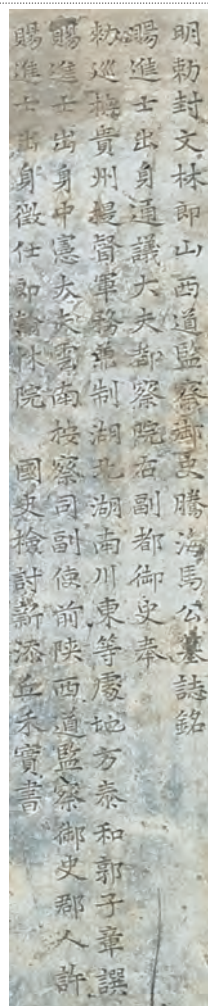
明隆庆元年（1567），新添卫生员丘东昌乡试中举，成为丘氏家族入黔后的第一位举人。进入仕途后，丘东昌历任教谕、知县，终官泸州知府。丘东昌告老还乡后，建“虚白书堂”，一面教导儿女，一面杜门著述。有《法喜随笔》传世。

丘禾实，字登之、有秋，号鹤峰，丘东昌长子。其自幼聪颖好学，“文思颖赡”，为秀才时已有诗名。万历十九年（1591），丘禾实参加乡试，中解元（举人第一名）。七年后，他再试京师，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明代云贵两省入翰林院授职第一人。

丘禾实热爱大自然，对山川形胜有着特殊感情。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丘禾实为钦差大臣巡视湖广、云贵，时值官军已平定播州（今遵义，当时归四川省）之乱，他严格奉行朝廷“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对十多人叛乱牵连者实行赦免。其奏文曰：“播州叛逆杨应龙已死，宜请以惩首恶，赦胁从。”。其奏文不难看出，丘禾实心系百姓、保民救民的儒家思想。

处理“播州之乱”的善后事务后，趁着余暇之际，丘禾实特地赶往家乡探视父母。听说离家五十里外有一神仙洞府式的凭虚洞（亦称牟珠洞），喜欢探幽访胜的他顾不得疲劳，欣然前往。

当丘禾实来到凭虚洞时，洞外奇异的景色给他视觉、听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凭虚洞位于半山之间，洞中涌出的水流，宛如白练从天而降，在山下溅起了哗哗响声，令其目眩神迷，心醉向往；进入洞中，钟乳石莹莹如玉，千姿百态，给人神奇的遐想。凭虚洞分三层，随兴而上，犹如登临天上宫阙，有凭临虚空之感。置身“阆风”仙境，丘禾实不禁感叹上天的鬼斧神工。为了记录内心的感受，留下美好的记忆，他诉之笔端，写



丘禾实所书《马腾海墓志铭》（局部）

贵定阳宝山



下了《游凭虚洞记》一文及诗十首。自此，凭虚洞之名因丘禾实之诗文而显露于世。之后历代文人墨客接踵而至，为之题咏，使凭虚洞成为黔中名胜。

万历三十年（1602），丘禾实巡视完毕，在返京途中再次折回家乡。得知新添卫北十里的阳宝山新建了佛寺，他又兴冲冲地赶去观光。

阳宝山为大理人白云禅师所建。据《乾隆一统志》记载，万历年间，白云禅师到阳宝山探幽寻胜，“直穷薮泽。山故多虎，主僧止之弗听，裹粮坐泽中，凡八日，时方大雪，僧所止，有虎卧其地，雪弗能及，其虎亦绝”。

这个记载虽然神乎其神，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康熙《贵州通志》却比较真实地记载了以后的事情：白云禅师离开阳宝山时，发誓再来这里修建寺院。十年后他信守诺言重返旧地，“建千佛寺，备极精巧，前后楼数十楹，飞甍建瓴，巍然巨观，为黔中名刹”。自此，千佛寺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每日暮鼓晨钟，香烟缭绕，成为贵州佛教圣山。

丘禾实登临阳宝山时，感到山高云深，寺浮云间，拾级而上，如登云路。到了山顶，放眼四看，美不胜收。山中寺院，环境幽静，林木苍翠。虽然白云禅师待寺建成后

离去，但丘禾实睹物思情，不免有些感慨。当夜，他趁着月色，路过披着月光的松间小路，前往山寺寄托幽情，不知不觉地来到僧舍，随即与住持清谈。皓月当空，松风拂面，品茗谈天，俯仰古今，看纷繁世间，叹人生短暂，丘禾实不禁有所感悟。之后，他为这次登阳宝山留下了诗两首。其诗云：

缥缈危峰碧落齐，攀跻竟日有招提。云生户外诸天近，月挂松梢万象低。

元岳何年归玉笈，清谈中夜共闾黎。一声唤醒浮生梦，不是灵鸡不敢啼。

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四十三年（1615），丘禾实历任会试同考官、会试考官、右春坊右赞善、右谕德、右庶子和武科会试主考官，一度因父亲病故回乡守孝三年有余。万历三十二年（1604），身为“赐进士出身、征仕郎、翰林院国史检讨”职衔的丘禾实，应御史贵阳马文卿之邀，书写《明勅封文林郎山西道监察御史腾海马公墓志铭》（这方志石是一件珍贵的丘禾实书法手笔）。之后，因妻病故，丘禾实悲痛过度而染疾，医治无效在京病逝，享年四十五。

丘禾实才高学博，一生喜文，著作宏富，有《丘禾实文集》八卷、《丘禾实诗集》四卷、《丘氏家乘》《经筵进讲录》《循陔园集》《循陔园集类编》十二卷。其作品大多散佚，不传于后世。至今仅存《循陔园集》及诗十余首、文几篇。

值得一提的是，《经筵进讲录》是丘禾实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为皇帝讲授四书五经的记录。所谓，“经筵”，就是皇帝御前所设的专席，由翰林院学识渊深的学官为皇帝讲授经书。了丘禾实四次为明神宗讲授经文之义，用以启迪其智慧。

丘禾实书法雄放，吸人眼目，现遗存在阳宝山的“千岩万壑”四个摩崖大字，是其当年游山时所书。其笔力雄健，古朴苍劲，被人视为一代佳作。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茶园山与徐氏家族

文 / 图 田晓东

仰观青霭台，俯瞰白云流。雾重晴疑雨，山寒夏亦秋。松篁兼石吼，猿鹤逐人游。转忆逃秦日，萧萧木叶落。

——（清）徐爽《茶园山》

2005年的一个盛夏，笔者第一次前往茶园山搞调查。那时公路尚未修通，顶着烈日从六龙山西北麓的暗碑上山，爬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在半山腰的水井边小憩，正遇一茶园山村民挑着东西下山，我与他攀谈起来。茶园山不但离城较远，而且山势陡峭，当地村民出行极不方便。他半开玩笑的说：“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想的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开屋？搞得我们后辈吃苦受累的。”

他也许不知道，他说的“老祖宗”就是——徐以暹。

徐以暹（1606—1699），字赤海，是秦徐福在中国第五十九代孙，铜仁徐家自江西临川始迁第四代，明崇祯丙子（1636）科举人。次年会试后出仕明朝，任广东潮阳县知县。明朝灭亡后，徐以暹在南明王朱由榔手下为臣，历任广东按察使司僉事，分守肇罗道，广西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桂林道。清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王朝覆灭后，徐以暹携家人回铜，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

桂在云南起兵叛清，当时的铜仁亦属于吴三桂的“周吴”政权，曾经抗过清的徐以暹自然与吴三桂的政权过从甚密。六年后，康熙十八年（1679），吴三桂兵败，第二年，清军夺取铜仁府。徐以暹，这位与清廷对抗的南明旧臣为防不测，不敢在铜仁城中居住，便带领全家，寻到离城二十余里的六龙上创建“别业”茶园山庄。徐以暹隐居后，从此“高卧不问沧海事”，为防清王朝清算旧账，徐以暹还给子孙定下了一条规矩：三代不许出仕做官。

民间传说徐以暹其人躯体伟岸，文武全才，是徐氏家族四百年来书香门第连绵不缀

茶园山南州第



的继往开来关键人物。

一、茶园山建筑文化

徐氏家族宅居建筑主要是铜仁城区住宅和茶园山庄，从家族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铜仁徐氏始祖徐宰六（？1491—1581）。世居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为草坪徐氏明光禄寺少卿徐谦光之元孙，徐楷三次子，明正德间庠生，诗人。原是江西临川的一个秀才。明万历《铜仁府志》记载：明朝嘉靖初年，徐宰六云游到铜仁，被铜仁山青水秀的风光所吸引，爱上了这个风光旖旎的地方，便迁居到这里（“喜其山水佳胜，乃迁居焉”），成了徐姓的入黔始祖。徐宰六在勘舆风水上很有研究，当时铜仁的府学、官署的选址，都是由徐宰六所选定。

清乾隆以前，徐氏家族在铜仁城内的建筑物，从明末到崇祯时期，在徐宰六、徐鹤年、徐穆等四代家族的经营下，构建的宅居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如今的“道坳上”到中南门，就是当年徐氏家族主要居住的地方，当时的人们戏称徐氏家族为“徐半城”。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为过。

在南明桂王时，徐以遑提广东按使司僉事，分守肇罗道。清顺治四年（1647），升迁广西按察使司副使。清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

榔，被引清兵入关的平西王吴三桂以弓弦绞死并焚尸，南明彻底灭亡了。当时，参加南明抗清十八年的徐以遑从广西返回铜仁，为了避祸，自然不敢在城内或近郊居住，于是便在城外既偏僻又险峻的六龙山开辟创建茶园山庄。因为当年在山庄的左侧山坡上生长着很多茶树，所以叫做“茶园山”。

徐以遑深谙祖辈传下的风水之术，对茶园山的选址及建筑的形制无不透露出中国传统风水及建筑美学的理解。茶园山属于典型的血缘村落，这种团块式结构是宗法制度下的产物，风水典籍《阳宅十书·论宅内形》里说：“十家八家同一聚，同出同门同一处。”它有利于房派的团结从而巩固宗族的秩序，因此是由宗族提倡、支持和维护的。同时，村落的选址，要有土地、水源、植被、气候、矿产、交通等条件，但只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要考虑到居住的安全。居住的安全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安全，二是社会环境的安全，三是心理的安全。

茶园山古建筑群坐东北向西南，背靠青龙山，前临莲池，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建筑总面积在5000平方米左右，皆依山就势，高低有致，寨前设有卡门。山庄前设有两个简易的寨门，通过长长的通道并上踏步后，进入南州第和景山第。“南州第”的取名乃为纪念其徐姓南昌开基的第十世祖，而“景山第”则与其时称“南州高士”的第



徐穆墓志铭



十六世祖有关。

山庄南北两院结构基本相同，从外“八”字形石库式牌楼大门进出，门额上方分别横行楷书“南州第”、“景山第”等三个大字。由前屋、正房和两厢组成第一个院落，再由正房和后屋及两厢组成第二个院落。前屋、正房及后屋均面阔三间，木结构穿斗式悬山小青瓦顶，空间高大，铺望板，隔扇门窗雕刻精美。后屋明间为堂屋，置神龛，开六合隔扇门。两次间为住房，铺地楼板。两厢均为两层，有回字形、万字形栏杆。庄内四周围以封火院墙，墙高3米，檐下绘有花草兽鸟等图案。庄内地面均铺青石地板。

南州第（现徐冠群宅）位于山庄的南侧，坐东向西，大门北开，由正房和两厢组成一个三合院落。占地面积318平方米，建筑面积203平方米。正房面阔三间12米，进深两间10米，明间为堂屋，开六合隔扇门，木雕细腻精美，方型柱础，刻吉祥花草及动物图案。

茶园山依托自然生态的宝库——六龙山为屏障，远离铜仁城区，以山庄、民居、寨墙、院墙、卡子门、寨门等构成一个功能完善的防御体系。站在卡子门处，可窥望铜仁城的一举一动，而卡子门下是陡坡和绝壁，且只有此处一条路与外界通，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山庄离卡子门还有一定的过渡距离，可以实现“进可攻，退可守”战略思路，这在历史上满足了徐氏家族对躲避清朝官军追杀的安全心里需要。这种完全用于防御的民用建筑规划艺术，在选址与建造上体现了徐氏族人智慧和追求和平自由的意愿，是古代民居防御建筑艺术的典范。

明末清初时期，由于六龙山土匪猖獗，时常骚扰周边百姓，茶园山也不能幸免。民国十年（1921），茶园山遭土匪抢掠焚烧，数百年的古建筑毁于一旦，除南面的景山第四合院保存外，其它主体建筑均荡然无存，仅剩部分封火山墙和石库门。

二、科举世家，一门两进士

明清时期，自贵州开科以来，铜仁府县共中进士19人，徐氏家族占了两位，举人7个。

翻开《明清进士题名录》，我们发现徐氏家族产生了两位进士：一是明万历辛丑（1601）科进士徐穆，官至云南按察使。在其任职二十余年中，为政宽大，清操自励，体恤民情，治行卓著，是一位口碑甚佳的好官、良吏；一是徐穆的后人徐如澍，其系清乾隆乙未（1776）科进士。徐如澍清高耿介，不与污流浊水合流，在其任谏官时，敢与权奸和珅相忤，刚直之名流播京师，深受朝野称颂。

徐穆，字钟绶，从小聪颖过人，不同凡响，有“神童”之誉。人谓“入塾读书，即过目成诵”。万历甲午（1594），徐穆乡试中举。辛丑（1601）他再奏捷音，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后，徐穆首先出任浙江崇德知县，由于政绩卓著、治行清廉，直接被选为礼部主客司主事，后历官员外郎，福建兴化知府、云南按察使副使、河南布政使司参政府、云南按察使。徐穆为宦二十余年，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深受士民怀慕。据《福建通志》所载，徐穆任兴化知府时，“洁己爱民，清静不扰”。到了旱灾之年，徐穆亲自带着食盐、干肉四处去赈恤灾民。清平之时，徐穆发动民众修池塘，建桥梁，凡是对民有利之事，无不尽力为之。因此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徐穆任期届满时擢云南按察使司副使，上京晋见皇帝。万历帝朱翊均曾问道：“闽俗犷悍，抚驭为难”？徐穆回答道：“臣未官闽前，闻亦若此，及守兴化，治固易也。”这样的回答却令皇帝有些诧异。

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徐氏又添了新生命——徐如澍诞生。徐如澍，字郇南，号雨芑，别号静然。父亲徐镇系乾隆庚午（1750）科举人，后因“大挑一等”被朝廷选拔，委以知县，

分发四川。徐镇见如澍自幼聪慧，喜爱读书，由于爱子心切，为便于教导，便带着徐如澍上任。

乾隆三十五年（1770），徐如澍年十八，离开父亲，返回铜仁，参加秀才的考试，以冠军隶学籍。辛卯（1771），徐如澍赴省城贵阳参加乡试，中试成举人。乙未（1775）他北上京师，再扬文场，荣登皇榜，名列二甲六名进士。登上仕途后，徐如澍从庶吉士官至通政使司副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从官达四十余年，历经乾隆、嘉庆两朝，又蒙皇帝的赏识，竟未被重用，成为朝廷重臣，原来徐如澍得罪了权臣和珅。和珅是乾隆帝宠信的大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朝中无人敢与其争锋。徐如澍最初为官时和珅闻其名，意欲延揽至门下。然而徐如澍性恬淡，平生不慕荣利，尤其不屑于依附和珅这样的权奸来败坏自己的清名，因此对和珅的盛情邀请置之不理。和珅受到如此羞辱，虽然当时咽下了这口怨气，但一直耿耿于怀，怀恨在心，想尽方法暗中破坏其升迁。直到嘉庆四年和珅倒台后，那些依附和珅的官员一一被牵连，然而徐如澍却因与和珅毫无瓜葛而安然无恙。正是因为其爱憎分明，不攀附权势的刚直性格而得到士大夫们的愈加敬重。徐如澍这些年在仕途上不得意，但在文化事业及选拔人才上有所建树，他主要从事典籍校订和乡试、会试选拔人才的工作。他参与分校的《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可以说这是徐如澍对中华文化所作的贡献。

徐如澍不但在文化上卓有建树，而且在军事上也有不平凡之处。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月他从北京回到铜仁为父徐镇“丁忧”期间，适逢黔东湘西的乾嘉起义爆发，为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时任贵州巡抚冯光熊与铜仁知县支学敏多次上茶园山，恳请徐如澍为云贵总督福康安的军事行动提供保障。也许经世济国历来就是古代文人儒士的理想，徐如澍答应并组织乡勇团练二千余人在今天的和平六转山一带为协助清军作战，

驻守了半年之久。福康安后来给乾隆皇帝的奏章中对徐如澍的评价是“此人可嘉”。只是战火过后，亲历整个乾嘉起义看到战火对百姓造成诸多苦难的现状，徐如澍留下了这样反映自己心境的一句诗“辜负家山无限好，闲云出岫苦难休。”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四月，徐如澍被授予通政使司副使。嘉庆帝在召见他时曾言：“朕念汝久居清要，特简（选拔）用之。”然而此时徐如澍已六十五岁，为国尽忠的日子不多了。两年后，徐如澍辞官归里，优游林下十余载，与郡大夫流啸咏，有前后《铜仁唱和诗抄》流播人口，著有《宝砚山房诗集》20卷，《文集》10卷、《随笔杂记》2卷，续修《铜仁府志》12卷。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为庆贺徐如澍中举六十年，官方特邀其重赴鹿鸣宴。两年后，这位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铜仁名贤病逝于里第，享年八十有二，可谓硕德大年，寿终正寝。

三、诗礼传家，代有传人

茶园山主人徐氏家族向来坚持“立品行”、“正风尚”、“课子弟”、“尊师道”等家训传统，300多年来人才辈出，科甲蝉联，为官清正，均有政声。著述甚丰，藏书之多，甲冠于黔东，素为书香门第，是明清时黔东地区的名门望族。从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道光年间，以圣贤之教世其家，以经史诗文传其世，延续十二代，风流三百余年，可谓诗礼传家，代有传人。

徐宰六（1491—1581）（一世）庠生。

徐鹤年（1535—1626）（二世）庠生。

徐穆（1565—1624）（三世）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举人。

徐稷（1569—1608）（三世）庠生。

徐以暹（1606—1699）（四世）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

徐懋德（1632—1682）（五世）岁贡，吴周康熙十七年（1678）政权举人。

徐閤（1657—1732）（6世）郡庠，康熙十七年（1678）吴周政权明经。

徐铤（8世）乾隆间贡生。

徐镇（1724—1794）（8世）乾隆十五年（1750）中试第六名举人。

徐如浩（1750—？）（9世）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乡试举人。

徐如澍（1752—1833）（9世）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会试中试第六十二名进士，殿试第六名。

徐如湛（1757—？）（9世）嘉庆间贡生。

徐如鸿（1761—？）（9世）郡庠生。

徐如淳（1762—1814）（9世）乾隆四十八年（1783）癸卯顺天乡试举人。

徐如涵（1763—1832）（9世）乾隆五十四年（1789）乙酉科拔贡。

徐黎（1797—？）（10世）太学士。

徐耘（1799—？）（10世）太学士。

徐枚（1792—1842）（10世）太学士。

徐植（1803—？）（10世）岁贡生。

徐榕（1793—？）（10世）道光初庠生

徐元焘（1810—1833）（11世）道光间廪生。

徐元熊（11世），廪贡生。

徐元煜（11世），咸丰年间贡生。

徐肇基（12世），光绪年间庠生。

徐承锦（1873—？）（13世）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取优贡。

徐钟藩（13世），光绪年间优廪生。

……

徐福的第56世孙、铜仁徐姓入黔始祖徐宰六及其子徐鹤年皆善诗文。徐宰六著有《北楼诗草》，徐鹤年著有《北山诗草》；其孙徐穆，官至云南按察使，著有《闽游诗草》及《滇游诗草》；徐穆著有《熟选楼诗》2卷；第四世徐以暹，官至南明广西按察使司副使，著有《烟波小草》等，《黔诗纪略》曾收录其诗31首；第五世徐懋德，官拜（明朝）贵阳府学教授，著有《味陶诗草》。

南明亡后，徐以暹一则不愿子孙为清廷官吏，二则也为隐瞒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因

为做官是要填写履历的），故叮嘱其子孙三代不作官，但在文学创作上，这些人却很有成就，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第六世徐閤、徐爽兄弟都是一代才子，徐閤著有《香雪斋稿》4卷、《澹园纪年诗抄》4卷，徐爽虽然英年早逝，却仍留下了《骚余草》《澹庵集》等诗文集；第七世徐世坦、徐世垓等均有诗作入志传世，徐世垓还出有《蜀游草》诗集；第八世徐镇先后在四川、福建、江西等省七处任知县、知府、道员，著有《家训》《倦游吟》等；第九世徐如澍，初任翰林院编修，历官四十余年，特旨加封三品卿衔，著有《宝砚山房诗集》20卷、文集12卷、《随笔杂记》2卷、《骈体文集》2卷、《试帖》《制艺》等诗文集共四十卷及道光《铜仁府志》十二卷；第十世徐黎虽未做官，但在文学上颇有建树，著有《红蕉山房诗集》30卷，《文集》6卷，《骈文》6卷，词一卷，其妻许韵兰著有《听春楼诗稿》6卷，继室舒芳芷著有《迎香阁诗稿》4卷。第十一世徐元熊，石阡府学教授，其妻申辑英，为一代女才子，留有诗百余首；其子敬增，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举人，官学正。第十三世徐承锦（徐尚之），曾创办贵州经世学堂，编辑了《铜仁徐氏先世事略》、《铜仁徐氏历代诗抄》，著有《炯斋诗草》。

可以说茶园山徐氏家族从一代至十四代掀起了持续四百多年的耕读诗教和宗族诗化是文化活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家族。近五百年来有诗人八十六人，创作诗歌近三万余首，有27部诗集，6部文集。遗憾的是如今这些诗文著述及书画作品几乎全部湮没。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从残存的墙垣断壁我们可以想像茶园山建筑曾经的辉煌；从徐氏留下的大量诗篇里，我们可以感悟茶园山诗人展示生命精神、寻找生命存在所作的努力。文

（作者单位：铜仁市碧江区文物局）